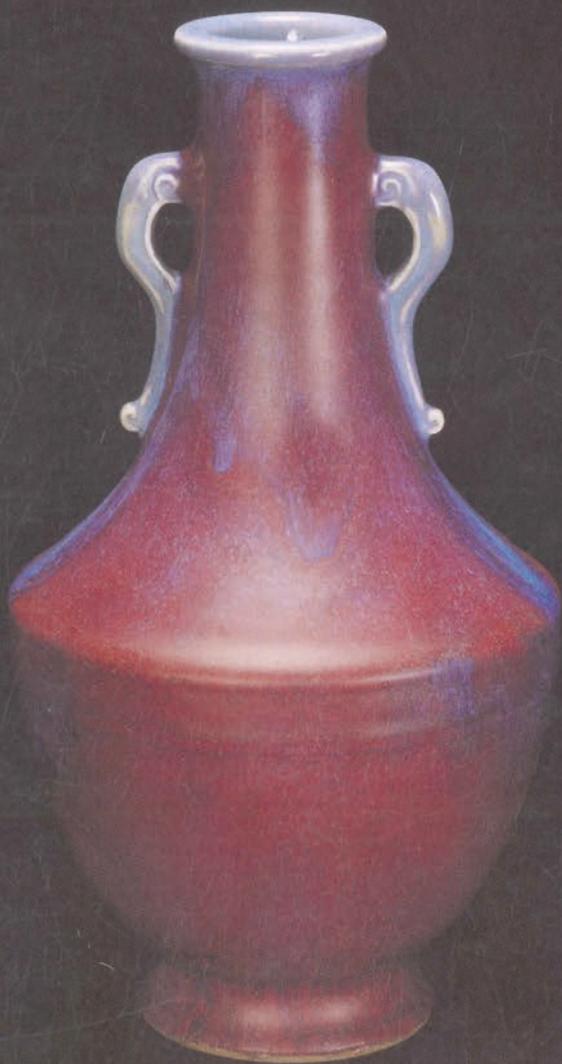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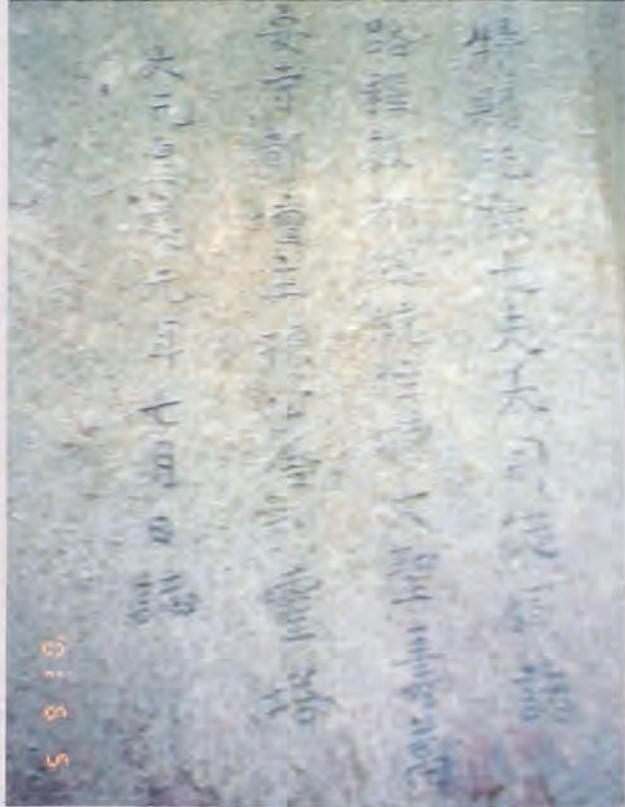


- 东皇城墙遗址的发掘展示与皇城的整体保护
- 从刘李店 1811 说姬燕建国
-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拣事迹考
- 元『析津志』佚文新辑——兼论『析津志辑佚』之误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1·4

石景山区出土白塔寺开山住持灵塔石函



石函盖上的铭文

白塔寺又称妙应寺，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因寺内有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元代藏式佛塔(俗称白塔)而著称海内。白塔寺创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该塔既为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又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而“坐镇都邑”，前后共用了将近18年的时间，建成了端庄秀丽的白塔和规模宏大的寺院，面积为16万平方米，称为“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安寺香火鼎盛近百年，在元大都中的宗教、政治、文化活动中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其殿阶栏楯一如内廷之制，既是元皇室在京师进行佛事活动和百官司仪的中心，同时还是最早译印蒙文、畏兀儿文佛经的场所。朝廷还规定每年举行重要朝仪前期三天，要在大圣寿万安寺进行预习。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他的祠堂就设在大圣寿万安寺内。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寺毁于雷火，所庆幸的是白塔完好无损。直到明天顺元年(1457年)，由宛平县民郭福请修寺院，落成后改名为妙应寺，面积仅及大圣寿万安寺十分之一，因白塔置于庙中，俗称白塔寺。

这样一个地位显赫、作为国家在京师进行佛事活动中心的寺院，它历代的住持是谁，圆寂后所葬又在何处呢，因缺乏文字记载不得而知。

2001年5月25日，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接到首钢苹果园宿舍区施工工地的报告，北京供电工程公司在挖电缆沟时于工地北墙南侧地下0.9米处，发现石质文物，由于民工在施工时不知是何物，已搬离了现场。据了解，此处解放后已经进行过三次施工，地层被打乱，至已挖的电缆沟底部近两米处仍是现代的红砖，原始地层已

不可见。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的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物为一石函，函盖已经掀开，函中有一已碎的木匣，推测早年曾被盗。石函置于青石板砌就的石室(115×122cm)之中，石室内部杂乱不堪，淤泥堆积，在淤泥中零星发现有少量黄色织物残片和碎木片，最后出土佛珠两颗。石函长70cm，宽51cm，高30cm，石函分为两部分，盖顶式函盖，上底长54cm，上底宽39cm，高17cm。函盖青石质，上刻“特赐光禄大夫大司徒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住持大圣寿万安寺都坛主揀公舍利灵塔 大元皇庆元年七月日志”。函盖内左右侧还有墨书题记，右“广平僧口吉祥黄村监盖”，左“舍利灵塔壹座高六十二尺”。函外底部墨书“海提点记”四字。石函四周壁上雕有图案，左为菊花，右为两只口中衔环的椒图，前后都为十字金刚杵的图案。函底雕成供桌形式，有四足，上刻云纹。从函盖上所刻的文字可认定此处是大圣寿万安寺住持揀公的灵塔。

显然，这里的揀公是集集寺第三代领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大司徒郃国公知揀。《析津志》中记载：“宝集寺，寺建于唐，继以领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大司徒郃国公知揀。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大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揀公开山主之。”因此，知揀就是石函文字中提到的揀公，是大圣寿万安寺的开山住持。他圆寂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葬在京西黄村。

黄村之名，始于何时？今西黄村出土的金定远大将军利涉军节度副使吴前鉴墓志云“……葬于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黄村之原”，可见至少金代时就有黄村之名。黄村是否就是大圣寿万安寺的塔院？曾葬有几代住持？塔院有多大规模？这些都是一个个谜团，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现石函收藏在田义墓陈列馆的田野石刻展区中。

(文、图：苗天娥 陈康等)



石景山区出土知揀石函（侧前）



石景山区出土知揀石函（侧后）



石函盖内两边的墨书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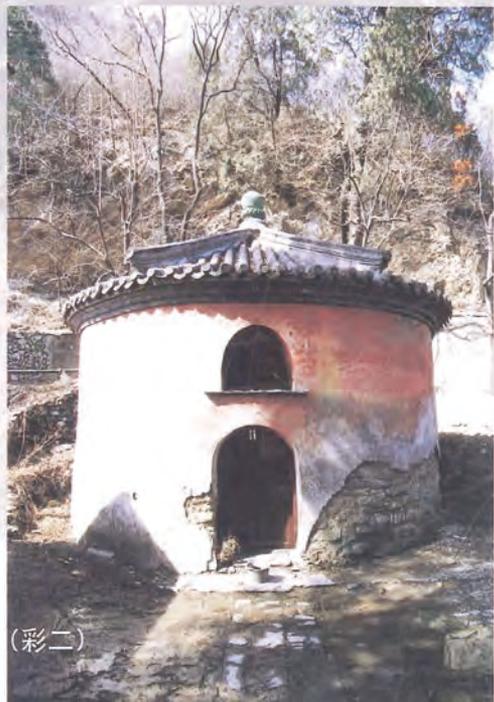
(影一)

新公布的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续完)



18. 无梁阁

清代建筑，位于顺义区大孙各庄镇顾庄子村东。原名玉皇阁，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外观三层，内部为两层，整个建筑没有一根梁柱。阁内绘有壁画，壁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是研究古代民间绘画不可多得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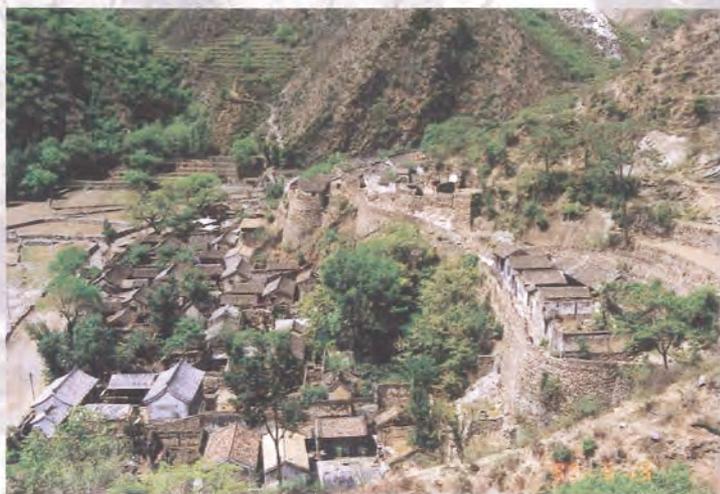


(彩二)



16. 双林寺

元、明建筑，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西北。现存辽经幢一座，高4米；元、明时期建筑各一座，悬山调大脊，砖雕鸱吻。梁架使用叉手，是北京地区少有的元代风格建筑。



17. 川底下古民居村落

清代建筑，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民居坐落在山谷北侧的缓坡上，坐北朝南。占地约1公顷，现存院落74个，689间房。一条街道将村落分为上下两部分。民居以村北的山包为轴心，呈扇面形向下延展。具有规划严谨、整体建筑精良、装饰华美、巧用空间等特点，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北方民居建筑村落。

19. 铁瓦寺

明代建筑，位于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明代始建，清代重修，坐北朝南。现存山门、东西配殿及铁瓦殿。铁瓦殿呈圆柱状，顶部的六条垂脊、宝珠及瓦均为铁制。铁瓦长0.31米，直径0.13米，共有458块，大部铸有铭文。



3. 中华圣公会教堂

1907年建，位于西城区佟麟阁路85号。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外形为中国传统风格，其中顶部两座八角亭式的天窗和钟楼独具匠心，是北京地区建设早、规模较大的基督教中心教堂，为中国近代民族建筑形式中早期代表之作。



四、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 陈独秀旧居

民国建筑，位于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该院坐北朝南，如意大门，正房三间，南房三间，硬山合瓦过坎脊。1917至1919年，陈独秀在此居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4.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

1903年始建，1906年正式启用，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直至1958年，这里一直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车站建筑为欧式风格，现存基本完整。是中国铁路早期车站建筑的代表之作。

2. 陆徵祥家族墓

民国建筑，位于西城区百万庄路8号。陆徵祥(1871—1949年)曾任驻荷、俄公使和外交总长。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弥足珍贵。





5. 民国财政部印刷厂旧址

1908年建，位于宣武区白纸坊街南侧。原为清朝度支部印刷局，后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印刷厂。现保存较好的有二号门及钟楼、主工房大楼、三座西式小楼及水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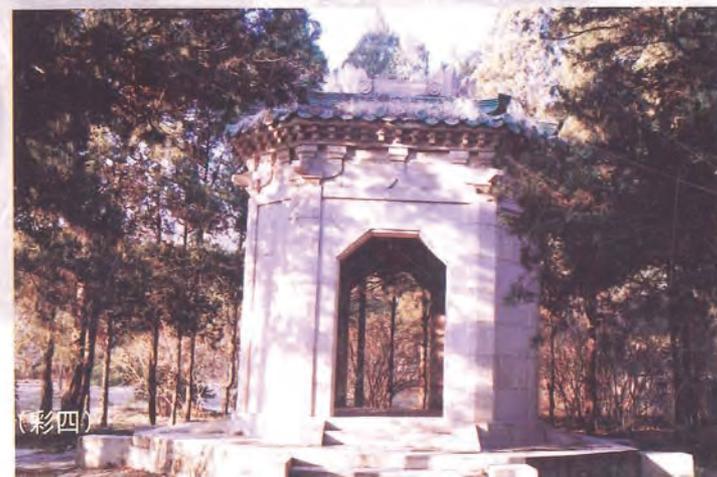
6. 粮食店街第十旅馆

民国建筑，位于宣武区粮食店街73号。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面阔七间，平面呈“日”字型。其中有两个内天井，房间沿天井四周布置，四组楼梯设于厢楼山墙一侧，各楼前廊之间又加平顶围廊连接，形成跑马廊。该建筑做工精细、朴实规整。



7. 四九一电台旧址

1918年始建，1923年竣工，位于朝阳区双桥。占地近20公顷，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兴建。原有楼房8座，现存7座，均为日式建筑风格，建筑及格局保存完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向世界的。



8. 梁启超墓

1931年建，位于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该墓坐北朝南，占地约0.88公顷，由梁启超之子、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设计。墓主体为黄色花岗岩结构，墓前有八角形石筑方亭一座，汉白玉石碑两通，现保存完好。

北京文博

博
初
題

目 录

(2001年第4期)(总第二十六期)

文物工作

- 东皇城墙遗址的发掘展示与皇城的整体保护 孔繁峙(5)
东岳庙文化庙会浅析 田 瑾(16)

北京史地

- 从刘李店 78141 说姬燕建国 韩嘉谷(20)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捺事迹考 黄春和(33)
辽金时期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争 范 军(41)
历代帝王庙的祭祀礼仪 付 幸(46)
永乐大钟成铸时间考辨 孔祥利(55)

考古与文物

- 北京西山凤凰岭石窟调查 温玉成 刘建华(60)
吕微墓表考释 任秀侠(63)

文物鉴赏

- 辽瓷造型及其装饰艺术
——兼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品介绍 卢迎红 高继祥 黄秀纯(66)

瓷器中的精品 ——珐琅彩瓷器	赵世诚(73)
-------------------------	---------

史籍辨误

元《析津志》佚文新辑 ——兼论《析津志辑佚》之误	亮宝海(77)
《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读后记	程鹏万(81)

古建修缮

先农坛的建筑	李小涛(84)
--------------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1 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李树丛(95)
《北京文博》2001 年总目录	(98)

封面:首都博物馆藏的密双耳尊(清乾隆)

封底:清白玉摆件

封二、彩插一:石景山区出土白塔寺开山住持灵塔石函

彩插二、三、四、封三:新公布的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续完)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楠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董子西 齐心 马晋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成木生 寇展 张增元 宋大川
陈平 陈旭 梁大为 赵其昌 侯明 曹忠述 徐伟 徐明 薛小峰
韩永 温桂宇 葛英会 傅公植

主编:张辰 编辑部主任:陈爱芬

本期责编:陈悦芬 魏伯涛 张岩 李朝丛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a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4, 2001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 Exploring and Restoring the Site of the Eastern Royal Wall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hole
Royal City *by* KongFanzhi(5)
- Introduction to the Dongyue Temple Cultural Fair *by* Tian Jiu(16)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Yan by the Ji Clan—An Archeological Study from 78H1 in
Liulidian *by* Han Jiagu(20)
- The Life of Zhijim—the First Abbot of the Yuan Dynasty Dashengshouwan'an Temple ...
..... *by* Huang Chunhe(33)
- Battles Foughtat Juyong Pass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by* Fan Jun(41)
- Sacrificial Rites in the Imperial Temple for Emperors of All Dynasties *by* Fu Xing(46)
- Research into the Date of the Casting of the Yongle Bell *by* Kong Xiangli(55)

ARCH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 Investigation of the Grottoes at Fenghuangling in Beijing's Western Hills
..... *by* Wen Yucheng Liu Jianhua(60)
- Ide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pitaph for Lü Zheng *by*Ren Xiuxia(63)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The Shapes and Decorative Art of Liao Dynasty Porcelain—Introduction to the Exhibits in the
Liao and Jin City Wall Museum in Beijing
..... *by* Lu Yinghong, Gao Jixiang, Huang XiuChun(66)

The Cream of Porcelain Wares—China Wares with Enamel Colors by Zhao Shinuan(73)

IDENTIFICATION OF MISTAKES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Newly Published Lost Version of the Yuan Dynasty *Annals of Xijin* and the Errors in This Edition
..... by Dang Baohui(77)

Reflections After Reading *The Rare Collection of Eastern Zhou Dynasty Currency Found in the Lower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yan* by Cheng Pengwan(81)

REPAIRS OF ANCIENT BUILDINGS

The Structures of the Altar of Grain by Li Xiaotao(84)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3rd Quarter of 2001 by Li Shucong(95)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in 2001 (98)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Benzhi, Lü Jimin, Li Xunj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uren, Gao Zixi, Qi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s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shu, Liu Junye, Cheng Dulong, Zhang Zhan, Zhang Zo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ao Xu, Rong Dawei, Zhao Qichang, Hou Ming, Jin Honghui, Xu Wei, Xu Ming, Shu Xiaofeng, Han Yang, Wen Guo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Ch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Li Shucong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rmuseumnet.org>

东皇城墙遗址的发掘展示 与皇城的整体保护

孔繁峙

最近,在北京城区内修建的“东皇城墙遗址公园”已对社会开放,这是市文物局与东城区政府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主要内容并把危房改造、环境整治、考古发掘、遗址展示综合为一体的公园式遗址景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治、保护的重大举措,遗址公园的建成,为全市民众和参观游人提供了一处了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历史和展示皇城昔日辉煌的传统化场所。

一、东皇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成果

据有关文献记载,皇城墙是在民国以来被逐渐拆除的,在南起长安大街北至平安大道这全长 2700 余米、宽 29 米的区域内,自民国以后,就全部为社会居民等建筑所覆盖,在东城区政府搬迁全部居民、拆除全部地面建筑后,原皇城墙的地面遗迹仍是踪影皆无,文献中记载的皇城东门——东安门、皇城墙、皇恩桥、御河等建筑的准确位置及遗存,都必须通过考古发掘的手段加以解决。

市文物研究所担负了东皇城墙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考古发掘自 3 月底开始至 5 月上旬结束,采用布设探沟,探方的方法,先后有选择地发掘清理了东安门、皇

恩桥、御河、皇城墙等建筑遗址,发掘总面积达 1000 余平方米,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皇城遗址研究资料,对皇城遗址的展示和建设皇城遗址公园提供了重要依据,此次开展的东皇城墙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 确定了明清东皇城墙的具体位置。

在贯穿皇城北 2700 米的整个遗址区域内,共选定了九处发掘地点,其中开探方 4 处,横间开探沟 5 处,其发掘深度分别在 2.5 米至 3.5 米,九处发掘地点均在遗址区域东侧边缘的不同深度,发现了皇城墙的残基和墙基夯土痕迹(见图一),明清皇城墙位置在遗址的东侧边缘,与西侧御门相距 4—8 米之间(御河自北至南不是直线),这与清代《加摹乾隆京师全图》所测绘的位置基本相符,从而确定了东皇城墙的位置及走向。

2. 关于目前所见东皇城墙的建造年代。

根据文献记载,皇城建于明永乐年间,明代中期又将御河西侧的城墙迁至东侧。清代前期皇城没有大的改观,至乾隆年间皇城有过一次较大的变化,据《国朝宫史》记载:“皇城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竣工……”用了六年时间对皇城进行“重建”,可见其重建规模。这次考古发掘能否发现这次“重建”的痕迹呢?从皇城遗址发掘探沟断面看,遗址后期的堆积很厚,其自上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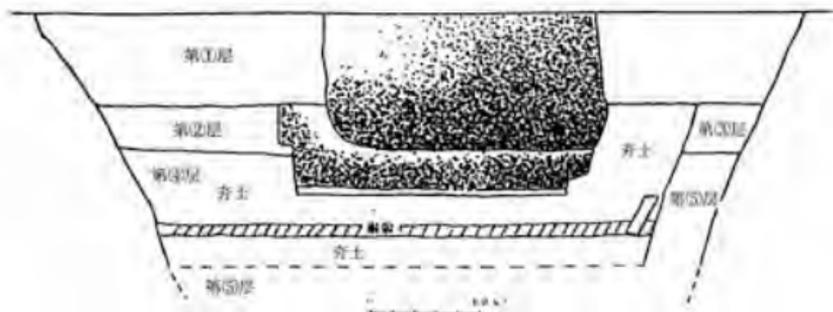
图一 东皇城根遗址考古发掘探方、探沟、城墙位置示意图

下的堆积层是：第一层：为民国以来形成的渣土层，厚度在1米至1.5米左右；第二层：为明、清初的堆积层，此层情况比较复杂，总的分布是：皇城墙西侧的堆积应为明代的垫土层，其厚度在0.5米至1米左右，有的地段的探沟内此层堆积中还含有白灰、砖瓦的碎块，经过夯实，叠压在下层的夯土层上；皇城东侧为明清时期的渣土层，内含炉渣、黑色杂土等，被墙体基础所打破，深度在0.5米左右；第三层：为夯土层，其深度距离地表2米~3.5米左右，其厚度为0.5米至1米左右，底部部位施以经夯实的碎砖层；第四层为生土层（见图二、三）。从图中地层关系可以发现两个现象：

一是，皇城墙基础部位的做法是，先挖出槽基，在其槽底大面积地施以夯土和一层碎砖层，然后再自下而上层层垫土夯实，形成城墙地基后再挖出墙体基槽；二是，发现了在原基槽的基础上，再次挖出基槽，再在槽底分别施以白灰层和夯土层后，用城砖砌筑基础。这样，在一个墙基断面上出现反复两次进行开挖墙基的做法，应当肯定，这种做法可使墙基质量更好，但同时实施这两种工艺，就使得第一次夯筑失去意义。再从地层堆积的叠压现象看，不能排除这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即这在原夯土墙基上的第二次开挖墙基的工程，很有可能是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所进行的“重建”工程，若从明中期将东皇城墙移建于御河东侧算起，至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东皇城墙已经历250余年的风雨岁月，自身必然会出现某些问题，在“乾隆盛世”，经济发达时期，“重建”皇城墙，是完全可能的（出土的城砖为48厘米×24厘米×12厘米，此型号的城砖清代也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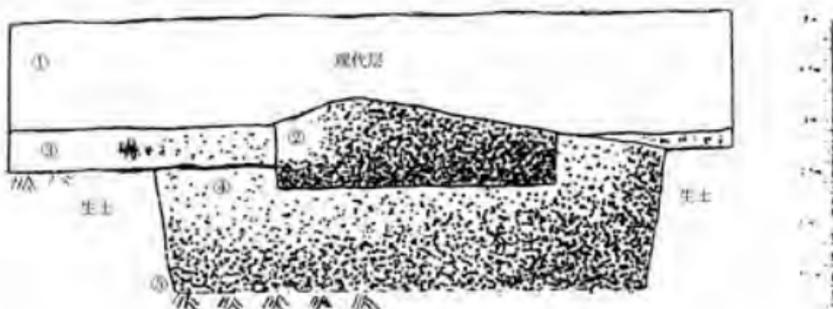
3. 东皇城墙被拆除的时间。

从皇城遗址总体发掘的出土物看，各层堆积物多是炉灰、黑渣土、砖块等，只出土了少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片多出土于距地表1.5米~2米深度的1~2层的堆积层中。其瓷片年代，没有发现明代中期以前的，除个别的为明万历以后的民窑瓷片外，多为清



图二 探沟 G1 北壁剖面图

① 淤土层 ② 古代垫土层 ③ 古代淤土层 ④ 夯土层 ⑤ 生土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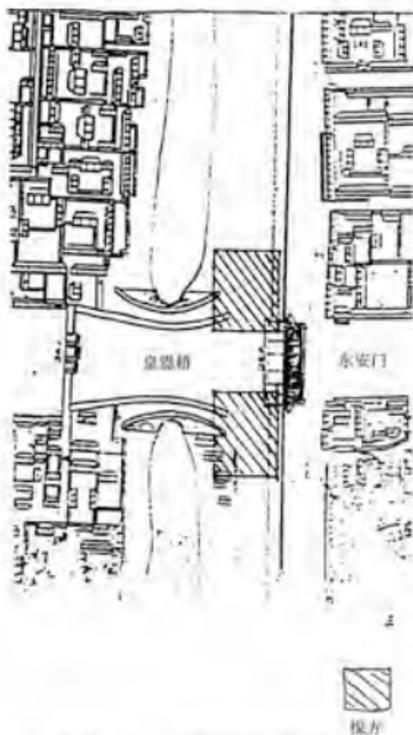
图三 平安大街北节点 T9 北壁剖面图

① 淤土层 ② 基槽 ③ 明代垫土层 ④ 夯土基槽 ⑤ 生土层

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民国时期的青花瓷片。从瓷片出土的地点看，皇城墙北端分布最多，在东华门北侧探方的 1.5 米以下的堆积层中，仅发现乾隆时期的青花瓷片一件，而在接近平安大街处的探方中，在距地表 1 米—1.5 米深的堆积中，出土了嘉庆、道光、光绪、民国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片达 30 余件。从出土器物的年代可以说明，皇城墙拆除的最晚年代是在民国中期，这同民国时期的有关拆除皇城墙的文字记载是一致的；从皇城墙遗址区域内的居民建筑看，这一区域的建筑都是 30 年代后期逐渐形成的，在全部民房的拆除过程中，同外城的民居拆除情况不同，极少发现从民居建筑中拆出皇城砖（所

发现的部分又认为是外城墙砖），这也可以说明，皇城墙的拆除是在此处民居形成以前，而且是用到别处了。此外，从东皇城墙遗址整体堆积层位和包含物分析，东皇城墙的拆除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几乎是南北地段同时进行的；从皇城墙地下基础挖掘的情况分析，可以肯定，当时拆除皇城墙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城砖。所以，不但地面的墙体城砖被拆光，就连距地表 3 米以下的墙基城砖，也在几个地段都被挖掘一空，使多处地段只剩下基槽中的夯土地基。

4. 确定了东安门及皇恩桥的准确位置。东安门遗址的发掘，是整个皇城墙遗址的重点，其发掘位置确定在东安门大街与



图四 加摹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皇城根南街十字路口两侧,即东安门大街的西半部(东半部压在南北路上见图四),共发掘面积 800 余平方米。在地表以下 1.5 米的深度内,都为清至民国时期堆积的生活渣土,在地表 1.5 米至 2.5 米以内,两侧探方各发现了东安门柱础的城砖残基。在遗址东侧发现南北走向的皇城墙五层城砖基础,砖体保存完好,砌筑整齐,工艺规范,砖基长达 10 余米。在其西部出土了明皇恩桥“燕翅”残迹。上述发现,印证了清代《加摹乾隆京师全图》的测量是严谨而准确的,从而确定了东安门、皇恩桥的准确位置。

根据《燕都丛考》记载:“东安门于民国十三年拆去……,东皇城根向南一段拆于十三年,向北一段,拆于十五年”。民国时

期,拆除皇城墙是社会和民众为了取砖建房的需要,而且城墙拆除十分方便,容易,而面阔五开间,规模很大的东安门为什么没有保留而首先被拆呢?是社会和民众的一种“破坏”行为吗?经现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东安门被拆除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为解决此处的交通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从周围交通环境看,东安门正处于王府井至故宫东华门和贯穿皇城南北的南池子大街、南河沿大街等横穿三条大道的必经之路,是繁忙的交通要道,特别是民国以来汽车逐渐代替了马车、黄包车,而东安门建在路中的三排立柱,已妨碍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通行;同时,整个皇城根地区较低洼的地势已被垫高 1.5 米左右,这样,东安门的通行高度已无法使汽车通过。因为以上原因,东安门在当时是必拆无疑的。就如同为了当时的交通需要而拆除地安门、西安门和正阳门瓮城一样。但是,应当解释的是,东安门的拆除与皇城墙的拆除,在当时的动机和需要上是有区别的,皇城墙被拆(特别是连地下 3 米的基础城砖都几乎被挖光),是一种带有“破坏”性质的取砖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城砖而做它用;而东安门的拆除,是因为民国以后,北京的社会发展和市政交通建设与皇城原有建筑发生矛盾后在当时所能采取的一种解决方式。

5. 东皇城根地区的地貌及变迁。

从东皇城根整体发掘的地层断面情况看,在明清时期,东皇城墙所在位置的高度均在现地表以下 1.5 米—3 米左右,但南北的不同地段相差较大。东皇城根自南至北的地表高差可以分为三段:华龙街至东华门北侧区域,皇城墙的原始地表高度比现地表低 2 米左右;东华门北侧区域至五四大街北侧地段,皇城墙所处的地表高度比现地表低 2.5 米至 3 米之间;五四大街北侧地段至平安大街前侧区域,城墙所处的原始地表高度比现地表低 2.5 米—1.5 米左右。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皇城墙整体上是处于御河故道的低洼地带,这一地势,目前仍可从北河沿大街西侧的传统民居普遍低于马路的现状得

到印证。根据对发掘的堆积层形成过程的分析,这一地势的改变,是从明代末期从皇城墙外侧逐渐填垫灰土开始的。特别是到民国后,皇城墙被拆光,整个东皇城根又因地势低洼,曾一度成为城市的生活垃圾场,致使御河被淤塞、填平;原河道上的皇恩桥等数座桥梁也深埋地下。30年代以后,皇城墙内侧逐渐被民房所覆盖,御河故道的西岸辟为贯穿皇城的大道——南河沿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目前仍保留的东皇城根南、北大街,是原明清皇城外侧的旧有故道,这条道路,仍能反映出明清东皇城墙外侧外沿的边线和走向。

按原规划中确定的方案,东皇城墙遗址发掘保护、展示工作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发掘东安门所处的遗址区域,通过发掘取得的成果,以掌握和搞清东安门的准确位置,然后,再对长达2700余米的东皇城墙遗址进行发掘、清理,掌握城墙的准确位置及建筑工程做法,在发掘工作获得准确详实的考古资料后,将在遗址公园中以三种不同方式进行复原和展示:一是在地下遗址完整准确,其位置在市政管线、交通道路允许的前提下,结合文献资料,依明代建筑形制复建东安门;二是保留一段通过考古发现的皇城墙墙体残迹,进行原状保护,并在遗址公园中对观众展示皇城墙历史遗迹;三是鉴于皇城北城墙原位置已被扩展的平安大街所占,为展示和说明皇城北侧城墙的位置及走向,将在东皇城墙北端与平安大街连接处,按历史上皇城墙使用的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复建一段墙体,以向社会展示和说明皇城东、北城墙的走向及位置。

东皇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反映东安门、皇城墙位置、结构、做法的考古资料,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并根据道路交通、市政管线的实际需要,对原方案做了调整:暂不复建东安门地面建筑,东安门以地下遗迹的方式展出。通过考古发现证明,东安门遗迹已深埋于现城市路面1.5米以下,若在原地而复建东安门,车辆将无法从门下通行;而且,东安门遗址的东部一

半仍压在东侧的城市道路上,整个遗址正处于王府井至东华门的道路中央,所以,东安门无法在原位置、原高度复建。因此,排除了复建方案,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在东西干道的南北两侧,各做一处下沉式的遗址展示广场,分别展示发掘出土的东安门残存的基础、墩台、望恩桥的桥基、燕翅、御河道及皇城墙基础等遗迹的原状陈列。

二、皇城的整体保护

1. 皇城的形成和历史变化。

历史上的皇城,是同北京城同时代修建的一座皇家宫廷建筑,是拱卫紫禁城安全和为帝王统治服务的皇宫外围城。文献记载,元大都城即在宫外外建有皇城。据《燕都丛考》记载:“明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又令指挥张瑄计度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百六丈。”其皇城位置在大都城中央偏西,以琼华岛为中心。据文献记载,元代皇城城墙称萧墙或红门阙马墙,其北城墙在今地安门南,东城墙在今南河沿西,西城墙在今西皇城根南街西,南城墙在今东华门与西华门以南,周围20里,皇城内包括宫城、兴圣宫、隆福宫及御园等。

明代皇城是在元大都萧墙旧址上改建的,其城墙较元代均向外有所扩展。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永乐四年,复建宫殿。……于内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南曰午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南曰大明门,曰长安左、右门,中曰东安、西安门,北曰北安门”。皇城中心是紫禁城,是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皇城内建有景山、三海等皇家御园和二十四署及各种监、局、厂、作、库等为皇家服务的制做、管理机构。明代皇城是国家禁地,据《燕都丛考》记载:“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

清代初期,皇城仍设四门,顺治年间,将南门更名天安门;北门更名地安门。至清中期,曾对皇城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据

《国朝宫史》记载：“皇城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使皇城的范围又有新的扩展。

民国元年，随着帝制的取消，皇城完成了历史使命，皇宫禁地被打破，因当时政治上的原因和城市交通的需要，对原封闭的皇城墙进行了拆除和改造。《燕都丛考》城池篇记述：“皇城四面，历年逐渐拆毁。长安左，右门民国元年即已拆去，仅余门阙，俗所称三座门者是也。乾隆时所增筑之围墙，亦是年改修。东安门于民国十三年拆去……。西皇城根如美清宫一带，民国六年拆去，以其砖移修大名濠……。东皇城根则向南一段，拆于十三年，向北一段，拆于十五年。北面皇城拆于十五年，皇城所余者仅矣”。又按，“皇城南而东西两端与阜城之天安门成一平线，民国初年，于东侧辟南池子门，于西侧辟南长街门，又西侧辟灰厂墙门。于是，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以及灰池、石板房诸处，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孔道矣。其皇城东面，则辟翠花胡同一门，以通马神庙大学堂之路，北面则辟宛平县署一门，以通德胜门之路。至民国十六年，则城垣尽拆，翠花胡同，宛平县署之新门，亦无余迹。”又记述：“皇宫东、西、北三面之外，旧有护宫营房凡数百间，倚濠而墙，藉宿卫士。民国十八年，北面一带均行拆卸，于东北西北西隅，建屋各五楹……。”

自民国时期拆除皇城墙至今已 70 余年，特别是建国以后的 50 余年，皇城内的古代建筑整体上基本保持了民国以来的面貌。

2. 保护皇城的重要意义。

北京是世界名城，也是全国六大古都之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建筑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古都的规划格局，城市的空间和重要的历史建筑群上，而处在北京历史名城中的皇城，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都城建设上的突出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古都的恢弘气魄。

北京古城，是以故宫为中心，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廓城，依次围成四个方城，层层相套，功能明确。皇城是全城的核心，是守护宫城的，外廓城是保卫内城的，即所谓：“廓以卫城，城以卫民”，其内城与外城的作用，都是为保护皇城并为其服务的。北京旧城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体布局严谨，以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城市中轴线贯穿南北；皇城居中，拱卫紫禁城，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五坛八庙分布四周，体系严谨，构思巧妙。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体建筑，都充分体现了皇帝至高、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而皇城的规划、建设，是封建的礼制法度与我国千百年传统城市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皇城原有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的城市性质与意识形态，早已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消失，现已成为我国古代灿烂文化在城市建设上的结晶。

北京是我国历史名城之首，是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建都之地，与国内所有历史名城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北京是延续七百多年的国都之城，国都是名城的核心内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除保护一般历史名城所具有的内容外，特别要注意保护好构成“国都”的这一重要内容。北京的明代皇城是在元代皇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历经五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但仍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上象征一国之都——皇城的布局规模和建筑特色，这是我国惟一保存完整的代表封建国都的——皇城建筑群，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国都建筑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3. 皇城保护的目标。

皇城曾是封建帝王对全国的统治中心，是随着封建帝王的统治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至清代末期，民国诞生，取消帝制，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制度的彻底革命，作为象征封建统治的皇城，理所当然地被新生的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有所选择的改造及拆除。解放后，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北京的内城与外城城墙被拆除了，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今天，我们是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特别是皇城在世界人类文明中所应占有的地位来考虑它的保护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目前,保护好皇城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国务院在1993年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曾明确指出:“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护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对皇城的整体保护做了明确要求。

皇城自民国初期以后发生了极大变化:原皇城墙的东、西、北三面城墙都已拆光;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这三个著名的城门已不复存在,遗址范围都为民居等建筑所占;其中,北城墙已成为展览的平安大街的一部分;自民国开始在皇城范围内不断兴建大体量的现代建筑,致使局部区域已面目全非。但是,做为皇城原有的主体格局和中心内容仍然存在,居皇城之中的紫禁城、故宫、太庙、社稷坛、皇史宬、三海等古建筑群都保存基本完好。特别是皇城内高度集中了北京地区最多的文物建筑精华,种类也最为齐全;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皇城中故宫占有一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天安门,北齐,团城、皇史宬、太庙、社稷坛、大高玄殿、景山、北大红楼、北京图书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中南海、普渡寺大殿、福佑寺、嵩祝寺及智珠寺、宣仁庙、凝和庙、昭显庙、西什库教堂、礼王府、升平署戏楼、圣心、佑贞学校等,此外还有二十余项区级文物单位和十四条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皇城区内的街道、胡同、四合院平房区大部分还存在,特别是紫禁城周围的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和景山周围街区的四合院基本保持原貌。

目前,文物专家和各界人士多次呼吁,要加强保护皇城的工作力度;建议要从整体上对皇城进行保护,要在整治的基础上将皇城申报为人类历史遗产项目等。要达到这一国际标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系列艰苦工作。对皇城实施保护的目标应当是:

(1)全面保护好以故宫为中心的文物建筑。要重点做好故宫、太庙、社稷坛、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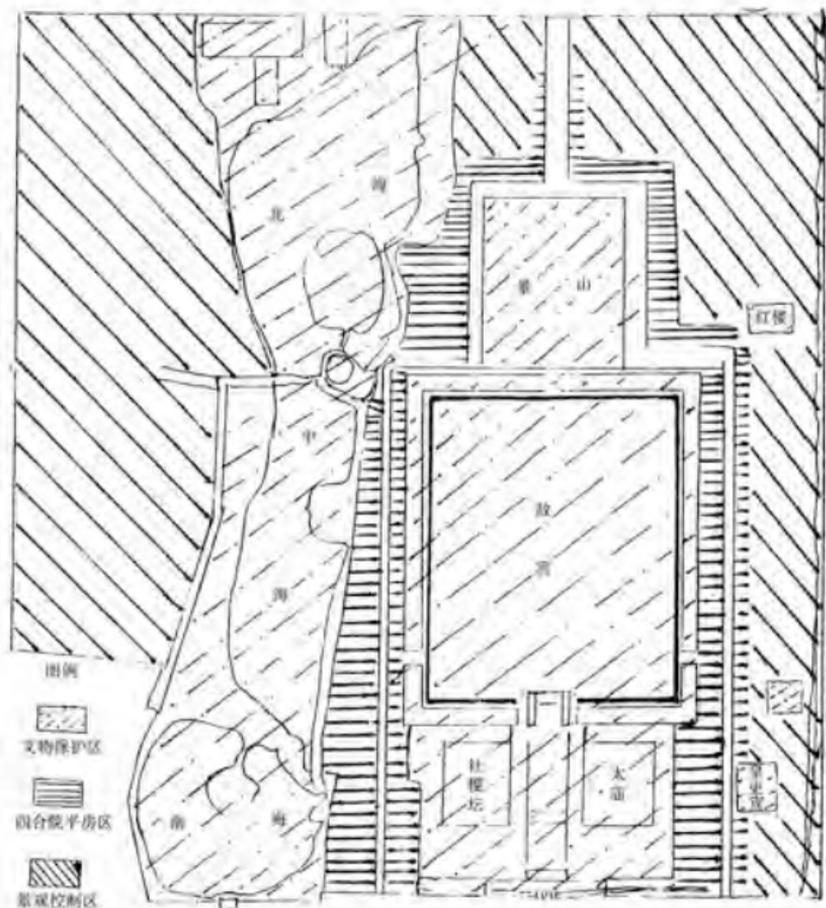
三海、皇史宬、大高玄殿等建筑的维修工程,要尽量保存古建筑的原有部分,维修部分要严格采用传统材料、工艺,使其历史传统价值得以延续。

(2)逐步搬迁文物建筑内的占用单位。由于历史原因,皇城内的很多文物建筑都被社会占用,使得一些文物单位或部分建筑不能修缮和对外开放;如故宫、太庙、社稷坛、景山等文物建筑内,都有数量不等的社会单位长期占用文物建筑,做为办公用地,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文物部门无法对使用的文物建筑进行维修,致使这些重要的文物建筑不能完整地对外开放。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占用单位和有关部门制定搬迁计划,创造条件,分步实施,若干年后实现目标。

(3)按原貌保护和恢复原有的传统四合院平房区。皇城区内大片的四合院、胡同、街道,体现了传统的民居形式和老北京的地方特色,这点已越来越受到国内乃至国际的关注,特别是完整地保护故宫、景山两侧的四合院平房区,继续保持其对故宫、景山等高大的皇家建筑起到衬托的重要作用。

(4)清除皇城范围内的现代建筑,重点是清理整治后期兴建的办公楼和住宅楼,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制定相应的总体环境整治和单位搬迁规划,根据国家的财力 and 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对保护文物的认识程度,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方可达到这一目标。

(5)要妥善保护反映皇城自明代以来所经历的不同时代及不同风格的重要建筑,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欧式和西方古典式及中西结合形式的建筑。如清代在皇城内建的欧式教堂建筑——西堂;1898年“维新”时期改革中国教育在皇城内建成的京师大学堂;1918年建成的北大红楼;1928年法国人建的圣心、佑贞女中等欧洲折衷主义建筑,以及1931年建成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和仿清代官式的北京图书馆等建筑,以上建筑因其具有时代的特殊价值,都已分别公布为国家级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这类建筑都应做为皇城的一个重要



图五 皇城保护规划示意图

组成部分加以保护。

(6) 创造条件在局部逐步恢复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和复建东安门、西安门和地安门。从皇城保护的长远发展看,皇城将最终实现完整保护,而且这一目标是可以做到的。建国初期,因文庙问题拆除了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城楼,40多年以后的今天,北京市政府就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就是证明。

为恢复皇城的完整性,东城区政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把东皇城根地区自民国以来形成的民居全部迁出,修建了以展示皇城墙为主的遗址公园,这也是我市整体保护皇城所开展的第一个战役。

4. 皇城整体保护的措施。

(1) 根据区域性质,确定保护办法。皇城地域广阔,其不同区域的功能差别极大,

今天,不可能将整个皇城都作为一个大文物原封不动的加以保护,应根据不同区域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在皇城整体保护的方法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整体保护的要求,划分三类区域实施管理:

第一类,是文物保护单位。以故宫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天安门、端门、社稷坛、太庙、皇史宬、景山、北海、大高玄殿等重点文物建筑,是皇城的精华所在,气魄宏伟,内容丰富,无论建设布局还是艺术效果,在历史名城中都是最突出的,为皇城的核心区,其整体状况完整,应全面加以保护。

第二类,是四合院平房区。是文物保护区周围的四合院平房区域,即对故宫、景山、三海等重点文物起陪衬作用的传统街区,包括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东、西、北街、陡山门街等大街两侧的四合院,历史上曾做为官署和皇家的各种库房用地,虽历经数百年,但其外观风貌和格局基本保持完整,做为紫禁城周围的民居背景,这些街区仍能从整体上体现出北京传统居住区的幽静、舒缓的街巷、胡同的风貌和格局,其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同时,它又做为紫禁城外部的建筑衬托,对故宫、景山等文物景区的环境协调起到重要作用,它是避免使故宫、景山等直接被现代化建筑包围的空间屏障,发挥着景观协调作用,因此,对这类建筑要严格保持其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及传统风格。

第三类,是传统建筑形式的景观控制区,在四合院平房区之外,接近东、西、北皇城墙这一区域,是对文物景观和四合院平房区产生环境影响的区域,包括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灵镜胡同,地安门东大街等皇城墙里侧这一周边区域。历史上这一区域也都是四合院平房区,但自民国以来,对这一区域缺少限制措施,使其出现了许多高层的现代化建筑,对皇城的原有风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对这一区域的保护要求,应当从目前的实际出发,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上的原貌——四合院平房,但这一区域对皇城的中心区,是发挥着外围环境控制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区域的建筑应限定为,以局部二

层为主的传统形式的建筑,以降低外侧城市现代建筑对中心区域的景观影响,使其发挥皇城外围景观环境的控制作用。(见图五)

(2)治理工作解决的主要问题:皇城的整体保护管理工作,应采取保护与改造相结合的做法,要保护其体现文化传统的优秀历史遗产,使以故宫为代表的文物建筑停滞在历史时期,传统形态上;改造其不能满足居民正常需要的落后设施和破旧的现状,依其历史面貌恢复其传统形态,形成既继承文化传统又适应时代要求的和谐统一的皇城面貌。当前,要重点解决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基础设施落后。由于历史原因,皇城内平房四合院区域的居住水平明显偏低,区域内生活配套设施条件较差,已有的上水、下水、供电、电信设施过于陈旧,供应能力明显不足,四合院区域内无燃气和热力管线系统,居民自装土暖气,燃煤采暖,影响了皇城区内的空气环境,也造成很多安全隐患;绝大部分院落无卫生间,共同使用胡同的公用厕所,十分不便。应有计划地对皇城内平房区域实施大市政的配套建设;电力管线等设施的改造,应从皇城区外侧的不同方向引入到内侧的平房区域,因地制宜,采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方式将市政管线送至每个院落,以提高皇城居民现代化生活水平。

第二,是传统平房破损严重。皇城区内的平房,四合院大都是多年老屋,以往的独门独院的居住环境,因解放以来人口增加,院内私搭乱建,而成大杂院,拥挤不成格局,加之长年失修,房屋多呈破败景象。根据对南池子地区的房屋状况调查,在5公顷的区域内,基本完好的平房四合院只占总数的4%,一般破损的占60%,都普遍年久失修;严重破损的占总数36%,其主体结构 and 主要建筑构件已残损,无法修复,属于改造类房屋。根据市、区有关部门制定的改造方案,此地区的危改工作,将本着:“保持整体风貌,完善居住功能,改善环境条件”的原则,依照原有街巷格局,根据房屋完损程度和院落规划条件,不搞成片拆建的方式,而是以院落为单位或几个院落联动的方式进

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内的
“五四”纪念碑(后面为
红楼)



东皇城根遗址公园中段保留的
明皇城东安门遗址

东皇城根遗址公园
南端的标志石
(照片由何力提供)



行改造,同时鼓励外迁,以缓解人口过密的压力。为保护四合院的传统格局,要制定严格的改造工作准则,明确房屋改造后的高度、体量、形式、色调,使改造后的区域再现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民居风貌。

第三,是现代化建筑过多。皇城的原有空间特色是,以故宫为中心,以景山为制高点,其东西两侧平房四合院开敞舒展;紫禁城的建筑高大突出;“左祖右社”这些大的建筑按轴线对称布置,富有节奏感。而今日,皇城区内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高大建筑,有的区域还开发成楼房小区,这些建筑,无论其高度、体量与布局手法等,都与皇城的特色格格不入,有的建筑已经对皇城的景观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从景山、北海等较高的视角观察,现代化的高大建筑已逐渐深入到紫禁城附近。对此,必须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同时制定整治规划,从现在开始,创造条件,分期实施,逐步外迁使用单位,拆除皇城区内影响文物景观的现代化高大建筑。

第四,是按整体保护的要求,重新调整皇城墙内侧周边的用地性质,应从建设区调整为皇城景观控制区,防止再产生新的现代化高体量建筑。

4. 制定皇城保护法规,依法实施管理。皇城的整体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对皇城实施保护管理,必须有法律、政策文献措施:

(1) 研究制定皇城整体保护整治的专项规划,确定整治保护的目标,分步实施。根据皇城的现状情况,应分别制定:“皇城地区文物占用单位腾迁规划”、“皇城地区四合院危房改造规划”、“皇城地区历史街区整治恢复规划”、“皇城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改造规划”、“皇城地区现代建筑整治拆除规划”等等。

(2) 制定皇城保护、利用的专项法规,皇城的保护、管理、利用工作必须有法规方面的明确规定。

第一,是制定皇城保护、管理、利用的专项规章,同时,依照“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等有关法规条例,对皇城地区实施管理工作。

第二,是设立皇城地区保护管理机构,

配备执法、管理人员,全面负责皇城保护、整治、管理的各项工作,负责各项整治管理规划的落实。

第三,是制定专项政策,开辟皇城保护、整治专项资金,为皇城区的整体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多年来,皇城的保护整治工作不能得以全面推开,除了政策上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外,缺乏大笔资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除各级政府部门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外,应考虑按“取之于文物用之于文物”的办法,由政府部门确定以下四种资金来源:一是凡皇城内文物开放单位,其门票收入中的三分之一的比例做为皇城保护整治的专项资金,若实行此方法,皇城内利用文物收取门票的单位有故宫、景山、北海、太庙、社稷坛等,每年可提留资金9千万元以上;二是皇城内经营单位缴纳税收的三分之一的比例提作专款资金,每年可收取资金3千万元以上;三是皇城内使用现代化楼房并对皇城景观造成影响单位,其房租的二分之一提作此笔专款资金,此方法,每年收取资金约1千万元以上;四是,皇城内居民住房每年上缴租金的二分之一提作此笔专款资金,每年可收取约1千万元以上。如实施以上方法,每年的专项资金总计可达1.4亿元以上。用这笔稳定的资金来源,依照皇城整体保护实施规划,分期落实,既可逐年完成皇城内改造危旧房,市政设施建筑、环境整治、搬迁占用文物的单位,拆除现代化的高大建筑,保护好皇城内风貌,又能使皇城整体保护、整治、利用、工作获得持续发展的活力。

皇城的整体保护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重大工程,我们面对的将是重重困难,在北京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的矛盾中,尤应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入探索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化都市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认真研究皇城整体保护的思路与办法并精心组织实施,使皇城所具有的独特的传统文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首都城市建设和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东岳庙文化庙会浅析

田
瑾

座落在朝外大街神路街上的东岳庙，始建于元代延祐年间。由于受到皇室重视，每年东岳庙里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尤其是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天帝的诞辰日，朝廷要派官员到东岳庙降香，城内居民也蜂拥于此，有资料载：“朝阳门外有古庙，以祀东岳天齐圣帝，規制宏广，像位崇严，为城东行宫第一，累朝岁时较修，编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圣帝诞辰，民间陈鼓幡幢，群迎以往，行者塞路。”^①这种北京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庙会雏形，元代在东岳庙已经出现。

随着明、清两代东岳庙被列入国家祀典，由太常寺官员岁时致祭，民间自发的敬香祈祷活动便日胜一日，尤其到了三月中旬，春暖花开的时候，京城内的百姓，扶老携幼，“倾城趋齐化门”。当时，逛东岳庙已经成为北京居民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而且东岳庙周边也形成了一个很可观的商业街市，在赶庙会的人中，除了香客还有客商，东岳庙会上的商业活动已经非常突出了。

东岳庙除了每年春节三月中旬开庙半月外，每月初一、十五也开庙，成为人们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场所。但随着时局动荡，民生凋敝，到了民国初年，东岳庙已开始逐渐衰败，冷落异常。“都人陈鼓乐旌旗，结彩亭乘舆，导驾出游，观者塞路。进香赛愿者络绎不绝。”^②的庙会盛景已经荡然无存了。

建国后东岳庙一度被学校、机关占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后，在文物部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东岳庙才得以收复重修。东岳庙一期工程收复面积约20000平方米，是原有面积的三分之一。修复后的东岳庙辟为北京民俗博物馆。

1999年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京东著名道观东岳庙，以举办文化庙会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北京民俗博物馆也以其崭新的面貌亮相于社会。选择这一形式，一方面是对历史上东岳庙会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通过民俗事项让人们在穿越时空隧道、回顾逝去时尚的同时，感觉时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以此展示民俗博物馆的专业展陈特征。因为在博物馆里举办庙会，东岳庙算是京城第一

家。第一届东岳庙春节庙会定位在“文化”二字上,庙会在策划、组织上注重展示东岳庙的历史文化和一些民俗事项。东岳大帝信仰起源于古代祖先对泰山的原始崇拜,直至近代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具有近700年历史的东岳庙,其声名之大,令众多的人士翘首企盼,更多的人希望到东岳庙走走,瞻仰其沧桑的精美建筑,重温东岳“大帝宝训”的深刻哲理。

这届东岳庙文化庙会,从展示东岳庙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到体现元、明、清三代建筑风格的古建群,古园林,从重新塑制的东岳大帝及七十六司神像,到集道家思想精髓、现代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楹联、匾额,和记述东岳庙民间事项的碑刻等,庙会主办者希望通过再现的历史场景,让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感知、了解,回味中国历史,古代宗教、传统文化的感人魅力。

为了丰富庙会内容,在挖掘东岳庙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主办者精心策划了“祈福迎祥,戴福还家”活动,这个活动是在传承东岳庙求福许愿传统民俗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创新和改造,是对祭祀文化的改体。活动定位基于对历史文化的回顾和对未来文化发展的思考。将传统庙会上的民间信仰成分变异为更具时代色彩的文化活动,并为这种文化活动营造一个场所,让它更贴近民众,更切合现代人们的心理需求。“福”历来被中国人看重,何为“福”?《韩非子》一书中说:“全有富贵之谓福”。“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意义上的诠释。但是祈福心理却是普遍的一种人生追求,是流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行为,是民俗传承者群体的共同心愿。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到今天,现代人赋予“福”的内涵更为博大。人们希望通过不同形式让追求“福”愿的心理得到满足。第一届东岳庙文化庙会策划的“祈福迎祥,戴福还家”活动为人们提供了这个场所。现代意义上的“福牌”设计,在形式上刻意追求节日氛围中的热烈、红火、喜庆,内容上像是人们互致贺卡,彼此表达一份心愿,一个祝福,一种祈盼,人们

用系“福牌”的形式表达了对美好事物追求的心理。这项活动是在利用民间信仰习俗的基础上,对东岳庙传统祭祀文化的科学改造。其富有的中华文化内涵和民众心理需求的切合,使活动赢得了观众,成为一种文化,一个活动亮点。旧的民俗消失了,新的民俗悄然兴起,“祈福迎祥,戴福还家”活动,做为新型文化是东岳庙庙会与其他庙会的区别所在。“祈福活动”作为东岳庙会文化庙会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突出文化氛围,庙会期间举办展览成为东岳庙文化庙会的又一特色。因为东岳庙是以北京民俗博物馆的牌子向社会亮相的,向社会推荐,展示博物馆的自身实力,是博物馆人始终如一的目标,在东岳庙一、二、三届文化庙会上,我们先后推出了《东岳庙历史沿革展》、《老北京春节风物展》、《龙年话民俗》、《百年老戏单》和《陕西民间手工艺品》等具有浓郁民俗特色的展览。这些展览在总体策划上既注重体现民风、民俗,又与社会形式结合。如在2000年庚辰龙年东岳庙文化庙会上推出的《龙年话民俗》展览,紧紧抓住世纪之交,恰逢龙年的契机。以“龙”为主题,民间文化为载体,从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说起,阐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根脉的认同意识,进而昭示中华民族在人类新纪元中,将如巨龙腾飞,走向繁荣富强的深刻含义。展览留给人们的历史文化知识,满足了人们希望了解龙年文化意蕴的渴望。在庙会陈列中,主办者始终把这一原则,即庙会期间的展览有别于其他时期的展览,更注重节令、民俗,追求热烈、喜庆,但展示过程要尽力做到大众化、通俗化,从而收到科普化的效应。

在有了前两届庙会较为成功的经验后,2001年东岳庙第三届文化庙会,更加强调了总体创意上的推陈出新。在突出东岳庙文化特色,强化庙会品牌活动的同时,活动策划、宣传炒作、场景布置、经营项目上注重推陈出新。2001年适逢新世纪的开始,以此为契机,庙会主题和活动策划一展新意。民俗文化味道更浓,寓教于乐的活动创意,

让固定的陈列品鲜活起来。老式轿车,传统的碌碡、石磨,观众不仅仅是参观,还可以亲自操作寻求一种感受。新的展示理念,受到各种文化层次,不同年龄结构的人们欢迎。博物馆的社教职能在庙会文化中也得到了更好地展示。这对于在新形式下如何发展传统庙会,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东岳庙三届文化庙会的成功举办,为东岳庙文化庙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庙会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以庙会为契机推进博物馆建设,是继三届庙会之后留给主办者们的思考。

一、揭示丰富深邃的东岳庙文化内涵,创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文化品牌

“祈福迎祥,戴福还家”做为民俗文化活动,从创意、策划到三届庙会的不断完善,已经构成东岳庙文化庙会上的特色活动项目,有媒体说:“东岳庙里的祈福活动,近几年来已经成为节庆的热点”。把“祈福迎祥,戴福还家”活动,作为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固定活动内容和东岳庙文化庙会的品牌,深入透彻地对民俗事项,对东岳庙文化内涵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更为科学地把握。

东岳庙的历史积淀十分丰厚,东岳大帝信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对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影响的印痕。东岳庙各殿、司神祇职能,楹联匾额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由此不难看出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民众心理、民众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这些文物内涵得到更深的发掘,其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把握脉络,科学阐释,用于丰富我们的活动创意,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从现代都市消费理念和旅游经济的视角看庙会发展

关于北京庙会有专家这样分析,“京城庙会近几年虽已成气候,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远不尽如人意,传统庙会正面临严峻考验。”庙会怎么办才能深入人心,这是庙会主办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庙会主题立意新颖,活动内容丰富是吸引人们参与庙会的主要方面,对参与庙会人员情况的分析也是办好庙会的重要前提。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特别是延长节假日以来,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收入水平与不同文化程度,人们的文化娱乐带有明显的差异性。从东岳庙三届庙会参与人群看,工薪阶层、中老年游人占的比重大。由此引发庙会组织者思考的问题是:庙会活动如何贴近这个群体,庙会经营项目、经营价位如何安排才能使这个群体的人们在假日里得到满意的消闲。因为庙会发展需要这个群体的亲和力。另外,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春节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家庭中的团圆。利用长假外出旅游已成为部分人的首选。如果能把搞好文化庙会做为介绍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的旅游突破口,让利用长假外出旅游的人们把逛庙会做为行程的一部分。体现传统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通过庙会活动展示、参与,营造人们所憧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氛围,使其更具吸引力,是庙会与旅游结合走市场化发展的方向。

三、实现庙会经营的市场化管理

传统庙会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供人们游乐和祭祀的香会,但若从经济的视角去看,庙会又有临时交易的集市意义。正如王秉成先生在《从经济方面分析北京的庙会》一文中所述:“每当祭日开庙之时,八方男女杂沓而来,络绎于途。这时,庙宇四国内外市廛栉比,摊贩杂陈,交易百物。且此种临时交易市场除以庙内原地为中心之外,更及于庙外,甚至延展至邻近市街。故庙会乃为繁荣市面的诱致区,同时也是延展为市集的策源地。”随着社会进步,经济日趋繁荣。庙会发展到今天,庙会经营已经成为“一日能销百万钱”的“喜庆消费”新方式,庙会挑起了

春节“假日经济”的大梁。从东岳庙三届文化庙会的经营情况看,作为中国传统习俗,庙会迎合了人们在节日喜庆气氛中的“消费冲动”,逛庙会花钱买个乐,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东岳庙举办庙会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从经营效果看,庙会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在庙会经营项目上,普通百货商品的利润率为50%,小吃商品的利润更高一些。庙会经营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强化经营管理,通过东岳庙三次文化庙会的运营情况,我们感到:①市场培育是庙会经营活动的前提。东岳庙文化庙会以全新的面貌刚一上市,许多商家就看上了这个市场,但从商业活动的诸多因素考虑,开始时许多商家踌躇不前。庙会的商机是靠人“烘”出来的。把握时机,培育市场,是庙会发展长远之计,东岳庙庙会组织者们为商家提供了优惠的经营政策。从前两届庙会看,庙会主办者直接的经济效益不多。庙会策划重点放在如何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吸引更多的游人,壮大声势。随着参与庙会人流的不断增多,东岳庙庙会经营活动市场培育工作的日渐完善,红火的“庙会经济”已经给东岳庙自身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庙会期间东岳庙周边的商业、餐饮业及服务业也受益匪浅。随着东岳庙社会影响的逐步扩大,火红的“庙会经济”将会拉动朝外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②庙会介入市场走经营之路。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从现行政策看是需要国家财力支持的。博物馆办庙会丰富了博物馆的活动内容,但其费用所需应该通过市场化运作解决。必须摆脱财政依赖心理,才能取得实际的经济效益。三届东岳庙文化庙会的经营情况已经让主办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靠财政支持搞庙会,承办者缺少风险意识和思想压力。经营活动的成与败似乎对承办者没有太大的影响,长此以往,严重影响庙会发展。庙会的整体策划和经营管理要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企业文化融入庙会文化,使二者相得

益彰。同时逐渐完成博物馆日常营销一体化工作,最终使庙会经营与日常经营达到完美结合。这样“庙会经济”和博物馆的发展建设成为一种互惠互补的关系,以此推动博物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发展。

四、以庙会为契机,在“馆庙结合”的工作方针上,不断发展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有学者预测:在新的世纪里最引人关注的是“吸引力”。怎样借助东岳庙庙会声势,发展作为从事社会领域人文学科研究的北京民俗博物馆,让博物馆对社会大众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真正体现其教育国民、娱乐大众、充实人生的社教职能,应该是继庙会之后博物馆的工作重点。首先,博物馆创建需有领先的思想意识,这是办馆思想方针的直接体现。博物馆工作的重头是展览,民俗文化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和发展空间,在新型的展示理念上,我们对展览的总体设计思想,不仅要考虑向观众传播知识和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让观众加深印象,有效地获取和记忆这些信息。这就需要突出展示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使博物馆具有真正的亲和力。同时,主动改变陈旧的管理模式,鼓励有序竞争,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与民俗文化相关的老字号等企业联合,将企业发展目标,公共关系宣传和博物馆建设定位到服务社会和人类。理性地探索博物馆事业社会化的发展途径,不断满足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理念感知、了解的需求。真正担负起向社会公众传播知识,接受教育的重任。使北京民俗博物馆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

①《长安客话·东岳庙》。

②《帝京岁时纪胜·东岳庙》。

(作者为北京民俗博物馆职工)

从刘李店 78H1 说姬燕建国

韩嘉谷

(一)

刘李店遗址是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群的一部分,位于董家林古城西,1962年和董家林遗址一起进行了试掘,获得了一批颇为重要的西周文化遗存。但当时对刘李店遗址早期部分的年代看法有分歧,参加发掘的北大学生实习报告认为是西周^①,发表的《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认为是商代^②,简报的这一结论影响很大,在1972年董家林遗址被确定为古城址后,由于城址出土遗物的早期部分文化面貌多与1962年刘李店发掘资料相同,因此也被认为此城的“始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商末”,甚至“应与郑州商城相差不多。”^③随着后来多次发掘,资料积累增多,才对城址年代的看法逐渐取得统一,确认“这座古城的始建年代不应晚于西周初期”,“这座古城应是燕周的都城,这里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④。特别是1986年发掘黄土坡燕国墓地,尤其是发掘了1193号墓^⑤,在出土的铜鬲、铜盃上发现有刻划燕侯内容的铭文后,终使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的始封地已无异议。”^⑥这是近年在燕国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由于近年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墓地的发现太令人瞩目,因而对与古城相邻的刘李店等遗址的研究相对显得薄弱。然而有关资料显示,对于这个地点的研究不可忽视,甚至在这里可能获得于董家林古城无法获得的重要历史信息,78H1灰坑的发现便是一例。此灰坑的价值如报告所说:“房山琉璃河遗址刘李店 78H1 的发现,可以说是以前不多见的重要发现。特别是在周

初封地燕国都城所在地域出土了这样一个较大,而内涵又较丰富的灰坑,证实商朝在北方燕国地区已有活动范围,为研究琉璃河遗址燕国都城的始建年代等问题增添了新资料。”^⑦

灰坑出土遗物皆为陶器,包括10余件鬲,2件四系壶,1件甗和4件罐,和已往包括刘李店、董家林等遗址在内的资料相比,其陶器群组合具有明显特点。报告作者是这样分析的:“陶鬲的形状与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中的M26:2的陶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西安老牛坡的那批陶器年代最晚为西周初期;间出一个灰坑陶甗外形与四盘磨SPM1出土的陶盆相同,四盘磨的陶盆年代为商代末期。由此看来,这座灰坑的年代上限可至商代中晚期,下限可推迟至西周初期。”^⑧报告题目命名为《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中说可“证实商朝在北方燕国地区已有活动范围”等内容着,表明作者是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座以商代遗物为主的灰坑”。作者还认为“陶鬲有中原商代陶鬲的因素,这种因素应是由南向北发展而至,……至易县、涿水,其商文化与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就有一定的变化,处于北端的琉璃河遗址更应如此。”这些对于H1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判断,直接涉及到商、周文化的基本特征,而周文化各自在琉璃河这个地方出现的时间和背景,而且时间又恰在商周之际,因而还涉及到燕国的最初建国过程,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6件陶鬲,有分裆和弧裆二种,基本造型接近,侈沿,部分唇面有凹槽,通体饰绳纹,多作扁席状,或在施竖行绳纹后,又在肩部横施一周带状纹,有明

显实足根。相似形式的陶鬲在以往发表的刘李店和董家林发掘资料中比较少见,但在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却能见到,成为这批遗物特殊之点,也是研究这类遗存的较好切入点。

首先应当说明,对于老牛坡墓地的文化属性,存在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商文化在关中地区的一个文化类型^⑤,也有人认为:“老牛坡出土的其他鬲(除 M45 的 E 型鬲之外)年代大体和殷墟一、二期相当,但风格与殷墟的鬲迥然不同,很可能属于周文化(先周文化)”^⑥。老牛坡墓地报告本身对其文化属性是这样叙述的:“所出青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型器物,形制、纹饰风格如出一辙,是典型商文化的产物;而所出陶鬲则别具风格,与殷墟陶鬲迥异。”^⑦报告作者刘士莪先生在《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初论》一文中还对此墓地的族属作分析,认为它不是羌方、周方、井方的遗存,可能和崇方或《尚书·立政》中“三亳阪尹”之一的西夷(戎)有关,同样也认为不是商文化^⑧。

关于这类陶鬲的文化属性,在扶风壹家堡遗址中也可找到线索^⑨,该遗址遗存被分作四期,第一期年代不晚于武丁,出土陶鬲以具有商文化特征的折档鬲为主,联档鬲仅见高足,不占主要地位;第二期不晚于祖甲时期,出土陶鬲以周式(郑家坡类型)弧档鬲为主,造型和老牛坡商墓出土者相同,有趣的是该遗址 H3:25 陶鬲,下部作周式弧档,上部却是典型的商式陶鬲口沿,真切地显示出周、周文化的融合;第三期(康辛至文丁)时曾受到以尖档鬲(刘家文化)的强烈冲击,这和整个晋、陕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期的商文化有较大发展,而到殷墟时由于先周文化的强大而出现退缩的情况相一致^⑩;第四期(帝乙、帝辛)时又变成为类似第二期以弧档鬲为主的文化遗存,主要区别是原先属于非周文化的因素几乎尽皆消失,保留和增加的都是周文化因素,此时已到了武王伐纣的前夕。壹家堡遗址展示的这一变化过程十分重要,它反映了商文化一度在关中地区获得发展,而后又被周文化吸收,融合,最后周文化替代商文化和其他诸文化的历史。

老牛坡墓出土的陶器群,大体相当壹家堡一、二期,是壹家堡遗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在一些鬲的折档、口沿、高足等许多部位,我可见到类似商式鬲的痕迹,但弧档鬲以及部分鬲有较长的颈部等,已是武功郑家坡遗址先周文化的特征^⑪。人们所以对老牛坡的文化属性有是商、是周的分歧,也是对此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两重性见仁见智。从壹家堡遗址第四期陶器总的特点仍与第二期相似,但折档鬲完全消失等情况看,这支进入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经历了与商朝本土商文化发展迥然相异的经历^⑫,到后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周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再认为是商文化。

刘李店 H18 陶鬲在器身稍高和折档等方面,表现出和老牛坡陶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壹家堡可找到更相似的形式,该遗址第二期的 H25:4 和刘李店 78H1:6 极为接近,区别只在前者档部略窄,后者联档较平。从李店 78H1:6 出土的四系罐、圆腹罐等其他个器物看,刘李店 78H1 明显要晚于壹家堡二期(下详)。这就是说,刘李店 78H1 已经历了较壹家堡二期时间更长的“周化”过程,它更应属于周文化范畴。

若把刘李店 H18 的陶器群和商朝本土商文化陶器相比较,可明显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琉璃河遗址以南的太行山东麓,是商文化发源地,目前所见典型商文化遗存(不包含流动性较大的铜器)的分布,北部边缘至保定地区,发现的先商遗存有容城上坡^⑬、午方、徐水巩庄、文村、易县老姆台、定兴辛木、安新滩堤口等遗址,出土器物多和磁县下七垣、邯郸涧沟、永年河庄等地的先商文化同,^⑭早商文化如涿水富位三期遗存,陶鬲造型同二里岗上层期^⑮;晚商遗存见于容城上坡、涿县官庄^⑯等地,陶鬲造型同殷墟。上述这些不同时期典型商文化遗址,从先商时期到商代晚期,分布范围皆止于拒马河,拒马河以北至今未见。

拒马河以北见到的只是商文化因素,除流动性较大的铜器外,也有类似殷墟晚期的商式陶器,但多和西周晚燕文化或燕山南麓

土著文化共存。属于西周姬燕文化遗址的如 1962 年刘李店的发掘资料、董家林古城早期陶器群^①、黄土坡墓地^②、满城要庄^③李店 78H1:6 和大大坨头 H3^④等,绝对年代都已进入了西周,所以这种商文化因素只能属“叛逆”,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商文化;属于土著文化遗址的如房山塔照^⑤、蓟县张家园^⑥、刘家坟等遗址^⑦等,也是作为姬燕文化组成部分对当地土著文化的影响出现的,并不是商文化的直接传播。所有这些包含在姬燕文化或土著文化中的高式陶器,基本特征皆是沿缘上弯,分档,矮袋足近平,一般器宽大于器高,粗绳纹竖行排列,和殷墟晚期的陶器非常接近,“若无周文化因素共存,则很难断定年代属商还是属周”^⑧,这才是由商文化直接传播而来的真正商式高。文化面貌和这些典型商文化相异的刘李店 78H1:6,决不是商文化由南向北直接传播而来的。

应该说,刘李店 78H1 的陶器群,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颇为典型的周文化特征,如鼓腹弧裆的 B 型 III 式高,即是典型的周式高,在泮西和董家林古城等周文化遗址中常见,是周文化的重要代表性器物之一, A、B 型罐也只能在董家林古城等西周文化遗存中才能见到,所以它应当是由关中地区东来的周文化。这支周文化有可能像查堡堡、老牛坡遗址那样,它原先属商文化的一支,西移后长期在离开商朝本土的环境中发展,陶器群的演变形成了和商朝本土不同的形式,尽管实际年代已经较晚,但仍然保持着类似老牛坡、查堡堡商文化初期中时的特点,如高作分档和器身略高等。不过商周之际的周文化,是在融合了关中地区许多古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陶器谱系和造型颇为复杂,其中亦不乏高作分档和器形稍高的形式^⑨。

其实在与房山琉璃河遗址相距 30 公里的镇江营遗址,也出土有与刘李店 78H1 相类似的陶器,包括高、罐、四系罐、甗等,只是包含在具有张家园上层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第三期遗存之中。高在《镇江营与塔照》报告中被称作鼓腹高,皆作联裆,尤以 A、B、C 三个型式的造型最为相似(见图 149。

150),早、中、晚各段都有分布,是该遗址商周时期第三期遗存的主要成分之一。A、B 型两种陶罐在镇江营皆称作鼓腹罐, A 型罐的相似标本见报告(图 165-4、13), B 型罐的相似标本见报告(图 165-8),四系罐见图 166-2,甗见图 158-13、23。张家园上层文化是燕山南麓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燕山山地迤南至保定地区,年代从商周之际开始至西周末年,其基本特征是:燕山南麓的土著文化因素在整个器物群中居主要地位,主要代表器物是饰带状花边的筒腹高;同时又有大量姬燕文化遗物共存,包括周、商二种因素,商文化因素的主要代表是接近殷墟晚期特征的矮裆袋足高,周文化因素的主要代表就是与刘李店 78H1:6 相同的联裆鼓腹高。按照这一线索,还可发现 1962 年刘李店遗址发掘出土的 I、II 式高, 1995 年董家林古城址发掘中出土的 C 型联裆高,实际上都属镇江营发掘报告中的鼓腹高,和刘李店 78H1:6 的陶器属同一谱系,刘李店 78H1 是属于周文化系统的。

(二)

刘李店 78H1 的年代,发掘报告根据其陶器的部分特征与老牛坡相似,定为商,其实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老牛坡陶器多作侈沿、折裆,裆部略高,与 59 武官 M1:23 造型相似^⑩;而刘李店 78H1 口沿皆外折,唇缘多有溢泥向内抹平而形成的凸棱,这种由制作手法形成的特征,目前多见于姬燕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中姬燕文化因素的鼓腹高、盆、罐口沿。刘李店 78H1 陶器虽多作分档,但裆部较矮,其中 B 型 III 式高已是典型的周式弧裆高,与泮西遗址的 Aa I 式高^⑪和董家林古城出土 C 型联裆高相近。刘李店 78H1 出土的阴承罐、甗、鼓腹罐等其他器物,也都可在附近一带的西周早期遗址或墓葬中找到相似形式,除镇江营遗址外,四系罐还见于满城要庄西周遗址;鼓腹罐和甗曾见于董家林古城以及 1962 年刘李店遗址和蓟县张家园上层^⑫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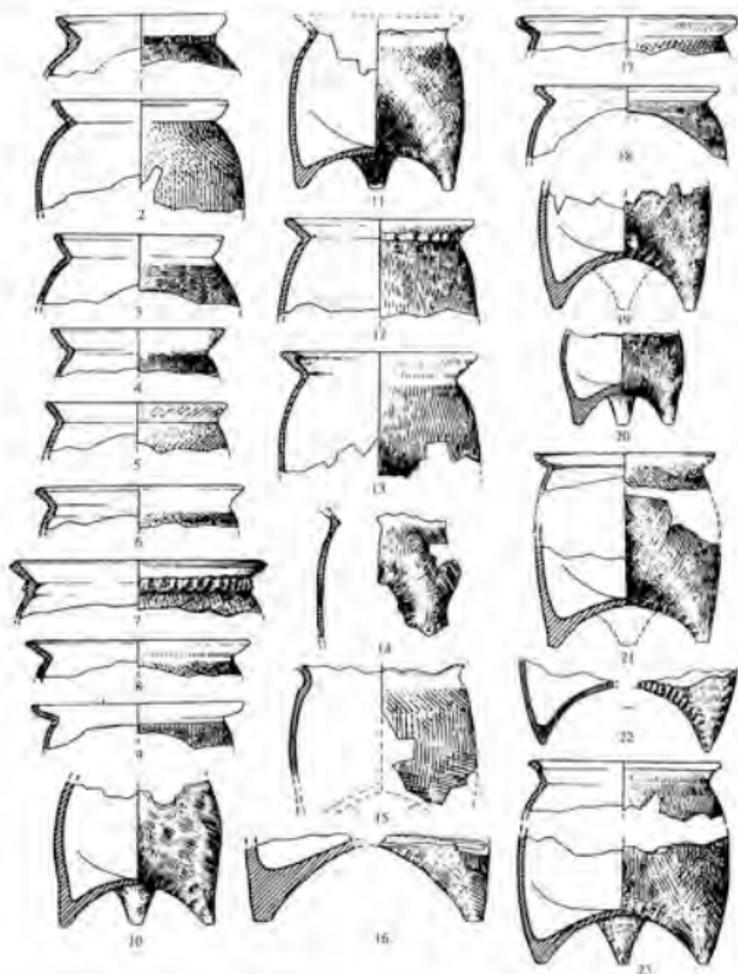


图 149 商周第三期陶鼓残高

1. A 型 I 式 (FZH175:1) 2, 3. A 型 II 式 (FZH1336:1, 2) 4. A 型 III 式 (FZT1206⑥B:1) 5. B 型 I 式 (FZH454:10) 6. B 型 II 式 (FZH476:2) 7, 10. B 型 III 式 (FZH966:3, FZH215:1) 8, 11. B 型 IV 式 (FZH953:10, FZT1907:13) 9, 12, 13, 16. B 型 V 式 (FZT1406⑤C:9, (FZT1910⑤:5, FZT0906⑤:14, FZH200:3) 14, 15. B 型 VI 式 (FZT267:1, FZH639:1) 17, 19-21. B 型 VII 式 (FZH429:4, FZT1308④A:8, FZF4:1, FZT1208⑦:1) 18. C 型 II 式 (FZH1267:1) 22, 23. C 型 I 式 (FZH514:1, FZH946:3) (16, 1/4, 余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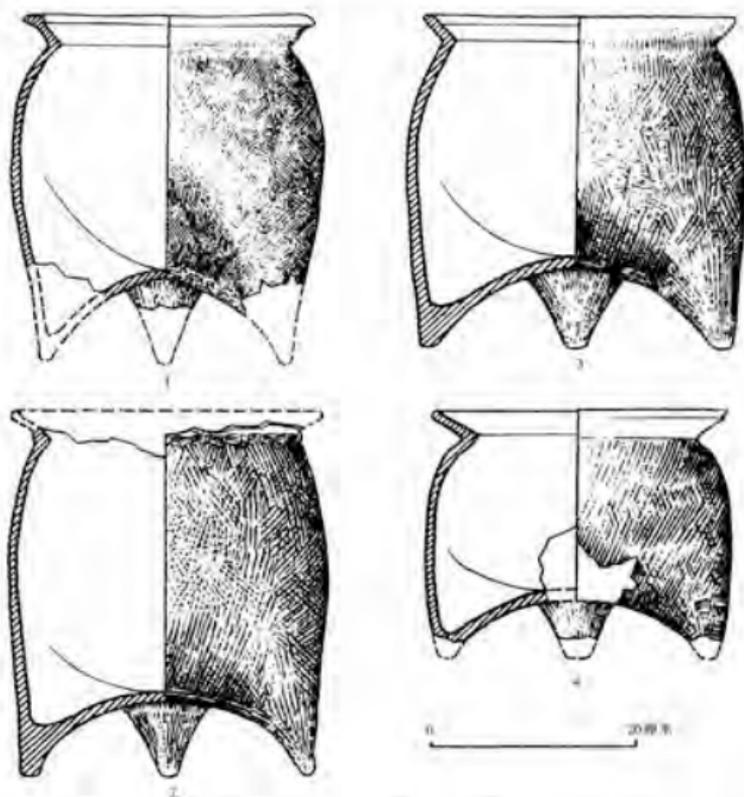


图 150 商周第三期陶鼓腹饰

1. B 型Ⅱ式(FZH1000:1) 2. B 型Ⅴ式(FZT1910⑤:1) 3. B 型Ⅵ式(FZH1324:1) 4. C 型Ⅱ式(FZH713:1)

资料。所以即使刘李店 78H1 陶质表现出某些略早的特征,也应与上述西周遗存相距不远。

由于刘李店 78H1 出土的各类器物在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中都能见到相似形式,因此镇江营遗址的分期资料,可为刘李店 78H1 的年代提供线索。鼓腹高在镇江营从第一段开始即出现,但缺乏复原器,从 FZHT0911⑤:1(E I 型)残片看,似有器身略高的特点,接近刘李店 78H1,到二、三段时器身便显著稍矮。四系罐也从第一段开始

即有,但缺乏复原器,难以比较,如果刘李店 78H1 四系罐的颈部复原图像不误,则其较短的特征接近殷墟同类器物,年代较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三段的四系罐略早。鼓腹罐和甗皆出现在第二段。因此刘李店 78H1 的陶器,以高为代表的一些因素接近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有的已至二段。

镇江营商周第三期的一、二段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二段陶器群不仅数量多,种类繁杂,而且还有数量较多的“鬲式高”;一段



图 158 商周第三期陶瓶

1. A型Ⅰ式深腹瓶(FZH175:10) 2,3. A型Ⅱ式深腹瓶(FZH507:13, FZH1056①:9) 4-8. A型Ⅲ式深腹瓶(FZH1382:1, FZH161:8, FZH1000:8, FZH1336:3, FZH1911:4) 9. B型Ⅰ式深腹瓶(FZH454:28) 10. B型Ⅱ式深腹瓶(FZH1278:12) 11-13, 15. B型Ⅲ式深腹瓶(FZH1382:2, FZT1307①B:1, FZH210:6, FZH459:11) 14, 16. B型Ⅳ式深腹瓶(FZH1535:4, 5) 17. B型Ⅴ式深腹瓶(FZH1277:3) 18, 20. C型Ⅱ式深腹瓶(FZH1911:1, FZH200:4) 19. C型Ⅰ式深腹瓶(FZH1123:10) 21, 22. C型Ⅲ式深腹瓶(FZH649:1, FZH267:7) 23, 24. 瓶底(FZH200:2, FZH946:30) 25. 瓶盖(FZH10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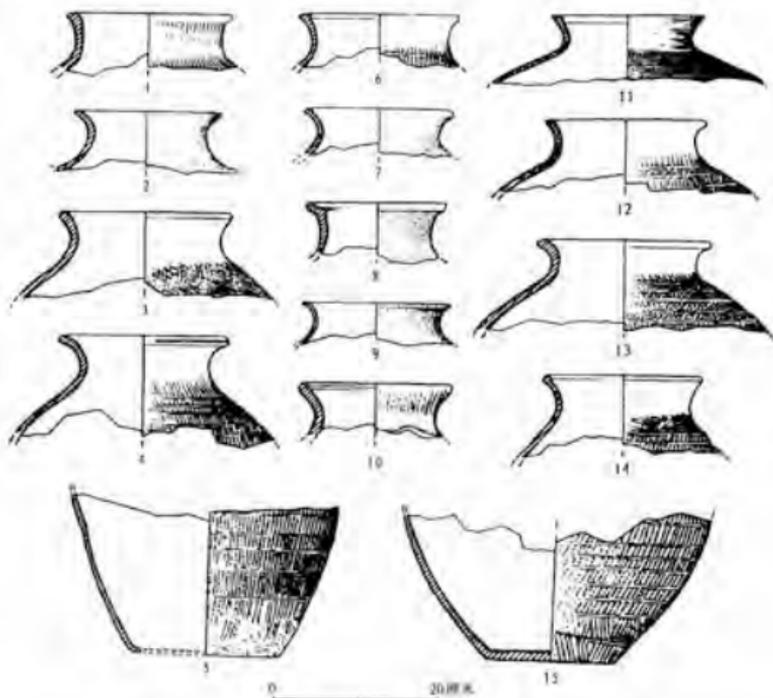


图 165 西周第三期陶鼓尊壁

1. A型Ⅱ式(FZH1002:3) 2. A型Ⅵ式(FZT1206①A:1) 3,5,9. B型Ⅴ式(FZT1908①:34, FZH1890:5, FZH896:28) 4,15. B型Ⅵ式(FZH897:22, FZH214:1) 6. A型Ⅳ式(FZH161:10) 7,12. B型Ⅰ式(FZT0911①:12, FZH175:2) 8. B型Ⅲ式(FZH1330:11) 10. C型Ⅳ式(FZH425:18) 11. A型Ⅴ式(FZT0908①:1) 13. B型Ⅱ式(FZH476:5) 14. C型Ⅱ式(FZH245:3)

遗存单薄, 遗物数量少, 器类简单, 不见“商式隔”。报告根据陶器形制, 把二段判断为与黄土坡墓地的 M26 相当, 属西周早期, 是可信的, 不过没有说可以早到什么时候。《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报告》把该墓列为该墓地西周早期墓中最早的代表^②, 但和镇江营报告一样, 也没有说明可以早到西周早期的什么时候。然而这是了解镇江营西周第三期遗存第一段遗存和刘李店 78H1 年代的关键, 需要仔细分析。从黄土

坡墓地和董家林古城的布局看, 二者应是同时开辟营建的, 因为黄土坡墓地的分布, 无论是近年发掘时划分的 I 区还是 II 区, 所有墓葬都在古城东城墙(包括城墙残去部分的延长线)之外, 界线分明, 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的。这个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是燕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 应开始于成王时册封第一代燕侯, 根据是近年发现的琉璃河 M1193 号墓及其出土的《克罍》、《克盂》铭文。按照此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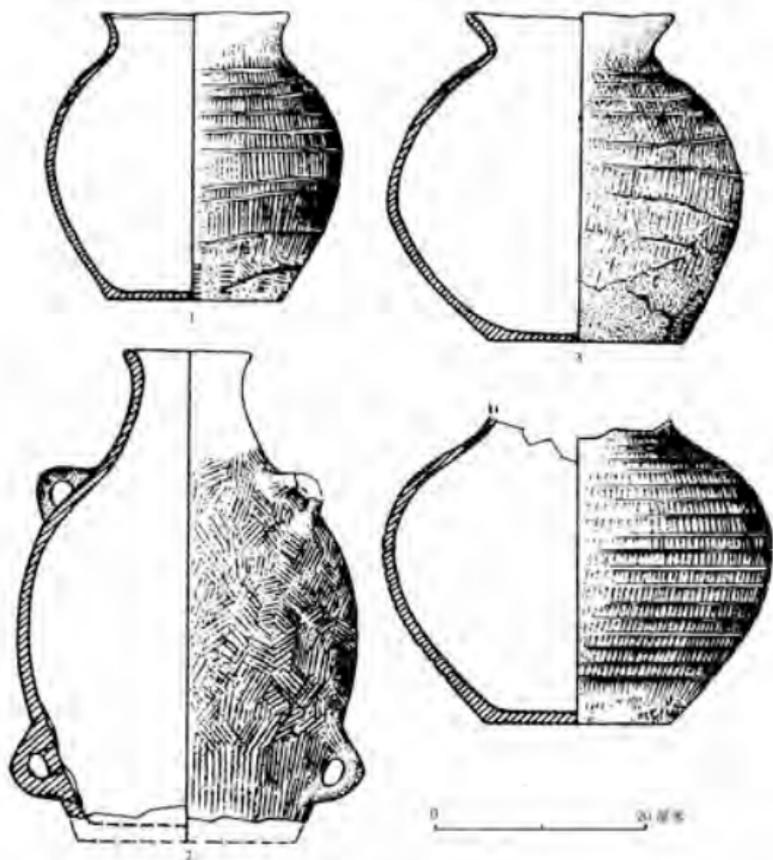


图 166 西周第三期陶罐

1. C 型【式】鼓腹罐(FZH694:4) 2. Ⅲ式四系罐(FZH896:1) 3. C 型Ⅲ式鼓腹罐(FZH896:37) 4. B 型Ⅳ式鼓腹罐(FZH906:13)

型制规格和出土器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座燕侯墓，C¹⁴年代测定数据距今 1000 ± 20 年，属康王的纪年范围（公元前 1020—996 年）^①。对于《克罍》、《克盃》铭文的释读，目前尚存在分歧，关键是其中“克”字。我们亦认为“克”是人名，这样读不仅意思简单明了，于文理更显通顺，也符合古籍关于“以元子就封”的记载。铭文的内容是：

王曰：“太保，德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鬯，铸克、克、般、孚、取、微。”克申（勉）谏，入土采厥又（有）嗣。用作宝尊彝。^②

这里所以举此全文，是想强调说明三点：一、封克为燕侯是周王向召公提出来

的,这是因为周武王克商后,已经“封召公奭于燕”(《史记·周本纪》),燕地事务当然由召公负责,但由于武王死后,继位的成王年幼,需要周、召二公在京师辅佐,所以成王时又册封召公的长子克为燕侯,到燕地管理燕国事务,这就是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的“以元子就封”,由此诞生了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燕侯。这一情节表明,在成王册封第一代燕侯之前,姬姓燕国已经存在,它是由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开始的,是燕国的初创时期。召公不住燕国,也无“燕侯”之称,至克封为燕侯,燕国历史才进入由燕侯管理的时期。燕国初期历史上的这一情况,考古资料不会没有反映。

二、克受封时,周王不只“授民授土”,还将当时已经归附周朝的许多氏族部落军队归其统率,声势浩大,这是燕国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新起点,董家林都城和黄土坡墓地都是在此时开辟修建的。燕侯统率的这些氏族部落军人,是周朝在燕地实行军事殖民的骨干力量,西周早期姬燕文化遗存中起主导作用的周文化成分,应是由他们留下的,所以董家林古城堆积一开始,便有大量周文化成分出现。由此推断,和周文化同时出现在董家林古城中的商文化因素,应当是由“殷遗”留下的,燕侯受封时必是还得到了大批“殷遗”。铭文没有提及“殷遗”的情况,但在《左传》定公四年记子鱼追述成王分封时,说周王曾对鲁国封以“殷民六族”,卫国以“殷民七族”,作为对周朝元老重臣的召公封地,没有不赐予之理。黄土坡墓地发掘者说:“在东北部稍远处,可能还有商族墓区”。^⑤该墓地出土的M253“董鼎”,M52“复尊”和“复卣”,铭文尾部分别有“”和“”族徽,有研究者认为即是“殷遗”徽识,^⑥极有可能就是周王分封时赐给燕侯的“殷民”。^⑦刘李店 78H1 和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一段皆不见商式高,但在董家林古城,以及和董家林古城相当的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二段,商式高却突然大量出现,可认为是燕侯来燕之时带来了大批“殷遗”的证据。所以不见商式高的刘李店

78H1,应略早于董家林古城,姬燕文化在此时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差别。

三、克接受周王“授土授民”,成为燕国土地的主宰,死后葬于燕国公共墓地,时间在康王时,生前受封当在成王之时,具体时间应是成王四年大封。这次分封是平定管、蔡及淮夷之乱后进行的,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达亲戚以蕃屏周。”《左传》保存有这次分封的许多封国名,其中没有燕国,是因为书中所举的姬姓诸侯,都是由周公主持册封的“文之昭”、“武之穆”以及“周公之胤”,即周人宗族中文王和武王的嫡系子孙,而召公是周文王庶子(见《世本·氏姓篇》),故不能进入此行列。然而燕国是当时“藩屏周室”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周武王克商后,为在新取得的领土上实施有效的统治,在商朝本土上封建了管、蔡等国,在商朝本土的东、南、北三面分别封建了齐、鲁、燕三国,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封国,在召公不能亲自前去主政的情况下,没有不封之理。从《克罍》、《克盃》的铭文内容看,燕侯之封是在召公在场的情况下,由成王亲自向召公提出建议册封,确不属周公主持的分封,不过在分封时间上应和鲁、卫等国相距不远,这一点可由《诗·鲁颂·閟宫》有关鲁国分封的文字得到说明,其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为周室辅。…乃命鲁褒,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若将《克罍》、《克盃》铭文和《诗·鲁颂·閟宫》相比较,可发现二者在格式、语气、内容等诸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一是记周王向召公建议,“令克侯于燕”;另一是记周王向周公建议,命伯禽侯于鲁。两国都由长子赴封国为第一代“侯”,召公和周公留居京师,这一情况是由当时周朝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册封必然时间相若。

燕国的第一代侯克封于成王四年,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燕国公墓都从这个时候开始开辟修建,这是以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墓地为代表的姬燕文化遗存的年代上

限。虽然不能排除在都城修建以前,当地已有人居住,但发掘中发现,叠压在城墙下早于都城的一些灰坑,在建城时都已被清理掉,因此目前还不能分析出都城修建以前的遗迹和遗物。文化特征与董家林古城相似的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二段,也应始于此时;早于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二段的第 1 段遗存,以及文化内涵与之相似的刘李店 78H1,则应在第一代燕侯分封之前。

(三)

刘李店 78H1 一类遗存能早于周封第一代燕侯之前多久,决定此时间幅度的关键,自然在于文化遗存本身。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期遗存第一段的年代,报告定为尚未,依据是 A I 式簋,认为“此型簋属殷墟第三期的典型器物”,因此结论说:“商周第三期遗存是尚未至西周中期时拒马河畔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不难看出报告作者认为其第一段遗存是属于商代的。此结论似可商榷,因为报告据以断代的惟一根据是 A I 式簋具有殷墟三期的特征,然而这种腹部较鼓的簋在殷墟三期以后仍继续存在,和腹部略斜直的 A II 式簋并存,小屯南地晚期的陶器群即是这样,其绝对年代已相当商代末年的帝乙、帝辛时期^⑩。不仅如此,这种腹部较鼓的高在黄土坡墓地也有出土,见于 M22,只是后者腹部刻一周仿铜器花纹,报告根据此簋定此簋年代“可能到尚未,其下限亦应在西周早期偏早。”然而同出的 II 式平档高,其形制同于董家林古城 1995 年发掘的 A 型联档高,也同于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的 F II 型高,皆不早于成王之时。此种高还和 1997 年洋西发掘报告的 C I 式高相同,出土这种高的 M12 和 M16 皆被列于洋西分期的第三期,属成王后期至康、昭时期。所以该报告还说:“第二、三期出土的一些器物,如联档高、股式簋……与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和北京琉璃河遗址中最早期遗存的同类器在形制、纹饰风格上相似,这两处遗址均是代表性的周

初封国遗存,其文化面貌应代表着周初成康时期的文化特征。”^⑪因此黄土坡 M22 年代应属成王封第一代燕侯之后,不能早而末是清楚的,出土 A I 式簋的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期遗存第一段只能略早于这个时期,不可能早至殷墟三期。殷墟第三期属康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测得年代为公元前 1205—1080 年,至商朝灭亡还有帝乙和帝辛时期,¹⁴C 测年为公元前 1087—1036 年,即使去掉被选定为公元前 1046 年武王克商以后的 10 年,也当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在此紧临商朝本土的地方,在这么长时间内不见商文化中最常见的典型商式高等器物是很难想象的。

刘李店 78H1 的年代,其陶器群中的 I、II 式罐,四系罐和甗,皆见于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期遗存二段,董家林古城和满城要庄西周时期遗存,不可能至商代。受人注意的陶高,虽然多数有分档和饰器身较高的特点,但有异于商式高,其中 B 型高更是周式高的典型形式,其折沿、夹角较小等特点,应略晚于洋西遗址出土的 A_n I 式高(H18:49),和墓葬出土的 A_n I 式高(96CSMM5:1)相似,属该遗址分期的第二期,绝对年代相当先周文化到西周文化的过渡阶段。刘李店 78H1 和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期遗存一段一样,只能略早于第一代燕侯册封。

这类较第一代燕侯册封略早,文化属性为周文化的遗存,按其数量不多,规模较小的特点,应是武王封召公于燕至成王册封第一代燕侯的姬燕文化遗存,符合这段时期燕国政权初创,国力不强,时间较短的历史。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需首先确定武王时召公的燕国之封是否存在,因为在《克罇》、《克盃》出土后,由于铭文记载了周王向召公建议册封克为第一代燕侯,因此对于此前有没有召公燕国之封产生疑问。有一种意见认为:“燕国的始封当在营建‘成周’之后。”^⑫这种说法在古代即有,《汉书·燕刺王旦传》云:“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也是说燕国在成周时建国的。

我们认为,燕国的第一代侯伯封确是在“成周”,但它和周武王时的封建燕国是两回事。燕国之封始于召公,正因为如此,周王在封第一代燕侯时需要向召公提出建议,和鲁国封伯禽为鲁侯时向周公提出建议是一样的。关于召公封燕,古籍记载都十分清楚,《史记·周本纪》记“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封召公于北燕”,《世本》、《诗谱》等也都有类似的文字。而且许多古籍在说到燕国时,经常与召公联系起来,如《燕世家》记齐桓公北伐山戎后,“使燕君复召公之职”;《中山王方壶铭》说燕咈误国时,是“内绝召公之业”;《韩非子》说:“燕君子哈,召公奭之后也。”这一切皆因为召公是燕国真正“始祖”的缘故,可见召公封燕之说不虚。

关于武王时燕国的封是否存在,还可由和燕国同时分封的齐、鲁等国的建国情况得到说明。召公封燕是在武王克商西归宗周之后进行的,这一点《史记·周本纪》等书也记载得很清楚。当时各国分封后,都各自紧张地进入了建国过程。武王克商时,对商朝的打击最为严厉,因此封于商朝本土的管、蔡二国的建立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障碍,只是这二国在武王逝世后,却勾结纣子禄父发动叛乱。在商朝本土之外的其他封国,由于所封地方自古以来一直是当地土著部落的天下,许多部落集团与原先周部落的情况差不多,有的还在克商过程中助过周人一臂之力,他们对周朝在自己土地上建立姬姓封国,天然地采取了抵制态度,所以建国过程十分艰难。

齐太公受封的营邱,即今山东临淄一带,是东夷族的天下,今在青州苏埠屯^④、凤凰台^⑤、寿光满宋台、火山埠^⑥等地发现的商代遗存,都表现出当地土著部落的雄厚实力。《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太公赴齐时,“夜亦而行,黎明至国”,形势十分紧张。当时“营邱边夷,莱人夷也,会封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即使这

样,初时的齐国仍一直处于夷人部落的包围之中,到成王初年淮夷作乱,齐太公接到召公代成王发布的命令,征伐夷戎部落,使齐国才从夷人部落的包围中解脱出来,成为东土大国。

周公的封地曲阜地区,今泰沂山脉南麓,晚商时期是淮夷、徐戎等的势力范围。今考古发现,晚商时期在这里占主导的并不是商文化,而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鲁西的济宁地区,虽然发现有具典型特征的高文化遗存,但数量极少,使人有“孤岛”之感。^⑦这里的土著部落在商朝时曾抵挡住了商人的势力东进,所以周公初建鲁国时便没有贸然至此,而是先在鲁山建国^⑧。鲁山地近于楚,周公摄政遭谗时曾一度居此,故《尚书·金縢》说“周公居东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奔楚。”鲁国在平定淮夷之前确已经建立了,从鲁山迁到曲阜是平定淮夷之乱以后的事。

古籍没有关于燕国建国过程的资料,因此引来种种怀疑,但传世《小臣捭鼎》有“召公稽颡”之词,可见召公也曾实践过其建国过程。不过当时召公的情况和齐太公、周公皆不同,太公没有随周室辅佐的任务,因此能躬身到齐国封地;周公虽有辅佐之任,但在遭谗后为避嫌,即干脆跑到封地去了,于是辅佐成王的重任便主要地压在了召公身上。召公既要把燕国建立起来,又不能离开京师,而二者相比,辅佐自然更为重要,他当时是周政权的核心人物,在处理人们对周公的谗言、平定管蔡及东夷叛乱,代成王向齐太公颁发征夷令、征伐纣子禄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封国之事只能派别人代理,小臣捭大概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在“召公稽颡”时要对他赏赐。待到东夷之乱平定,周公归政成王,周、召二公仍不能前去封国,于是另派他的长子为侯,前去主管封国事务,于是有了第一代鲁侯和燕侯之封。这个时候经过平定纣子禄父和夷戎之战,东方土著势力普遍被削弱,周朝国力大振,以封第一代

侯为契机，鲁、燕两国都开始了新局面。从上述大量的事实看，武王时太公齐国之封，周公鲁国之封、召公燕国之封，都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毋庸置疑，只是和这些封国的第一代“侯”以后历史相比，国之规模和实力均显得过小，但它毕竟是燕国历史开头的重要一段，不可抹煞。

从召公封燕到第一代燕侯之封，这段时间有多长，古籍记载不一。《逸周书·作雒解》记：“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情，肆于岐周。”《史记·封禅书》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似乎很快就死去。但《尚书·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王翼日乃瘳。”《史记·鲁世家》也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又说“群臣惧，大公、召公乃縶卜，周公曰：‘未可以或吾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藏其策金縢匣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后武王既崩，…”瘳，《说文》解释为“疾病愈也。”也就是说武王有病不适，但又痊愈了，并没有马上死去。瘳又有“差”，“损”之义，《左传》昭年昭十三年：“事齐楚其何瘳于晋。”注：“瘳，差也。”《国语·晋语》：“君不度而贺大国之丧，于已何瘳。”注：“瘳，损也。”极可能是武王得病后虽然没有很快死去，但由此病疴缠身，离不开周、召二公的辅佐。关于这段时间，《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而《汉书·律历志》则记：“（武王）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故《礼记·文王世子》曰：‘…武王九十三而终’。”《今本竹书纪年》记武王十二年克商，十七年十二月崩，即在克商以后又活了六年；又把鲁、卫等分封之事系于成王八年，这样从武王克商到成王分封，前后便共有十三年时间。如果按《汉书·律历志》记载，武王克商后又活了六年（卧病不起），再加上成王分封前三年，也当有近十年时间。事实上像在夷人包围中的齐国，通过齐太公修国政，发展经济，使原先怀敌意的夷人归齐，“齐为大国”，也决不是在三四年内能

够实现的。燕国在初封后即使派来建国的队伍人数不多，也应当会在封地留下痕迹，这极可能是刘李店 78H1 一类周文化遗存的来源，它具有商周之际周文化的特点，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完全符合这段历史。

这类遗存目前仅见于琉璃河地区，是因为召公封燕的始封地就在这里。琉璃河是今大石河，在《水经注》被称作圣水，流经古代的聚落“圣聚”。有研究者认为，“圣聚一名由来已久，而郦道元注《水经》时，已不明其原因，故有‘盖藉水而称怀也’之语。其实很有可能圣水当由流经圣聚而得名。”^①此说有理。从“圣聚”这个地名至少可以引伸出两层意思：一、它是聚落，《说文解字》云：“邑落云聚”，在规模和建制上都和都城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不应是指董家林古城，当另有依托；二、它是“圣人”的聚落，在燕国历史上能当圣人之称者，惟有召公一人。如果此推断不误，则“圣聚”就是召公“精燕”时曾到过的地方，后人推崇召公而称之为“圣聚”。刘李店 78H1 一类遗存在此发现决不偶然，燕国的最初建国活动也是在这个地方展开的。但“圣聚”是什么样子，至今对它还一无所知。

刘李店 78H1 一类遗存，至今仅一见，根据此不多的材料，要推断周代姬燕政权早期的建国历史，肯定会有疏误不周之处，诚望方家、读者指正。

①李伯谦：《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建城 3040 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1991 年。

②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 年 3 期。

③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1980 年。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 4 期。

- ①②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高代遗址》，《文物》1997年4期。
- ⑤李华：《关于房山琉璃河城址、墓地年代的几点看法》，《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 ⑥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 ⑦⑧⑨饭岛武次：《西周文化陶器研究》，《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
- ⑩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 ⑪刘士襄：《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初论》，《文物》1988年6期。
- ⑫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扶风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1期。
- ⑬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论集》1，文物出版社。
- ⑭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
- 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容城县上故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
- ⑯沈勇：《保北地区夏时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华夏考古》1991年3期。
- ⑰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 ⑱董振旗：《河北省文化局调查涿县北高官庄发现的古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
- ⑲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 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 ㉑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 ㉒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1期。
- 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㉔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9年。
- ㉕《新县邦均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碑工作队：《津西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4期。
- ㉖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4期。
- 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 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碑工作队：《1997年津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2期。
- 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
- 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 ㉛殷璋璋：《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新突破》，《考古》2001年1期。
- ㉜本刊记者：《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10期。
- ㉝赵福生：《西周燕都遗址》，《北京文博》1995年1期。
- ㉞张剑：《论西周燕国殷遗民的政治地位》，《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 ㉟张长寿：《西周墓葬的分区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1期。
- 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碑工作队：《1997年津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2期。
- ㊳山东省文物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凤凰台遗址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㊵寿光县博物馆：《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㊶张学海：《论四十年来山东先秦考古的基本收获》，《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㊷郑克煜等：《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 ㊸郭仁、田殿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

（作者为天津市博物馆研究员）

元代 大圣寿万安寺 知拣事迹考

黄春和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就是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白塔寺。元代时,寺庙规模宏大,“精严壮丽”,其“殿槛栏楯一如内廷之制”,^①寺中还有一座“坐镇都邑”^②的白塔,在当时有“西苑”^③之称。是元代皇室祈福的中心,也是我国汉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第一代住持名叫知拣,他是在万安寺建成后由忽必烈亲自下诏任命的。对于知拣其人,因史料记载甚少,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今年5月初,石景山区苹果园东口施工时偶然发现了知拣的舍利石函,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曾在白塔寺工作多年,当听到发现知拣石函消息后,立即勾起了我对知拣的研究兴趣。我重新翻检有关元代佛教文献,并结合新发现的知拣石函考证分析,获得了对知拣其人一些新的认识。故不揣庸陋,撰成此文。

一、知拣来历、师承、修学等事迹

关于知拣的事迹,《顺天府志》卷七“宝

集寺”的一段记载最值得注意:

宝集寺 在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五十武。寺建于唐。殿之前有石幢,记越建年月,昭著事实,备且详矣。其余已后兴创修造,复记于他石。兹寺之大概,今见于所撰宗原堂记。其词曰:宗原堂者,大宝集寺之丈室也。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宝集寺。唐碑亦有宝集之名,寺创于唐世可考见矣。辽统和间,沙门彦珩大开讲筵,继著彦琼,宗景,克弘圆顿之教。重熙间,慧缘以左街僧录检校文章应制大师闾紫,金传妙大师思愿尝命较(校)试经典。通慧圆照大师、崇穆大夫检校司空智遍,皆振其教于天会之时。大定间,沙门澄晖重兴寺宇,行业昭著。翰林学士承旨党文献公为题诸斋榜;大觉圆通。大宗师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一传而为领袖教都总统统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领袖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继以领袖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司徒郅国公知拣。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拣公开山主之,仍命同门

圆融清慧大师妙文主领祖刹，修治弊坏。后至者或久成速，缘尽而止，咸称其造。至正三年，晋宁则堂仪公被诏主寺，提纲挈维，靡不经意。循徒孔盛，宗风蔚然。公为释氏之学，历抵名师，经论禅律，莫不兼贯。燕坐此室，无异深山密林，与世事迥乎甚远。虚帘静夜，修竹隐映，心境两寂，悠然自如。及宏敞华严，根本教理，圆融行布，洞彻无遗。或问堂名之故，其以人应之曰：吾寺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壽延寿，泊草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深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此其原之当堂。宗者同源之伯，苟昧其本，则迷谬亦甚矣。况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观其根柢不齐，乃设方便演三乘五教，从小入大，由始至终，自顿悟圆。理事融通，法之归真，为群生之本体。麟宝集而宗于清凉，麟清凉而宗于贤首，置首宗云华，云华宗帝心，帝心宗龙树，龙树宗马鸣，马鸣宗文殊，文殊宗于佛。麟佛而宗于心，吾师即是心。而指定慧，因其言而诠解。脱心非心也，孰为之本？何宗何原，非言非默，当有证乎此者。仪公当承诏较（校）金书藏典，为撰绎释氏通鑑于斯，进请嘉禧殿。上览彻，嘉叹久之。余既序其书，复又纪其堂，并及宗原之旨，来者尚镜之。建于唐辽辽，方至金重修。中有三位：西曰学位；东曰库司；中曰圣位。有洞室四合，无碑刻，在里坊。^①

这段史料讲述的主要是大宝集寺从辽代至元代中后期历代住持传播华严宗的法脉传承情况，从辽统和时彦璋开始，中经彦琼、宗景、通慧圆照、智愚、澄晖、志玄、行秀、圆明、知拣、妙文次第相传，直至则堂仪公，共十二代，一直没有间断，这是北京佛教史和华严宗传播史上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其中，它对知拣事迹也作出了一些重要交待。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 知拣的来历。知拣来自大宝集寺，原是大宝集寺住持。宝集寺现已不存，其原址笔者曾作过考证，在今牛街以东、菜市口栏栅胡同以西，广安门外大街以南，南横街以北的地段上。^②元代时它的附近有大悲阁、

披云楼和旧市，人烟密集，景观甚佳。

2. 知拣的师承。知拣在宝集寺的前任住持是“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这位圆明就是知拣之师。我们从妙文生平可以推知。《大明高僧传》“妙文传”记载，妙文“二十一岁抵京师，师依大德明和尚学圆顿大教，遂陆沉于世十有一年”。^③这里的“明和尚”就是宝集寺圆明，因为圆明所传就是华严宗“圆顿大教”。“宗原堂记”明确记载知拣与妙文是同门，既然知道妙文之师是圆明，那么知拣之师应当为圆明无疑。在我国古代社会，佛教寺院住持多由师徒或同门之间递相传授。由此可见，宝集寺历任住持也保持了师徒或同门相传的传统。

3. 知拣入主万安寺时间，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是由忽必烈亲自下诏委派的。他人住的时间与当时万安寺建筑进程也完全相符。关于万安寺的兴建时间，过去人们认为是先建白塔，而后重建寺庙（主要指殿堂）；白塔始建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成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寺庙建于至元十六（1279年）；建成于至元二十五年（1285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按这种说法，知拣入主万安寺就存在问题了，而且连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④和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忽必烈命帝师、西僧造作佛事于万安寺^⑤等諸多史实也将被推翻，因为万安寺尚在建设中，不具备举办活动的场地和条件。很显然，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万安寺寺与塔的兴建是前后相随的，不过竣工时间不同而已。从史料记载分析，白塔始建于至元八年，^⑥寺庙应于次年动工；至元十六年白塔落成，^⑦寺庙亦初具规模；至元二十二年寺庙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⑧到至元二十五年终于完成“殿椽栏楹一如内廷之制”的宏大规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史料。据此，知拣入主万安寺就合理了。

4. 知拣的修学。知拣出自华严道场宝集寺，自然是一位华严宗的修学者和弘传

者。知拣在华严宗的弘传上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彦珍、克已等前辈宝集大德开创的华严宗宗风,而且还将它发扬光大,他和同门妙文讲主共同努力,使宝集寺华严法脉流向海内外各地,出现了十六个华严分刹,如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圣寺等。^⑩知拣对宝集寺华严宗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也成为了宝集寺“宗原堂记”中重点表现和颂扬的住持。

5. 知拣的宗教政治地位。《宗原堂记》上知拣著衔为“领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内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郾国公”。这一著衔包括了他多个职衔和封号。其中,“领释教都总统”所指应为大都路的最高僧官。“开内三学都坛主”应为一个地位很高的学衔,表明在戒、定、慧三个修学方面均有极高成就。“开内”应为“管内”之误写,指大都路。“开府仅同三司”和“光禄大夫”都是文散官名,为四十二阶的第一阶,属正一品,由宣政院授与。^⑪“大司徒”也无实职,是作为重臣和功臣的加官,元代不常置。^⑫“郾国公”应为皇帝赐予的封号或谥号。由上分析可知,知拣在元代宗教政治、社会政治和佛学上均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堪称元代第一流的佛教高僧大德。

据《佛祖历代通载》引《弘教集》记载,知拣曾受忽必烈诏请访问佛法:“帝问拣坛主云,何处为最上福田?回奏云:清凉。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为世福田。”^⑬又:“帝问拣坛主,何处有佛?拣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拣云:承活在于手,乾坤掌上平。”^⑭由此亦可见知拣是一位真实不虚的名僧。

另外,从“宗原堂记”的记载,我们对知拣入主万安寺的宗教背景也可获得一些重要启示。元代兴建的万安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它的建筑风格、殿堂供奉以及佛寺活动都带有藏传佛教明显特色,而元世祖忽必烈却派知拣这位汉地教门僧人为其开山住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从“宗原堂记”揭示的知拣的修学内容分析,知拣入主万安寺应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知

拣所学与密教思想一致。知拣所学为华严宗,而万安寺主要为藏传佛教兴建,弘扬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源于密教,又称“藏密”。华严宗与密教在关于世界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华严宗以“四法界”理论解释世界,而密教以“六大”的理论来说明世界,同时这两宗又各个具有融通他宗的思想特点。^⑮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应是知拣入主万安寺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二,知拣的修学与万安寺前身永安寺宗教属性相符。元代万安寺兴建之前这里原有一座寺庙,叫永安寺,始建于辽代,在辽代是一个显密兼弘的道场。辽道宗时曾有著名的“显密圆通法师”道殿在这里活动,举扬华严与密教融通的思想。^⑯因此知拣作为华严宗高僧入主万安寺,不仅保持了与寺庙过去宗风的一致,同时也延续了寺庙过去显密兼弘的宗风。由此可见,元代万安寺对辽代永安寺带有明显的继承性。而这一历史继承性在前后的寺庙名称上也有明显体现,辽代称“永安寺”,元代称“万安寺”,名称相近,意思则完全一样。第三,知拣修学的华严宗属于教门,与藏传佛教属于同一个门类。元代对藏传佛教没有单立一个门类,而是归于教门之中。《元史·释老志》载曰:“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好利云。”^⑰由于华严与藏传佛教是同一个门类,所以忽必烈派知拣出任万安寺住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当然,知拣入主万安寺可能还有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如元统治者重教抑禅等,就不展开讨论了。

二、知拣与《至元宝勘同总录》

由上可知,知拣不仅是一位住持僧,而且还是一位精通戒定慧三学的大学问僧,他曾因此获得“三学都坛主”的佛学头衔。目前,我们虽然没有发现知拣留下的佛学著作,但是他于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参加校勘,编纂的《至元宝勘同总录》足以反映他佛学水平之不一般。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共10卷。是一部佛教经录著述。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至元二十二年夏（1285年）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结束。它对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194人所译著的佛典1644部的目录，按照显教和密教的类别重新进行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异同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还用汉字标注佛典题目的梵文译音。每部佛典都有千字文编号，从“无”字起，至“植”字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部佛典目录著作就是元代官版大藏经目录。由于元代大藏经至今没有发现一套完整实物，无法对比予以证实。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佛典目录著作，它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这部经录著作是由忽必烈发起，并在他亲自过问下开展和完成的。为此，忽必烈专门召集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北庭等地第一流的高僧和学者来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到这项工作当中。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堪称汉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事。元释克已在《至元录》序中说：

惟我世祖薛禅皇帝，智极万善，道冠百王，皎慧日以镜空，翊慈风而被物。特旨宣庸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②

元庆吉祥在《至元录》卷一叙录中说：

惟我大元世主宪天述道仁文武大光孝皇帝……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译传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番粉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禁国师、湛阳宜思，西天粉底答尼麻罗室利，汉土义学元理二讲主庆吉祥，乃畏兀儿番牙答思、翰林院承旨弹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大兴教寺，各乘方言，精加辩质。^③

从这两段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忽必烈亲自发起这次校勘工作，并召集汉藏佛教高僧、学者参与的经过，以及忽必烈对这

次校勘工作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

当时参加校勘工作的汉藏学者共有29人，他们的名字，连同族属、籍籍、官衔、学术、校勘具体职务等情况具列于《至元录》卷首。其中，汉地僧人共有15位。在这15人中，知拣的名号就赫然在目，同时还有两位万安寺僧人“应吉祥”和“理吉祥”也列在其中。按《至元录》所列分别为：

大圣寿万安寺临坛大德崇教大师沙门应吉祥奉 诏校勘

大圣寿万安寺传大乘戒临坛大德沙门理吉祥奉 诏证义

圣寿万安寺都总统佛觉普安大师沙门拣吉祥奉 诏证义^④

在《至元录》卷首名单上，汉地僧人都是一个单字，而且都带一个“吉祥”号，万安寺三位僧人也是如此。知拣的法名省略了“知”字，而称他“拣吉祥”。但从其寺属和学术看，“拣吉祥”就是知拣无疑。

元代汉地僧人多带“吉祥”之号，不仅《至元录》中的汉地僧人如此，另外在《佛祖历代通载》、《全元文》等一些佛教史籍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带“吉祥”的僧人名号。这是何故呢？著名学者苏普仁先生认为它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⑤此说似乎笼统。《全元文》高祖《温州高祖寺暨公讲主碑》中有一段记载似乎说明了“吉祥”之号的真正来历：

“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泊诸名公入内殿视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普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⑥

由此看来，“吉祥”之号的确与藏传佛教有关，但应该是只有从国师受戒者方可得到这一称号。因此也可以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国师之戒弟子。

从《至元录》卷首的列名著，知拣在这次校勘中担任的具体职务是“证义”。“证义”是古代佛经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职务，它既是职务名称，同时也包含有职能和职责的意义。《佛光大辞典》解释：“任此职者，坐于译主之左，于译主宣读梵文之前，与译主共同

评量该梵文文句之义,又于汉译之后,核对原梵文之义,而判定该译语是否得当。”^②由此可见,知拣在这次校勘中充当的角色是非同一般的,具有把关定夺的重要权力,是校勘工作中的权威人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至元录》卷首所列 15 位汉地僧人都是清一色的汉地教门僧人,他们的学术都与教门相关,具有教门的明显标志,而没有一位宗门人物参与。所谓教门是指除禅宗外汉地流行的净土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以及小乘的成实、毗昙诸学说。这些门派都注重佛教教理教义的讨论和宣说,所以被归为教门;宗门则专指禅宗一派,此派轻视佛陀言教而重视证悟,与教门形成明显区别,所以单独列为宗门。唐代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创宗立派,开始出现宗门和教门的分野,此后相沿成习。历史上禅教之间或净或和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元代如此重要的汉藏高层人士参与的佛学活动中,没有一位禅宗僧人参加,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它和当时的禅教之争应有极密切关系。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多次召集禅教僧人同法辩论。如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颁旨,选天下道德兼备者,禅教师德,就燕都设会,令二宗论议”^③。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又召江南禅教人物到大都同法,并让二宗进行辩论,结果忽必烈做出“开教居禅之右”^④的决定。忽必烈召集禅教辩论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抑制金朝末年以来日益强大的禅宗势力,实施“崇教抑禅”^⑤的政策。所以这次校勘活动和《至元录》的编纂应为元代禅教之争的具体真实反映。

三、知拣舍利石函

2001年5月25日,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找到首都钢铁公司苹果园宿舍施工工地报告,说施工人员在挖电缆沟时,在宿舍北墙南侧地下0.9米处发现了一件石函。因民工不知是何物,当时便将石函搬离了原来的位置。石景山文管所同志赶到现场后得知,石函原放在一个青石板砌的石室之

中,石室面积不大,约1米见方,石室中还出土了少量黄色丝织物残片和两颗佛珠。^⑥按照我国古代佛塔塔埋制度,这一出土石函应为知拣舍利塔地宫,地宫内还应有一些陪葬的佛教供物。但是据现场知拣石函出土情况判断,地宫应早已被盗或被破坏,所以关于地宫原来形制、埋理制度及供奉佛物等情况皆不得而知。

知拣舍利石函现陈列在北京宦官文化陈列馆(田义墓)院中(见封二,彩插一)。石函长70厘米,宽51厘米,高30厘米。分函盖和函身两部分。函盖为盖顶式。盖面上竖行阴刻三行题记:“特赐光禄大夫大司徒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住持大圣寿万安寺都坛主拣舍利灵塔 大元皇庆元年七月 日 志。”石函上知拣的这一署衔与《顺天府志》“宝集寺”知拣署衔完全一样,证明石函主人即为知拣无疑。掀开函盖,在盖的里面两个短边沿(即盖口处)上各有一行阴书题记:“广平僧录□吉祥黄村盖 舍利灵塔座高62尺记”。函盖与函身有子母口,上下相扣,严丝合缝。石函内为凹槽形,原有一个木匣,应是奉置舍利装置。古代以木匣奉舍利十分罕见,多以金、银、玻璃等材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是很值得注意的。石函中的木匣现已破碎,只有几块糟朽的木块留在函中。石函外四个壁上皆有浮雕纹饰,其中前后两端壁上分别刻一对铺首和一个摩尼宝珠,两侧壁上皆刻一个十字金剛杵。这些浮雕内容皆有象征意义,与石函主人信仰和当时佛教思想有密切关系。函身下还雕有一个云头纹四足坐床,坐床与函身间有一凸棱,凸棱同时也表示坐床的边沿。通观整个石函,造型大方,雕刻细腻,铭文刻写规整,与金代北京地区发现的石函具有明显的区别;金代石函的造型、雕刻皆十分粗糙而不规范。

知拣石函的发现为元代万安寺住持知拣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同时从石函上雕刻的内容我们也可窥探到知拣生前和死后一些相关的重要史实。其中,石函上的雕刻内容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函盖上所刻“太元皇庆元年七月日志”题铭。由此我们知道了知拣圆寂之年,即1312年。据《大明高僧传》“妙文传”记载,妙文圆寂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终年51岁。^⑩知拣与妙文是同门,二人圆寂时间仅隔五年,非常相近,由此可见石函上所题知拣圆寂时间是符合史实的。

第二,函盖里面墨书“广平僧录□吉祥黄村监盖”题记。由此而知知拣石函是由广平僧录□吉祥在黄村之地监督封盖的。但这条题记涉及的地名、官职、人名都是元代的,需要进一步考证。先说“广平僧录□吉祥”。“广平”是元代设置的广平路,治所为□州,即今河北永年县治。^⑪当时所辖有一司、五县、三州。“僧录”是僧官的职称。元代仿照金代旧制,在各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僧纲司。^⑫其中僧录司最高僧官便是僧录。“□吉祥”是当时担任广平僧录的一个僧人的具体名与号,其中它的名因字迹漫漶,很难辨认,但可以肯定此一之各只是该僧人法名的尾字,他的号为“吉祥”,据前可知也应该是从国师受戒后为国师所赐。总之,从监盖人的署衔和名号看,这位监盖僧人是当时一位地位很高的僧人。再说监盖地黄村。按照石函出土地考察,在今石景山区东部,古城北3公里处有一个西黄村,据考它原来就叫黄村,因居京城之西,在清代改名为西黄村。^⑬清代北京地方史料中此处便多以西黄村之名出现,如《日下旧闻考》记载保明寺称:“宛平县西黄村有教廓保明寺,寺中尼吕氏,陕人。”^⑭保明寺仍有遗存,在今西黄村南。石函出土处位于苹果园东口,正在今西黄村地界之内。由此可见,元代的黄村就是今天的西黄村所在,而黄村的历史也因此可以追溯到元代了。黄村的地点确定了,它就是今天西黄村所在,但这里是不是元代大圣寿万安寺住持的西归之地呢?当时这里建了多少塔?塔葬了多少万安寺住持?而那些塔又是何时被毁?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函身上雕刻的内容。分别是前后

端壁面上一对铺首和一个摩尼宝珠,两侧壁上的十字金刚杵。两个铺首在石函前端壁面上,背中并排分布,它们象征的应当是石函的两扇大门。摩尼宝珠在石函后端壁面上,其周有火焰纹饰,一般象征佛教的般若智慧,但这里具体象征的是知拣的舍利。因为舍利不是一般人所能修得的,只有那些得道高僧才能修得,所以舍利实际象征了僧人的修为和智慧。十字金刚杵又称羯磨杵,是由两个金刚杵交叉构成的,是佛教密宗常用的重要法器,常出现在西藏金铜像底座的封盖上。它具有加持和成就事业的功用,如《大日经疏》卷十六载曰“金刚有二种:一者智金刚,二者业金刚。此梵云金刚羯磨,谓所作事业也,以此金刚业加持故,得净除其心也。”^⑮知拣石函上的十字金刚杵表示的意义亦由此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在1963年发掘的元代那摩国师侄子铁可墓中,也发现了十字金刚杵,不过它是装饰在一面铜镜上。^⑯由此可见,十字金刚杵出现在元代墓室中不是孤例,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它与元代宗教和墓主人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知拣住持的万安寺在元代主要是弘传藏传佛教,铁可的伯父那摩国师是一位来自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著名密教大师,^⑰二位墓主人都与密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墓中出现十字金刚杵装饰图案就不足为奇的。

四、知拣弟子——德严与德谦

从史料记载看,知拣有两位著名弟子:一位是德严;一位是德谦。

德严是万安寺第二代住持。他的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也不多。据知拣舍利石函反映的知拣示寂的时间,他任万安寺住持应在皇庆元年(1312年)后,他的主要活动也应在此后的元朝后期。又据《元史·文宗纪四》和《文宗纪五》的记载,元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御史台大臣上奏,说他“盗公物,鬻妻孥”,要求免除他的司徒和坛主职位,皇帝批准了这个奏章。^⑱但

是此事过了不到一年,到被免职的第二年五月,又恢复了他的职位,“复以司徒印给万安寺严吉祥”,并下诏拨款五万锭,让他修葺寺中的八思巴帝师影堂。^④《元史》中的这两条记载都只是称他“严吉祥”,而不是全名。能得到“吉祥”之称号,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也是非同一般的,亦应与帝师的赐予有关。

德严一生重要的事迹目前所知是他于延祐三年(1316年)参与的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这次讨论有多位大德参加,讨论结果由大学士程钜夫撰文刻碑,名曰《旃檀瑞像记》。该碑记载:“爰命集贤大学士李衍与昭文馆大学士头陀大宗师浦光等、大海云寺住持長老某、大庄寿寺住持長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讲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大圣寿万安寺住持郡坛主德严、大普庆寺住持讲主某,繙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⑤这次讨论厘定了自印度佛陀为母摩耶夫人说法,而有优填王造纳僧佛像起,直到元延祐三年(1316年)共2307年时间,旃檀瑞像在印度、我国西域和内地流传经过和具体供奉地点和供奉时间。据程钜夫的记载,它在入万安寺前的供奉地点依次是:龟兹——凉州——长安——建康龙兴寺——江都开元寺——汴京皇宫滋福殿——汴京启禅院——燕京圣安寺——燕京万寿山仁智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幸万安寺时,敕令将旃檀瑞像迎入万安寺供奉。^⑥据此,延祐三年时旃檀瑞像正在万安寺后殿供奉。由此可见这次讨论有万安寺住持参与也是情理之中,而这次讨论的结果无疑将大大提高旃檀瑞像和万安寺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程钜夫的《旃檀瑞像记》中德严是以全名的形式出现,由此而知《元史》中的“严吉祥”就是德严。“德严”之名出现于元延祐三年,“严吉祥”之名出现于元至顺二年,两个名称前都冠以住持之衔,很显然,事隔十余年万安寺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法名以“严”为尾字的住持。

另外,从史料记载分析,德严的师傅应当是知拣,而当时崇恩福元寺的德谦应当是他的同门。理由有两条:第一,在我国古代,

寺庙住持之位大多为师徒或同门之间相传,如知拣的师傅圆明是大宝集寺住持,知拣后来也当了大宝集寺住持。由此推之,知拣后万安寺的住持也应是知拣的弟子。第二,德严与德谦是同时候人,他们一同讨论旃檀瑞像源流;德严又与德谦法名首字相同,我国古代僧人凡属同门,法名首字基本相同,以表示门派和辈份的区别,由此可见,德严与德谦,德严与知拣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综上两条理由,知拣、德严、德谦三人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德严与德谦同为知拣的弟子。

知拣的另一弟子德谦《佛祖历代通载》有其传记。他信姓杨,宁州定平人。自幼出家,跟从僧人读佛书。长大后周游秦洛汴汝等地,遍访名师。“初受教于郑州宁公,瑞应于原州忠公;又受教于于好时仙公,圆觉于乾陵一公;后受唯识俱舍等论于陝州恶公。”^⑦未及而立,便名声远播。后到京师,从知拣学习华严圆顿大教。知拣看他博学多能,对他格外器重,开始让他住持大天寿万宁寺,后又让他住持大崇恩福元寺。延祐三年(1316),他也参与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⑧晚年退居幽僻,“括囊一室,以乐其道”。延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圆寂于隐所,世寿五十一,僧腊四十三。皇太后赐钱五千缗厚葬,并敕有司备仪卫,集京师诸寺缁盖鼓乐相送。火化后获舍利数十颗,塔葬于南城之南。

德谦先后住持的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是元代所建的两座藏传寺庙,分别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和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寺庙。大天寿万宁寺在今鼓楼东偏。元泰定四年五月,曾在寺中设成宗神御殿。^⑨据《日下旧闻考》朱彝尊按语,清代时寺庙尚存。^⑩但不加毁于何时。大崇恩福元寺具体位置不可考,约在今崇文门至东南城角楼一带。元大学士姚燔曾撰《崇恩福元寺碑》,具载建寺因緣及寺庙建筑与供奉情况,是了解当时寺庙历史与建筑的重要资料。^⑪元至大四年十月,曾安置武宗御容在寺中供奉。^⑫这两

座寺庙分别设置了成宗和武宗影堂,也是元帝王祈福之所,不难推想当时它们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两座寺庙也都是弘扬华严宗道场,因为它们是由知炼和妙文二位华严大德大弘华严而建立的海内十六名刹中的两座名刹,《顺天府志》“宝集寺”条还特别列出了这两座寺庙的名称。

综上所述,我们对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炼的生平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知炼为元初著名高僧;曾师事宝集寺住持圆明大师,后来继任为宝集寺住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受忽必烈诏请为万安寺开山住持;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他参加了由忽必烈发起和召集的汉藏高僧学者共同校勘、编订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他一生力弘佛教华严宗,使宝集寺华严法脉流向四海,在海内出现了十六大分刹;忽必烈对他十分宠重,多次向他访问道法;他佛学造诣高深,赢得了“三学都坛主”的学衔;他宗教政治地位极高,曾担任大都路的“释教总统”,并受到朝廷赐予的“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鄆国公”等多种封号;他于皇庆元年(1312年)圆寂,塔葬于京西黄村(今石景山西黄村),广平僧叟某亲自为其舍利石函封盖;2001年5月石景山苹果园东口发现了他的舍利石函;他有两位著名的弟子:一个是德严,是继他之后万安寺第二任住持;一位是德谦,曾先后住持大天寺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这二人还于延祐三年(1316年)参加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了解了知炼这些生平事迹,对我们认识白塔寺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研究元代佛教史、文化史以及民族关系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①《元史》卷51《五行志二》。

②《元一统志》卷1。

③《凉国敏慧公神道碑》,程巨夫《雪楼集》卷7。

④⑤《顺天府志》卷7引“宗原杂记”。

⑥黄春和,《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四期。

⑦⑧《大明高僧传》卷2《释妙文传九》。

⑨⑩《元史》卷10《世祖纪七》。

⑪《元史》卷13《世祖纪十》,卷14《世祖纪十一》。

⑫⑬如慧祥跋:《圣旨敕建旃檀舍利灵函之塔碑文》,《至元集韵录》卷5。

⑭《元史》卷13《世祖纪十》。

⑮《中国历史大辞典》(江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⑯《中国历史大辞典》第8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⑰《佛祖历代通载》卷21。

⑱《佛祖历代通载》卷22。

⑲黄春和,《江代华严宗的传诵及其思想特色》,香港《内明》1997年总第300期。

⑳⑳《元史》卷202《释老志》。

㉑元释克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序》。

㉒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叙录”。

㉓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

㉔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第264页《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㉕《全元文》卷157。

㉖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㉗陈唐,《重建栖岩寺碑》,《全元文》卷137。

㉘刘仁本,《送大丹坛上人序》,《羽庭集》卷2。

㉙姚燧,《董公神道碑》,《国朝文集》卷61。

㉚《北京晚报》,2001年。

㉛《元史》卷58《地理一》。

㉜《北京地名词典》第15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㉝《日下旧闻考》卷97郊坰。

㉞《大日经疏》卷16。

㉟《元狄父子和雅弘福墓》,1986年《考古学报》。

㊱《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清沈涛《蔚山成石志》卷15。

㊲《元史》卷36《文宗纪四》。

㊳《元史》卷36《文宗纪五》。

㊴⑳《日下旧闻考》卷41《皇城》引程巨夫《旃檀瑞像记》。

㊵《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㊶《元史》卷30《穆定帝纪》。

㊷《日下旧闻考》卷54《城市》“万宁寺”条。

㊸《全元文》卷310《姚燧》12。

㊹《元史》卷25《仁宗纪》。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保管部馆员)



辽金时期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争

范 军

居庸关，作为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历来起着拱卫北京的重要作用。居庸之名，来源于秦代“徙居庸徙”，即秦始皇修长城时，将士卒及民夫徙居于此。汉代上谷郡下辖有居庸县，县有关，^①即为居庸关。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代仍称居庸关，又有军都关、蓟门关等名。居庸关形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居庸关在幽州之北，最为深阻，号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断，两岸峡束，石路盘肠，紫带黻幘。南曰南口，北曰北口。滴沥瀑漫，常为冰厓，湔湔濡漉，侧轮跣足。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则左转上谷之右，并长岭而西，阴烟枯

沙，遗骸朽骨，凄风惨日，自为一天，中原能守则为阳国北门，中原失守则为阴国南门。故自汉唐辽金以来，尝宿重兵以谨管钥。”^②辽金以前，居庸关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的分水岭。而到了辽金时期，局势为之一变。辽、金入占北京，以正统王朝自居，而又都分别据守居庸关抵御同样来自北方的女真、蒙古。此时的居庸关，已不单是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而是成为保卫中原政权和正统观念的“堡垒”，而据守居庸关则成为契丹、女真等民族融入中华的一个象征。

辽金时期，“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障，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

车,通转输。松亭(今河北省宽城县西南——笔者注)、金坡(即紫荆关,在今河北省易县——笔者注)、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免绕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马。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来才数十里则童山水蚀,皆荆棘,弥守黄茅、白草,莫知且极,岂天设此限华夏也。”^③正是由于居庸关在拱卫北京的五关之中交通最为方便,因而也就成了进攻北京的最佳路径。辽金时期围绕争夺居庸关而发生的战争层出不穷,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辽初,辽末,辽宋金三个政权争夺燕京时期及金末,下分述之。

一、辽初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争

辽初,在未占领燕云十六州之前,入侵中原多经由居庸关。辽太祖神册二年(917年)“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杀李嗣恩之子武八。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关略燕、赵,不遇敌而还。”^④周德威时为晋王李存勖(即后来的后唐庄宗)的幽州节度使。这次战役的地点是在居庸关之西、新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之东。辽军取胜后,随即向东进入居庸关,而居庸关一旦失守,北京的门户就顿开,契丹铁骑就蜂拥而入,给中原政权造成极大的物力、人力损失。神册六年(921年)十月,辽太祖再次率大军南下。“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蓟、定远、三河、良乡、望都、瀛、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⑤居庸关和古北口两个重要关隘的失守,使辽军更如人无人之境,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十月,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之后,居庸关成为辽的内陆,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依然不减。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宋雍熙三年),宋太宗发起“雍熙之役”,向辽

进攻,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三月,宋西路军进展顺利,辽应州、飞狐关、灵丘守将相继投降,又攻下云州。辽军西线吃紧,于是辽圣宗“诏西部突骑赴蔚州,以助围蹙。横帐郎君老君奴率诸郎君巡蹙居庸之北。”^⑥可见,辽圣宗在派西部突骑增援西线围蹙的同时,并未忘记居庸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派耶律老君奴等在关北警戒,以防西线宋军的进攻。

二、辽末,辽宋金围绕争夺燕京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争

辽末,东北的女真族不堪忍受辽的压迫、掠夺,在完颜阿骨打率领下奋起反抗,于1115年正式建国,国号大金。金政权建立后,向辽发起了节节进攻,对辽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而宋也从中看到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宋徽宗于重和元年(1118年)派马政自登州渡海赴辽东与金谈判合力攻辽事宜,后又派赵良嗣及马政之子马扩使金。宣和三年(1121年,金天辅五年)九月,宋致金国书中提到:“已差太傅知枢密院事童贯领兵相应,使回,请示举军目的,以凭进兵。奥攻所有五代以后所陷幽、薊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所有兵马,彼此不得越过过关,外搆诸邑及贵朝举兵之后,溃散到彼余人户,不在收复之数,银绢依与契丹数岁文。”^⑦即约定宋金双方夹攻辽,宋收复居庸、古北、松亭、榆关之南原汉地,彼此不得过关。宋将原来给辽的岁币于金。双方达成了史称为“海上之盟”的盟约。但宋朝对“燕云十六州”及“旧汉地”的地理概念并不十分清楚,所谓“五代以后所陷幽、薊等州”即“燕云十六州”之地并不包括松亭、榆关在内。即使在居庸关、古北口内外,这里早已居住着很多契丹、奚族部落,所谓“旧汉地”早已胡汉杂居了。对此,金朝十分明确。完颜兀室就说:“有居庸、金坡等关,贵朝占据,古北、松亭关,本奚家族帐。”^⑧又说:“古北、居庸本是奚地,自合本朝占据,今特将古北口与贵

朝,其松亭关本朝屯戍,更不可说。”^[2]明确道出,将古北口、居庸关等原属地交给宋,已是对宋的格外优待了,松亭关当然不能再给宋。金朝的这种不无道理而又咄咄逼人之势,为日后宋金开战埋下了伏笔。

辽在金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辽天祚帝于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从燕京逃至鸳鸯泊(今河北省张北县西北)。在金军的进攻下,又逃至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天祚帝的叔父耶律淳留守燕京,在李处温、萧干等人的推戴及郭药师所统率的怨军的支持下,于三月自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四月,宋派宦官童贯率兵十万进攻燕京,为辽耶律大石、萧干所败。六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称制。七月,宋派刘延庆统军再次攻燕。鉴于上次宋军的失利,刘延庆“与幕府议持重,不可进兵,使女真军马先入居庸关,收下燕京,然后多以岁币贖之,此为万全。”^[3]但是辽常胜军(即原来的怨军)首领郭药师降宋,才使刘延庆鼓起勇气,命郭药师率部突袭燕京。郭药师虽然攻入燕京,但苦战数昼夜,外无援兵,因而只率少数士卒突出城外,而大部分将士战死城内。接着刘延庆全军溃退,宋朝的两次攻燕之役均告失败。

与宋军的懦弱无能相比,金军却进展迅速。十二月初,金军在古北口大败辽军后,又向居庸关进发。“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遂取居庸。萧妃遁去,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乞降。”^[4]说“大败辽兵”,其实并未发生大的战斗,这从其他记载中可看出,如《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载:“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径至城下。”《辽史》更记载辽兵不战自溃,“秦晋王淳妻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以劲兵守居庸。及金兵临关,崖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自溃。”^[5]金太祖对于辽军如此不堪一击,而宋军却对之无能为力感到不可理解,对宋朝甚为轻视。此时,宋使马扩随金军一同进军,他为我们留下了对当时情况的生动描述:“初五日抵居庸关,契丹弃关走。仆随行,阿骨打谓曰:‘契丹国土十分,我已取其

九,只有燕京一分地土。我著人马三面逼著,令汝家就取,却恁生受,奈何不下。初闻南军已到卢沟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南家故地,教他收了,我与他分定界至,军马归国,早见太平。近闻都统刘延庆一夜走了,是甚模样。’仆答曰:‘使人留此,不得而知兵。兵家进退常事,恐亦非敢。纵使刘延庆果败,亦别有大军在后。’阿骨打云:‘似恁统领底人,败了军国大事,汝家有其赏罚?’扩曰:‘将折兵死,兵折将死。延庆果是退败,便做官大,亦行军法。’阿骨打云:‘若不行军法,后恁生使兵也。待一两日到居庸关,你看我家兵将战斗,有敢走么!’初六日,人居庸关。”^[6]在后来自金于宋的回书中,对宋的懦弱又加以责备:“所谓失攻者,宋朝自涿、易二州等冲要处进兵至燕京。全国自古北口乌稍岩冲要等处进兵至燕京。至日临期,当朝兵马攻下居庸关,直抵燕,即日款降外,贵朝兵马从无一人一骑、一鼓一旗、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战退。”^[7]对此,宋在回书中百般为自己辩护,但是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昨赵良嗣等还自伐北,知欲入关讨伐,即自涿、易等处分遣军马夹攻,三面掩杀契丹,数阵大获胜捷,追逐远过燕京东北,实与贵朝攻取居庸之兵相应,靡有差失。暨围妃与四军以下奔窜,城中无不顺之人,似闻贵朝兵马相近,于义不当争入燕城,即令远驻兵马,本坚守信约。应夹攻者,事皆有迹可考,不待理辩。”^[8]

金军占领燕京后,于天会元年(1123年,宋宣和五年)三月,依照“海上之盟”的规定,将燕京及附近六州交给宋朝,但却将人户、财产等席卷而去,宋只得剩几座空城。“阿骨打交燕中,于契丹汉儿内两府中携刘彦宗出居庸关,由云中府、德州路西巡。”^[9]宋随即命“常胜军守松亭、古北、居庸关。”^[10]宋金的“海上之盟”只是基于夹攻辽的短暂同盟,一旦辽亡,宋金直接交界,再加之金早已看出宋的软弱无能,因而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宋宣和五年)十一月,金军分东西两路攻宋。十二月,

金军在白河大败宋郭药师部，与此同时，又“遣女真万户昌郭、郎君蒲卢虎、赛里郎君、契丹都统乌五东寇居庸关以应之。虑居庸关难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关入寇易州。即出奇取凤山，治皇太妃岭道以寇昌平县，则反顾居庸矣。于是居庸亦遭，彼贼遂入居庸。初郭药师之备金人也，严于东北而弛于西，何哉？盖东北乃金人来路也，燕山之东，以郭城镇为界，东北以符家口为界，韩城、符家去燕山皆四百余里。幹离不既寇东北，探骑溃军络绎而来，燕山得预闻之，故药师出常胜军屯于燕山之东白河以待贼。西则居庸关为绝边，去燕无百里之远，但闭关而已，更无他备。不意贼西取居庸，一夕寇城，故预无警报而弛备焉。设若白河之战药师苟能全胜追贼而东，则西亦为粘罕乘虚矣。况战不利，何以御之。”^②可见，即使郭药师在白河之战中获胜，由于居庸关的失守，燕京也难免陷落。

在金代，居庸关的战略地位仍为时人所重，世宗时梁襄认为：“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屋，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收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并邑之繁丽，仓库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③金在居庸关专门设官驻守，“居庸关、紫荆关、通会关、会安关及他官皆设使，从七品。”^④世宗时，契丹人在移刺窝斡领导下起兵反金，世宗在大军镇压的同时，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戊寅，诏居庸关、古北口设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赏。”^⑤

三、金、蒙古居庸关之战

女真族作为来自北方的民族，建立了大金王朝，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两个强大的王朝，但是在它立国近百年后，却同样遭到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的威胁。公

元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誓师伐金，此时金朝皇帝为卫绍王完颜允济。他派完颜承裕率军抵御蒙古的入侵，“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县中土豪请以士兵为前锋，以行省兵为声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问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涧曲折，我辈请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卫绍王犹薄其罪，除名而已。”^⑥会河川之战后，金军固守居庸关，先前成吉思汗“遣札儿八儿使金，金不为礼而归。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栅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札儿八儿既还报，太祖遂进军，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札儿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儿八儿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被野。关既破，中都大震。”^⑦这次蒙古军虽然攻破居庸关，但并未攻下中都，随即撤军。蒙古退军后，金有副元帅府经历官李英看到居庸关对中都的重要性，上书右副元帅术虎高琪：“中都之有居庸，犹塞之有峭、蜀之剑门也。逆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士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又曰：可镇抚宜、德、德兴余民，使之从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给，是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坐收所失之关隘也。居庸关咫尺，都之北门，而不能卫护，莫实耻之。”^⑧金廷随即任命李英为尚书工部外郎，“充宣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⑨

金至宁元年（1213年）七月，成吉思汗再次向中都发起进攻，击败金完颜纳、术虎高琪。“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剌守之。遂趋浑鹿。金五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寨，易二州。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逆别遂取居庸，与可忒、

薄剥会。”^①蒙古军攻下居庸关后，围攻中都久攻不下。第二年三月，成吉思汗“乃遣使喻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挟师以弭我，将之怒乎？’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②这样，居庸关就成为任由蒙古军出入的通道。蒙古退军后，金宣宗惊恐不已，于贞祐二年（1213年）五月迁都汴京。成吉思汗得知后，再次发兵围攻中都。贞祐三年（1214年）五月，中都城破，陷落于蒙古。从此，居庸关又一次更换了主人。其后，它又多次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2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元·郝经：《居庸关铭文》，《陵川集》。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四“边障”，第247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第143页，引《许元宗奉使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五关除上引四关外，尚有榆关（又写作榆关，今山海关），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卷二六九，第8813页，胡三省注引《金虏要略》。

④《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辽史》卷二《太祖纪下》，第1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⑥《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第12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四，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第93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年。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第69页，引马扩《茅斋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⑩《金史》卷七一《完颜婆卢火传》，第163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⑪《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三》，第34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⑫《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第84—85页，引马扩《茅斋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⑬《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第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⑭《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⑯《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第181—1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⑱《金史》卷九六《梁襄传》，第21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⑲《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2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⑳《金史》卷六《世宗纪上》，第128页，又见卷一三二《移剌窝孙传》，第285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㉑《金史》卷九三《完颜承裕传》，第206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㉒《元史》卷一〇〇《礼儿儿火者传》，第2960—296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㉓《金史》卷一〇〇《李英传》，第22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㉔《元史》卷一《太祖纪》，第1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㉕《元史》卷一《太祖纪》，第1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

历代帝王庙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31号,始建于明嘉靖十年春(1531年),建成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是明清两代皇室祭祀历代帝王及功臣的皇家坛庙,也是我国现存惟一的一座历代帝王庙。关于历代帝王庙的历史渊源,缘起沿革,规模布局,祀君配臣的问题,笔者在前年已发表专文论述,^①本文将重点介绍和探讨有关历代帝王庙祭祀礼仪方面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中国历代王朝对祭祀都极为重视,清廷则尤为重视。清代每年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耗资巨额,举行各种祭祀。清朝将诸祭分为大、中、小三等;圜丘、方泽、祈谷、雩祀、太庙等为大祀;日、月、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关帝等为中祀;先医、北极佑圣真君、东岳、都城隍等为群祀。历代帝王属于中祀,规模虽不如大祀,却优于中祀,在中祀中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它由皇帝亲祭或派遣官员代祭。祭祀的神主是历代帝王和从祀名臣。

一、历代帝王庙的祭品陈设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历代帝王庙是“设主不像”的,也就是说,它只是设神主灵牌,不张挂画像的。又据《清会典图》记载,景德殿内神龛自乾隆四十九年由五龛改成了七龛,有些龛中又分左右、右二室或左、中、右三室。这些神龛和神主灵牌,是历代帝王庙祭祀中的重要设施。可惜这二者在近代均已毁弃不存,而文献典籍中也没有留下足够复原的文字与图像资料。目前,笔者查到有一幅与神龛相关的图像资料,存于《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二〇六《正殿陈设图》中(图一)。该图上方有神龛及龛下的石质须弥座。可惜描绘过于简单,比例也严重失调,因此,无法依其对神龛和石座复原。近日,有关部门在对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的维修施工中,已发现了当年神龛在殿柱上部留下的龛顶、龛座痕迹。据此,可以推知神龛的高度、宽度和龛座的高度。同时,在中国文物研究所珍藏的历史照片中,发现了

含有帝王庙大殿神龛、神牌的图像资料。以之再与太庙等单位的相关资料对比,历代帝王庙大殿的神龛、神牌已大体可以复原。

历代帝王庙的全面祭祀活动应始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据明《太祖实录》载,当年金陵庙主殿分“五室”,祭品陈设“每室各用牛、羊、豕各一,祝一;每位用豆、豆各十,簠、簋、登、饔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白色。共设酒尊五于殿之西阶,又设酒尊三于殿之东阶。”这说明当时的祭品陈设比较简单。

明洪武二十一年(1378年)增定,据《明史》载:“每位饔二,置簠各二,五室共设酒尊三,爵四十八。配位每坛笾豆各二,簠簋各一,饔盘一,各位饔一,酒盏三。三皇,笾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饔各二,爵三,牺尊、象尊、山彝各一。配位,笾豆各四,簠簋各二,饔一,爵三,牺尊、象尊各一。”

清代祭品陈设从顺治二年(1645年)致祭帝王庙起,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礼部则例》,“正殿每代设笾豆一案,五帝竟统改三案,共十六案。其礼神制帛,仍每位一端,每案设帛篚一;两虎四位共一案,末案三位一案,紫帛每位一端,两虎各增帛篚二,香案香炉二。”

直康熙六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雍正帝增祀至一六四帝起,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增祀到一八八帝止,历代帝王庙主殿及配位的祭品陈设较前有较大的变化,亦相当完备。而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才最后定型。《清会典图》卷十六详载其定型后的格局,其内容是:

“景德殿三皇位三案,前共一组;五帝位三案,前共一組;夏王位、商王位二案,前共一組;周王一案,前一組;汉帝位、晋帝位、宋帝位、齐帝位、魏帝位、陈帝位三案,前共一組;唐帝位、后唐帝位、后周帝位、辽帝位、宋帝位三案,前共一組;金帝位、元帝位、明帝位三案,前共一組。组皆中区为三,实牛一、羊一、豕一。组前香案,如笾豆案之数。每案上设铜炉一,香靠具,棚烛台二。其桐爵每案各三,皆先设尊桌上,三献各奠于爵位。帛篚十八,设接桌上,奠帛各奠于香案正

表至当，详议绘图以闻”。这表明清朝对坛庙的祭祀器用，既严格按照古代定制，又略有改动。按《清会典图》载，历代帝王庙的祭器款式如下：

帛：织字的帛。其上书写满、汉文，用于历代帝王庙正位，为白色。（图四：1）不织字的素帛，用于历代帝王庙两庑，亦为白色。（图四：2）

祝版：为木质方形。纵八寸四分，广一尺五寸。祭帝时，将祝辞用白纸黄绿墨书写于祝版上。（图四：3）

爵：用铜制作。爵形。腹为雷纹鬯甬形。高四寸六分，深二寸三分。两柱高七分，足高二寸，三足相距各一寸五分。用于盛祭酒。（图四：4）

登：用铜制作。口为回纹，中为雷纹，柱为鬯甬形，雷纹，足为垂云纹；盖上有星纹，中为垂云纹，口为回纹。高六寸，深二寸，口径四寸九分，校围六寸九分，足径四寸七分，盖高一寸六分，径四寸六分，顶高三分。用于盛太羹。（图四：5）

铏：用铜制作。两耳为牺形，口为藻纹，次回纹，腹为贝纹。盖为藻纹，回纹，管纹，上有三峰，为云纹。三足，亦为云纹。两耳及膝不饰金。用于盛和羹。（图四：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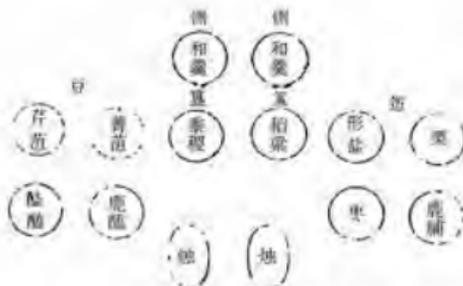
簠：用铜制作。方形。而为夔龙纹，束为回纹，足为云纹，两耳附以夔龙纹，盖上有棱四周，旁亦附夔龙耳。高四寸六分，深二寸一分，口纵六寸四分，横八寸，底纵五寸一分，横六寸四分，盖高一寸四分，口纹横与器同。上有棱四周。纵四寸一分，横六寸四分。用于盛黍、稷。（图四：7）

笾：即竹筵，用竹制作。形制如豆。以绢饰里，顶及缘染漆，用红色。高五寸四分，深八分，口径四寸六分，足径四寸，盖高一寸九分，顶高四分。用于盛形盐、橘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稷饵、粉饈。（图四：8）

簋：用铜制作。制圆而椭。口为回纹，腹为云纹，束为黼纹；足为星云纹，两耳附以夔龙；盖面为云纹，口为回纹，上有棱四出。高四寸二分，深二寸一分，口径七寸二分，底径

配位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图三 《清会典图》卷一五《历代帝王庙配位陈设图》



1. 祝字的帛



2. 不祝字的单



3. 祫



4. 盥



5. 盥



6. 特



7. 祫



8. 盥



9. 盥



10. 盥



11. 祫



12. 祫



13. 祫



14. 盥

图四 祭器

六寸；盖高一寸八分，径与口径同，上有棱四出，高一寸一分。用于盛稻、粟。（图四：9）

豆：用铜制作。腹为垂云纹，回纹，校为波纹，金罍纹，足为黼纹，盖为波纹，回纹，顶用珣纽。高五寸，深一寸七分，口径四寸五分，校围二寸，足径四寸一分，盖高一寸八分，顶高三分。用于盛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菊菹、鱼醢、脾析、豚拍、醢食、黍食。（图四：10）

簠：用竹制作。四周髹漆，用红色。高五寸，纵五寸，横二尺二寸五分，足高一寸，盖高一寸七分。用于盛玉帛。（图四：11）

俎：用木制作。锡里，外髹以漆。帝王庙正位用红色。中区为三，纵六尺有奇，横三尺二寸，四周各铜镮二，八足有附，通高二尺六寸有奇。用于陈置牲口（牛、羊、豕）。（图四：12）帝王庙二庑亦用红色，中区为二，加盖，纵三尺九寸，横二尺八寸，左右各铜镮，六足有附，通高二尺七寸有奇。用于陈置牲口（豕、羊）。（图四：13）

尊：用铜制作。外表纯素，两耳为牺首形。高八寸六分，口径五寸一分，腹围二尺四寸，底径四寸六分。用于贮酒。（图四：14）

三、历代帝王庙的祭祀

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亲祀金陵帝王庙，其祭祀礼仪《明实录·太祖实录》有较详细的记载，大致分为斋戒省牲、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扶福受胙、御豆、送神和唱祝望饗十节。祭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读祝文，由读祝官专责读祝。祝文因祭祀对象的不同而异。

据《明太祖实录》载，祭祀三皇的祝文是：“惟太昊伏羲氏画八卦以明天道，造书契以开人文。惟炎帝神农氏制耒耜以教农耕，尝百草以为医药。惟皇帝轩辕氏作居室衣服以法象，创律历官制以宣政治。皆继天立极开物成务，大有功于生民后世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三圣去世悠远，神灵在天万古

长存。崇报之礼不可不至，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唯上享。”

载，祭祀五帝的祝文是：“惟帝金天氏五行应运，因风纪官道墟三皇为五帝。首惟帝高阳氏静渊有谋，疏通知事，洁诚祭祀，治教万民。惟帝高辛氏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广运，圣神武文，执中传心，道统斯著。惟帝有虞氏玄德既升，恭己而治，世昭泰和，乐奏凤仪，皆盛德被于生民，大功昭于后世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列圣去世悠远，神灵在天万古长存，崇报之礼多未举行，故于祭祀有阙，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唯神鉴尚享。”

载，祭祀三王的祝文是：“惟夏禹王勤俭家邦，平治水土，天锡九畴，彝伦攸叙。惟商汤王圣敬日跻，德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万邦。惟周武王于昭武烈，拯救生民，乃建皇极，纘文之绪，皆盛德被于生民。以下与五帝同。”

载，祭祀汉高祖、光武帝、隋高祖的祝文是：“惟汉高祖皇帝除暴平贼，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唯汉光武皇帝拯提英雄，励精图治。戮兴灾运，四海咸安。唯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息，赏功弗吝，节用安民，时称平治，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载，祭祀唐太宗、宋太祖祝文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惟宋太祖皇帝顺天应人，统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余文并同五帝，但改悠远作已远。”

载，祭祀元世祖的祝文是：“惟神哲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夫何传及后世，不遵前训，怠政致乱，天下云扰，莫能拯救。元璋本元之农民，遭时多艰，慨然奋，于涂炭建义聚兵，图以保全

生灵。初无黄屋左纛之意，岂期天佑人助，来归者众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师北征，遂定于一。乃不揆非德，继承正统，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庸庸择人神授，汤武用兵征伐，因时制宜，其理昭然，神灵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者，乃于京师肇新庙宇列序圣像，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水为常典，礼奠之初，谨率牲醴致祭，伏唯神鉴尚享。”

应当指出：明太祖朱元璋对各帝的祝文，是很有其个性和开国雄主的领袖人格魅力的。自明嘉靖帝起，即已不再区分对象各作祝文，而是合诸帝为一篇，内容多是板起面孔的官样文章，无复太祖时那样独具个性了。

明太祖初时制定的祭仪，共分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彻饌、送神、望燎等八个小节，每个小节均有固定的乐曲和颂歌。据《明史》载，明洪武七年御制祀历代帝王各小节乐章歌词为：

迎神，奏《雍和》之曲。歌词曰：仰瞻兮圣容，想鑒與兮景从。降云霓兮后先，来恂鑒兮微衷。荷圣临兮苍生有崇，眷诸帝兮是临，予顿首兮率蒙。

奠帛，奏《保和》之曲。歌词曰：秉微诚兮动圣射，来列坐兮殿庭。予今愿兮效勤，率礼用兮列酒尊。鉴予情兮忻享，方旋驾兮云程。

初献，奏《保和》之曲。歌词曰：酒行兮爵盈，喜气兮雍雍。重荷蒙兮载瞻载崇，群臣忻兮厥从。愿瞻穆穆兮圣容。

亚献，奏《中和》之曲。歌词曰：酒斟兮礼明，诸帝照和兮悦情。百职奔走兮满庭，陈笾豆兮数重，亚献兮愿成。

终献，奏《雍和》之曲。歌词曰：献酒兮至终，早整云霓兮将旋宫。予心眷恋兮神圣，欲攀留兮无从。葐云霓兮缓行，得通瞻兮达九重。

彻饌，奏《凝和》之曲。歌词曰：纳祝羞兮颂陈，蒸民乐兮幸生。将何以兮崇报，惟岁时兮载瞻载迎。

送神，奏《寿和》之曲。歌词曰：旒幢缭绕兮道来踪，鸾輿再再兮归天宫。五云拥兮祥风从，民歌圣佑兮乐年丰。

望燎，奏《豫和》之曲。歌词曰：神机不测兮造化功，珍羞礼帛兮荐火中。望燎庭兮稽首，愿神鉴兮寸衷。明洪武七年金陵帝王庙的祭祀典仪，是历代帝王庙祭祀典仪的开端。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明世宗初祭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典仪，《明会典》有详载。在斋戒省牲、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而豆、送神和唱祝望燎十节中，惟有最后一节的“唱祝望燎”改成了“唱祝燎祭”。其余皆保持不变。

清代的祭祀典仪，据《清会典》载：“顺治二年定历代帝王庙每年于春二月秋八月遣官致祭”，“顺治十四年皇上躬诣致祭”，“皇帝亲祭一上香，若遣官致祭三皇位前三上香。”顺治十四年祭仪与明代基本相同。

顺治二年(1645年)定祭历代帝王庙，将乐章从明代的八段缩短为六段，颂词也精简为六段。乐章曲牌有较大变动，由明代的雍和、保和、甲和、肅和、凝和、寿和、豫和改成了肇平、兴平、崇平、恬平、淳平、匡平。颂歌歌词也有较大不同。据《清史稿》载，六章音律是：

“中和韶乐，春夹钟清商立宫，信应钟清变徵主调。秋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迎神，用《肇平》曲。歌词曰：“抚时兮，极隆。造经纶兮，呈庸。总古今兮，一揆。胎大宝兮，微躬。仰徽猷兮，有严同宫。予稽首兮，下风。”

奠帛，初献，用《兴平》曲。歌词曰：“莽若云兮，神之行。予仰止兮，在庭。承筐匪兮，既登。惟灵羞兮，翠旌。鉴予情兮，敬享。祚芳馨兮，肃成。”

亚献，用《崇平》曲。歌词曰：“庇翫兮，酒行。志背致治兮，水清。脯龙哀兮，若英。愿绍锡兮，嘉平。”

终献，用《恬平》曲。歌词曰：“郁鬱兮，献终。万舞洋洋兮，沐清风。龙鸾徐整兮，企

群臣跪，司祝读祝文，致祭于诸帝王。清代写定的祝文大意为：诸帝应运代兴，作君作师抚育黎蒸。创业维艰，基业用宏。守文不易，溥然是承风教。既远功德，可称报于仲。

4. 亚献：典仪赞亚献，奏《崇平》之章，舞羽箭之舞（按：文舞又叫“羽箭舞”，舞童皆手举羽，箭），职司依次向主殿帝王及两庑配原献爵。

5. 终献：典仪赞终献，奏《恬平》之章，舞同亚献，司爵依次献爵。

6. 答福胙：太常寺赞礼郎赞答福胙，光禄寺卿二人奉福胙至三皇位前，拱举立于皇帝拜位之右，皇帝跪，饮福酒，受胙如饮福之仪，皇帝行二跪六拜礼。

7. 御饌：典仪赞御饌，奏《淳平》之章，彻乐乐止。

8. 送神：典仪赞送神，奏《匡平》之章，皇帝率群臣行二跪六拜礼。

9. 送燎：典仪赞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诣神案前跪，三叩，奉祝文、帛篚、香火、供饌，由中道出，恭送燎所焚燎。乐作，赞引奏礼成，恭导皇帝由景德中门出，乘礼舆，由大驾卤簿前导，在佑平之章的旋律中，返回宫中。

皇帝有时不亲祭，而遣官致祭。其典仪为：祭日质明（按：天刚亮时）。承祭官入景德左门，升右阶位，于阶上，北面迎神。赞就上香位，出，入殿左门，承祭官、分献官及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礼，不饮福受胙，王公不陪祀。赞引以太常寺赞礼郎，祝帛送燎瀝立西旁东面，余均如仪。

关于各祭祀小节中的乐曲，如肇平、兴平等曲，及干戚之舞、羽箭之舞的舞蹈用具，服装、动作等，均有曲谱、舞谱^②等可查。这又是一个专门的范畴，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综上所述，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制度自明太祖

趋于定型。

明太祖朱元璋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在南京制定的历代帝王庙祭祀典仪与前几代相比，有很大发展而趋于定型。例如：据《南书·礼仪志》载，隋高祖祭历代帝王各以一太牢（按：牛、羊、豕各一）而无乐，祭配臣则献于庙庭。唐代典仪史书无载。这表明当时祭祀简单而无定制。而明洪武七年制定的祭祀典仪，包括十节祭仪、祝文、乐章等，内容相当完备，已达到较高水平。为以后历代帝王庙祭祀典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历代帝王庙祭祀制度至清代臻于完备。

清朝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谕旨增祀至164帝起，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增祀到188帝止，历代帝王庙祭祀帝王和从祀名臣的神位增多，且相对稳定。同时，帝王庙主殿及配位的祭品陈设较前有较大变化，亦相当完备。此外，据文献记载，清朝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在位时，曾多次亲祭历代帝王庙，表明了清帝对祭帝愈加重视。

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祭祀典仪制度也趋于完善。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王朝——清代，则是我国封建典制的集大成者。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典仪则集中体现了这种典制。

据古代文献记载，历代帝王庙中存放过许多皇家的祭品、祭器等。但这些祭器均已大量流失，寻找或复制这些祭器，研究祭祀中的典章制度，无论从考古文物的角度，还是旅游业的开发利用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付崇《历代帝王庙初探》（《北京文博》1999年第3期）。

②《清会典图》卷54，乐24《历代帝王庙初献武舞谱》、《历代帝王庙亚献文舞谱》、《历代帝王庙终献文舞谱》。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

永乐大钟

成铸时间考辨

孔祥利

关于永乐大钟成铸时间的研究,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力图从新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并与诸说商榷。

一、钟体款识与成铸择吉时间分析

笔者曾于1996年发表过《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卧考》(以下简称《悬卧考》)^①一文,文中论及永乐大钟的迁移悬卧问题时,将择吉作为永乐大钟动议的关键因素,它影响到大钟迁移的时空命运。故此笔者设想,永乐大钟的兴铸时间是否也受到择吉的限制呢?考虑到大钟的铸造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实际上还存在着兴铸吉日和成铸吉日两个吉日的选择。大钟的兴铸时间,由于对钟体经文所实施的考证,^②已得出大钟必然要在永乐十五年之后兴铸的结论。

关于大钟的成铸时间,古人曾给我们留下了“四丁未”(指年月日时均为丁未干支)这样一种记载。笔者曾在《悬卧考》一文中谈到“四丁未”这个时间概念,它是一种吉日的选择。大钟成铸时的“四丁未”与迁移时的“四丁未”之记载源于同一文献和同一记述。明代文献《熊聊纪闻》是这样记述的:“大内出一钟,成祖时少傅魏广孝监铸,……

铸时年月日时皆丁未,今徙置之日为六月十六日,亦四丁未相符,事亦奇矣。”^③这篇议论见于明末文献,虽距铸钟已有百余年,但当代人传当代事,“彼时所见,当属不诬。”^④故其说法虽为传闻,仍可作为考察线索。由于大钟铸造工程需若干年时间,所以这里所说的铸时“四丁未”应指成铸时间,而不是兴铸时间。

但目前大钟成铸之“四丁未”一说被诸说所否定,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四丁未”这一时间已不在永乐年间,而在宣德二年,时过永乐年间已有三年。而因永乐大钟钟体上铭刻着“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故此,将“四丁未”判作讹传的推断也就出现了。

关于大钟成铸于永乐年间的各种说法,均来自对历史事件和人事变故的分析,^⑤结论仍然是一种难以确定的推测。

一种说法认为,铸造永乐大钟,成就于永乐年间有充分条件。^⑥笔者认为,作为当时的筹划者自然希望铸钟之事在永乐年间结束,然而,实际情况能否就能遂愿呢?这里面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成铸择吉之时间能否在该皇帝在位期间达到,二是铸钟的工艺工期能否及时在短期内完成。成铸择吉之时间“四丁未”应在铸钟工程之始即确定,

但其是否还能在永乐年间就无法预料了。另外大钟铸造工程也需相当长的时间,是否整个工期始终在永乐年间则无法作出判断和保证。事实上,工期已超出永乐皇帝在位之时。

人事的变化难以预料,但是工程的进度可以确保不变,大钟的年号款识可以不变。因为按铸钟的工艺程序,先为制作陶范阶段,此时“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已刻在陶范之上,并且这个工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设想,成祖驾崩之时,大钟正在铸造之中,此时是不能将工程半途而废去更改款识的。况且,铸钟工程已历数年,成铸吉日即将来临,更无推倒工程更改年号款识之必要。永乐之后,洪熙仅一年,继而至宣德二年之中,大钟已告成,所以大钟自然也就保留了永乐年号款识。故此,“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的款识所表明的实际上是兴铸之时,而不是成铸之时。为何年号款识无具体年月时间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铸钟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和困难,难保其成功率,在制作陶范之初,无法预料钟体何时能够浇铸成功,所以浇铸成功的时间实际上是个未知数,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某一吉日实施。这更说明款识是在永乐年间就确定好的,后人是不应随意改变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四丁未”时间因与钟体款识不符而“失去说服力”,^⑫笔者认为,所谓“四丁未”的记述纯属明时文人的见闻,并非作者对大钟铸造时间的推断或分析,故不存在所谓说服力问题。“彼时所见,当属不诬”,这是后人对这个记述的评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四丁未”的含义,它究竟反映了哪些文化现象。

二、姚广孝监铸记载与兴铸时间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永乐十六年(1418年)姚广孝入觐北平之时,“永乐大钟已有初步规模,甚至可能已接近完成”,“只有铸造已经结束或快结束,总监之人前来视察才有意义”,由此“完全可以推测为1418年至

1419年间所铸”,^⑬如按此说所讲,永乐十五年下半年起造大钟,至十六年或十七年结束,大钟的铸造工期为一两年时间,此种说法恐与实际情况有悖。姑且不说择吉的问题,大钟实际的工艺过程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工期,更何况“华严钟厂旧钟高二丈余,阔一丈余者尚有十数,仆地上,皆楷书佛经”。^⑭可见,铸造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其前期筹划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之后,陶范的制作更需较长的时间。对此,明人袁宏道曾有诗描述曰:“锤沙画腊十许年”,^⑮说的就是大钟的制型工期大约花费了10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见,在短期内大钟铸造成型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姚广孝于永乐十六年觐京监铸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姚广孝于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北平,受命监铸永乐大钟,其任务应是主持永乐大钟的开工仪式及决定大钟的制作方案,而非视察已初具规模的大钟。理由如下:一、大钟的铸造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佛事活动,而按照佛界的规矩,如此重大的佛事活动必定要举行一定规模的佛事道场作为开工仪式,而请姚广孝这位身居僧录司之职的要员主持这个法会,既说明了成祖对他的器重,也说明了此项工程的重要性。姚“必受诏造工,择日行礼,亲莅铸钟之事”。^⑯二、姚广孝作为一名僧人来监造大钟,其作用只能是对佛钟所刻经文诸事进行监察指导,这也是僧录司官职份内之事,而非对大钟铸造工程或工艺进行监督。故此,姚广孝去世后,对大钟以后的铸造工程无任何不利影响。对姚广孝的监铸记录不过是表示对他主持工程特别重视而已。三、成祖在永乐十五年御制《名经》后,欲将其铸刻于佛钟之上,此事非同一般事件,故应有一段筹划准备的时间。之后在次年的永乐十六年三月派姚广孝觐京主持开工仪式并监督检查铸钟的方案,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筹划阶段,应包括经文的选择、经文的楷书书写、经文在钟体上的布局设计,以及工匠的遴选、铸钟场地的筹建等诸多事宜。

由以上理由可以推断,永乐大钟的兴铸

时间应为姚广孝窥京的当年,即永乐十六年(1418年)。对于这个时间,笔者运用堪舆易理研究后发现,这一年(戊戌年)也是铸钟所应选择吉年。关于这点,后文将加以说明。

三、大钟兴铸目的与成铸时间分析

第四种意见认为,“永乐大钟只有在1421年正月以前铸成并安装完毕,才有可能在众臣朝贺朱棣定鼎北京举办隆重的佛事活动时鸣响才有意义。”^⑩这个意见认为历史事件是决定大钟成铸时间的关键因素,也就是大钟的成铸目的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推测是否准确呢?由于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只能依据后来的情况进行分析。假设如果实际情况真的是大钟在永乐十八年前已铸成,按其成铸目的,大钟应悬于某处以为佛事活动所用,而不宜卧地存放。但大钟铸成后,惟一的记载是将其收藏在汉经厂。那么,汉经厂是否就是悬挂大钟的场所呢?

首先,看文献上是如何记载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永乐大钟悬于万寿寺时,称大钟“向藏汉经厂,于是救悬寺。”^⑪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蒸云炙日卧九朝,监寺优官谁敢触。”^⑫“向藏”和“卧九朝”是指从宣德以后到隆庆九朝皇帝时期,大钟始终处于卧地收藏的状况。这表明永乐大钟在铸成以后始终收藏在汉经厂内而无人过问。那么,汉经厂的功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大钟会收藏在汉经厂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也就会明白永乐大钟实际上没有在水乐十八年前作为定鼎佛教法物而铸成。

汉经厂的功用,从张居正所撰《教匪万寿寺碑文》中即可清楚看出,“初,禁垣夙隅有番汉二经厂,其来久矣。庄皇帝尝诏重修,以祝誓延熹,厥功未就。今上践祚之五年,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谕,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⑬据碑文可知,汉经厂本是收藏汉文佛经的场所。万寿寺的创建,即为取代汉经厂收藏汉文佛经。永

乐十九年,成祖下令在北京刊刻汉文《大藏经》,即后人所称的《永乐北藏》。刊刻《大藏经》的活动,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共用了20年的时间,共刊印佛经1621部,6361卷。^⑭汉经厂为此而兴建,用来收藏经板和佛经文献。永乐大钟之所以收藏在汉经厂,笔者认为,大钟周身刻满佛经佛咒,实际上是作为佛经文献传播的一种形式,钟体被用做永久性保存佛经的载体。所以大钟实际上是作为佛经文献的一种版本而收藏在汉经厂的。至于汉经厂制度中有官员到该厂举行佛事活动,不过是利用其场地而已,与大钟及其佛经的收藏并无干系。故大钟在汉经厂并无悬击的记载。万寿寺取代汉经厂而收藏汉文佛经后,大钟也相应迁往。同时关于大钟悬于万寿寺的记载频频出现,诸如“救悬寺”、“旧悬万寿寺”^⑮的记录。而此前只有“向藏汉经厂”的记载。一“藏”一“悬”的记载,说明了大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大钟在汉经厂既无悬钟也无击钟的记载,说明它并没有在铸成后立即受到重视或启用。

一种观点认为,汉经厂在成祖去世后,其制度遭废弃,因而大钟也遭废弃的命运。^⑯这里首先应明确,汉经厂与汉经厂制度是两个概念。事实上,成祖去世后,汉经厂还延续了16年的刊刻《大藏经》活动。五年后的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又发布谕旨,令将汉经厂收藏的这部《永乐北藏》中的各部经典陆续作为皇家颁赐各大寺院之用。^⑰从文献记载的颁赐情况看,佛经的颁赐活动从正统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即使在崇道度佛的嘉靖年间,也有过颁赐佛经的情形。万历年间又继续刊刻《大藏经》,并与《永乐北藏》通行颁赐。从这些记载可见,汉经厂在成祖之后一直在发挥着作用。既然如此,永乐大钟作为皇家佛教法物收藏于汉经厂,应与汉文佛经的命运相同,它始终收藏在汉经厂,只是没有像佛经那样被赐往某一寺院,而绝不应有被废弃的情况出现。到了隆庆年间,才有了重修汉经厂的意愿,万历年间则以兴建万寿寺来取代汉经厂

的功用。所谓经厂制度废弃,应只是在嘉靖年间明世宗崇道废佛而出现的普遍废弃佛事的一则,大钟在议经厂的收藏并未受其影响。

四、铸钟工期及吉日易理的分析

大钟的铸造工期究竟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较难说清的问题。但是这个工期是受到择吉的限制和影响的。有一种观点从工艺角度的需要来说想工期的道理是成立的,该观点认为,“按当时铸钟工艺水平和制造难度推测,铸永乐大钟的前期制型工程,至少要二至三年,浇铸虽一铸而成,前后期工程都算上,多则三至五年。”^[2]工期的初始陶范制作和浇铸结束阶段都要选择吉日而行,所以这里讨论的问题实际就是工期前期的开工吉日及后期的开工吉日。

铸钟的前期工期是个较长的周期。如永乐十五年开始筹划大钟的铸造事宜,前期工程选在永乐十六年开始也是工程的一种工艺需要,当然择吉开工更是前提。前期制作陶范的工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钟体软识可以认定,大钟的陶范制作应在永乐年间完成。后期浇铸工程因等待吉日的到来而未能永乐年间及时实施。前期的吉日确定后,后期的吉日要考虑前期工期周期的许可。根据择吉及铸钟工期的要求,这个时间定在了未年,即开工后的第十年。

永乐大钟的铸造为何要选择永乐十六年和宣德二年两个吉日呢?

先从成铸时间的“四丁未”吉日谈起。笔者曾在《悬卧考》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笔者经查发现,这个宣德年间的“四丁未”并不存在。在宣德丁未年的丁未月中,并无丁未日,而只有了卯和丁丑两个丁日。故“四丁未”吉日只满足了三个。但是,古人的传说不能否定铸钟择吉大体时间的史实。那么,宣德丁未年究竟是以何种理论取定为择吉的时间选择呢?

原来古人在此处择吉使用的是易学堪舆九星术。九星的变化就叫九星术,又叫九

宫术或九宫算,专门从事九星术的人就被称为九星家。九星术是九星家用以推断人事吉凶的一种卜算方法,属于堪舆术的一个流派。堪舆学就是研究特定环境在不同方位、不同时辰的吉凶的一门学问。本文仅对古人运用这种学说去指导择吉的行为作一番解说。

洛书九宫使用后天八卦配上星的概念,即为洛书九星方位图。洛书九宫所配九星,又称“紫白九星”。紫白九星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在不同的时间流逝中按一定的轨迹飞行,这些轨迹称为飞星轨迹,或叫洛书轨迹。洛书九星方位图如下:

巽宫 东南 四绿木星	离宫 南 九紫火星	坤宫 西南 二黑土星
震宫 东 三碧木星	中宫 五黄土星	兑宫 西 七赤金星
艮宫 东北 八白土星	坎宫 北 一白水星	乾宫 西北 六白金星

所谓飞星轨迹,就是指一白水星从坎宫飞到二黑土星所在的坤宫,二黑飞入三碧震宫,依此类推。此种方向又称为顺飞,反之则称为逆飞。洛书九宫飞星,加入了时间因素,就具有应用的价值。这个时间的因素就是“三元九运”。各种运中,凡是飞入中宫的九星,则主宰当时的运气。相传在公元前2697年,黄帝命大槩以干支纪年,定此年为黄帝元年,甲子为始元。以后每60年为一甲子周期,俗称“六十花甲”。一个花甲为一元,三个花甲定为三元。三元分为上元、中元、下元,合180年。每一个花甲为一大运。

所谓大运,就是洛书九星每60年逆行一步。从黄帝元年开始行第一步,即六白金星逆行飞入中宫主宰当运。黄帝六十一年开始,七赤金星逆行飞入中宫主宰该运。在每一个元的60年中,又分为三个小运,每个小运20年。每20年就有一个星逆行入中宫,主宰20年的小运。每个小运的20年中,每年的气运又各有不同。每年都有一个星飞入中宫,主宰一年的气运。下面是明初三元九运年限表:

年 号	大 运	中 运	小 运		
明洪武十七年	二 黑	中 元	四绿 1384	五黄 1404	六白 1424
正統九年	三 碧	下 元	七赤 1444	八白 1464	九紫 1484

根据这个表可知,永乐二年(1404)开始进入五黄小运,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入六

白小运。下面是永乐十五年丁酉年至宣德二年丁未年间飞星主宰列表:

四绿	三碧	二黑	一白	九紫	八白	七赤	六白	五黄
						丁酉 1417	戊戌 1418	己亥 1419
庚子 1420	辛丑 1421	壬寅 1422	癸卯 1423	甲辰 1424	乙巳 1425	丙午 1426	丁未 1427	

从此表可知,永乐十六年戊戌年和宣德二年丁未年均均为六白金星主宰当年气运。这两个年份是笔者前面所涉及的铸钟的两个吉日所选择的年份。

堪舆九星术认为,当一种星主宰当年或当时,称为当令,其气场最旺。该星所代表的天、地、人、物诸物象也将受到该气场的影响而产生旺的变化,而其他物象则会有衰的变化。按古人的观念,大钟的铸造必定要选在适合其气场当旺的年份。六白金星的气场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六白金星本居乾宫,《说卦》认为:“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王,为金,……”。堪舆理论依据《说卦》对乾所代表的物象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其于器物为钟鼎。^②由此可知大钟为何选在这样两个吉年实施铸造工程了。选择宣德丁未年成铸大钟,还在于此时已进入六白金星主宰的20年小运,小运和年运均为六白金星主宰,古人认为此时金气最旺盛,十分有利于大钟的铸造成功。

五、结 论

通过以上四种分析的综合评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永乐大钟的铸造筹划阶段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六年(戊戌年,1418年)以姚广孝亲京主持大钟的起造工程,大钟开始实施前期工程(陶范制作);

宣德二年(丁未年,1427年)大钟实施浇铸工程。

①此文见于《北京文博》1996年第一期。

②③④见《北京文博》1995年第一期《永乐大钟研究》一文。

⑤《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国朝苑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96页。

⑥《宸垣识略·卷十六·识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338页。

⑦以上这些观点见于《北京文博》1995年第一期《明永乐大钟研究》和1999年第二期《永乐大钟三辨》二文。

⑧⑨⑩⑪见《北京文博》1999年第二期《永乐大钟三辨》一文。

⑫⑬《宸垣识略·卷八·内城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57页。

⑭⑮⑯《清京景物略·卷五·万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02页。

⑰《张太岳集·敕建万寿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150页。

⑱见魏承思著《中国佛教文化论稿》第二章《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页。

⑲《宛署杂记》卷十八《万字·一藏典》,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20页。

⑳见胡京国著《古易玄学新探》一书“第五节:九星物象”第87页。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西山凤凰岭石窟调查

温玉成 刘建华

凤凰岭石窟，位于西山农场以西之西山山，今存吕祖洞、朝阳洞、仙人洞、三佛洞及玄元洞等五窟，尚无人报道。

今西山，其南段又称“阳台山”。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可知：辽咸雍四年三月（1068）即创建“清水院”^①。《帝京景物略》载，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明宣宗宣德三年四月十七日（1428），改称“大觉寺”^②，俾居高僧智光（1355—1435）^③。智光两使西域，至乌斯藏及尼泊尔，时为“大国师”，卒后赠“西天佛子”（1436），又赠“大通

法王”^④。

石窟在大觉寺正北约3公里。据今存明成化二年（1466）圆融显密大宗师播阳道琛撰碑略云：此地是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创建的黄晋院（圣水院）。明宣德九年（1434），由尚膳监太监尹奉、尚衣监太监崔安，喜捨金帛重修，正统三年春（1438）告成，敕赐“妙觉禅寺”。

此地后于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又改称“明照禅院”。这是一处太监们的功德寺。

吕祖洞在车耳营村东南方,洞室深广,但无造像。明代大画家文征明(1470—1559)在《西山杂咏》十二首中,有《吕公洞》诗,内云:“何时神斧劈幽崖,古室春雷福地开。翠壁未磨耶律字,石床曾卧吕公来……”^⑤。似指此洞为耶律铸崇道所造,惜未刻字而已。耶律铸(1221—1285)是耶律楚材的次子,以崇道著称,其墓已在颐和园发现^⑥。

朝阳洞,在九女缸村北,宽约6公尺,深约2公尺,壁上无造像及雕饰。今以砖砌成三个券门。两侧有空龛,亦砌为券门。此洞及洞前院落,应是明代“明照禅院”旧址。洞中原供奉观音菩萨,故又称“观音庵”。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卷4云:“朝阳水洞,在县西五十里白家滩,洞内有观音庵。”

朝阳洞始凿年代不详,恐系元代僧人所造。

洞南约20公尺有金刚石突兀,上造一座玲珑的宝塔。类似北京西四“万松老人塔”,成为元代所造。

仙人洞,又称魏老爷洞,在今龙泉寺西北。洞方形,后壁及左壁下方未加工平整,洞内无雕饰。始凿年代,似在元、明,应是一处禅窟。



仙人洞

三佛洞在仙人洞东北,方形,高宽深均约2公尺。后壁正中浮雕三个相连的尖拱龛。中龛关羽(161—219)坐像,头部残,坐姿如同勇猛趺坐,双手持一大刀,置于双腿及地上。左龛为侍者,双手捧印,侧面向

关羽而坐,身后背一宝剑。其类似形象又见于辽宁阜新市海棠山关帝三尊龛^⑦。可知这是关羽之子关平。右龛为一善跏趺坐佛,左手抚膝,右手举于胸前,作说法印。

此龛三尊像的布局,关羽居中,以佛及关平为胁侍,全国仅此一见。明代洪武年间,追封关羽为“关寿亭侯”,万历十年,追封为“协天大帝”。推测此像造于明末的万历十年以后,崇禎十七年以前(1582—1644)。



三佛洞



三佛洞浮雕石像

玄元洞在三佛洞东北,方形,平顶,大小与三佛洞相似。该洞后壁造一长方形大龛,上部刻椽椽,下部刻三身坐佛,皆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之上。佛像头上肉髻作尖帽状,大耳,皆袒右肩,中间坐佛作降魔印,左侧坐佛作禅定印,右侧坐佛作说法印。这应是“三世佛”造像。

右壁为二坐佛一侍立者;左壁为一坐佛一侍立者。坐佛皆袒右肩,禅定印。侍立者似为罗汉,双手合十而立。左壁右上角刻字

曰“孟安信□□”，应是该龕的功德主。

玄元洞造像显然承袭了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有较明显的明代藏传佛教特征，故应定为明代中期所作。这与玄元洞南下方的瓶状喇嘛塔——“继昇塔”相呼应。因继昇为“龙泉寺”第一代住持，从而可知龙泉寺重修于明代中期，且兼宏藏传佛教。



玄元洞



玄元洞正壁浮雕石像



玄元洞左壁浮雕石像



玄元洞右壁浮雕石像

总之，北京西山凤凰岭石窟，可分为三区。南区有吕祖洞及上洞（此次未调查），似是元代耶律铸崇道所作。中区朝阳洞，恐系元代僧人所作。北区三窟，以今龙泉寺为中心布列。玄元洞“三世佛”等应造于明代中期；三佛洞“关帝三尊”像，造于明末；而仙人洞可能是一处元、明时代的禅窟。

北京门头沟区石佛村有摩崖造像 17 龕，造于明天顺至万历年间^①。此次调查的 5 个石窟，又为北京地区的石刻造像研究增添了新的宝贵资料。调查工作，得到了西山农场刘瑞柱、郝仲泉等同志的协助，特表谢忱。

①王昶：《金石萃编》，卷 153。

②沈榜：《宛署杂记》，卷 18《御制大觉寺碑》。

③明河：《补续高僧传·智光传》。

④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载《佛学研究》，1997 年刊。

⑤同[2]，卷 20。

⑥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 月 31 日。

⑦温玉成：《关公显圣与佛教造像》，《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版。

⑧胡玉远：《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版。

（作者为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干部
本文照片由高二跃提供）



吕徵墓表考释

· 任秀侠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辽金石刻展区藏有一通立于大定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金代墓表。该表为四方柱形，带有雕为两层实为一体的正方形基座，表顶贯以重檐叠顶盖石两方。基座边长 85 厘米，高 30 厘米；表身边长 56 厘米，高 205 厘米。表身四面满携楷书，共刻 31 行，满行 27 字。表首正面篆刻“吕君墓表”四字，蔡珪篆书，任询撰文并书丹，刻工宫伯元。该表 1991 年出土于丰台区石榴庄凉水河南岸，赵福生先生在《书法丛刊》1992 年第四期发表了墓表拓片并介绍了其书法价值。范军女士在《北京文博》2000 年第一期《金代碑刻叙录》中曾将本表收入目录中。^①本文拟简单介绍墓表的发展史并对该墓表作初步的考释。

墓表是墓碑的一种，外形似柱，结合了墓碑和墓志两种功能。西汉时期的墓表是木质的，用来标识墓域。颜师古注《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曰：“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石刻兴起后，木质改用石质，东汉的许多墓碑仍自称墓表。北京出土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南朝“萧景墓表”是墓表形制演示之轨迹。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墓表由起始的标识墓域变为表墓主的生卒、世系、功德业绩。墓碑常见而墓表不常见。1949 年以来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志也不过十几函，与北京曾为金中郡的地位不相称。所以这座墓表姑不论其表文价值，仅其特殊的造型和刻立的年代已经弥足珍贵了。

一、墓主家世

墓主吕徽及其祖父吕世宗、父吕温义，子吕师望、吕师孟、孙七十、八十、九十、和尙、应吉、孙女婢儿、韶容、媚容均于史无考。吕氏“号称豪族”，乃燕京土豪，未入仕途，金代非官员不可用墓志，是故吕徽死后用表便是其未曾做官的明证。其父吕温义冠以忠显之称，忠显应指忠显校尉，《金史》卷五《百官志（一）》：武散官从七品下为忠显校尉，可能是大定初年由捐纳而获得的。表第二面第五行“大定初，募献资助军储者……期免调役”，提及吕徽给自己和两个儿子以钱买爵免调役事，其时吕父可能已经过世，忠显校尉可能是吕徽为亡父追捐的官名。金朝在有战事的特殊情况下，往往实行捐纳之法。大定初年，一是因海陵王南侵而引起宋金战争，二是为镇压契丹人的大叛乱而用兵。“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数，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①，大定二年正月庚寅，“行纳粟补官法”^②。由表中记载的情况来看，金朝统治者很注意与金统区汉族豪族的关系。

二、吕徽履历

吕君卒于大定七年，享年五十八。他应生于辽天庆三年，宋政和三年。根据表文，吕徽终身未仕，但他从军戍镇阳，并且在同知开封府事刘梅手下和原王府中做过幕客。镇阳应是镇州（真定府）的别称。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金属河北西路。王若虚，栝城人（属真定府），金亡，微服北归镇阳^③，可证镇阳即真定府。吕徽从军戍镇阳当在金天会年间。蔡珪曾为吕徽墓表篆额，与吕君戍镇阳这段经历不无关系。皇统二年三月，“遣左副点检塞里，山东西路都转运使刘送天水郡王丧愆及宋帝母韦氏还江南”^④，都转运使为正三品诸府，同知一员正四品^⑤，是故刘梅任山东西路都转运使之前任同知开封府事。表文第二面第一行：“原王留守

京都……”。《金史》中共有两位原王，一位是章宗，章宗生于大定八年，大定二十五年封原王，判大兴府事，而表上的这位原王是大定七年以前的原王，故这位原王肯定不是金章宗。另一位原王是太子宗本，宗本本名阿鲁，天眷元年十月丙寅，金熙宗封“太子宗本为尚书右丞”^⑥，天眷二年九月戊寅朔“降封太宗诸子”^⑦。宗本封原王事见《金史》卷59《宗室传》。金史未记载宗本留守京都事，皇统九年正月丙午“判太宗正事宗本为尚书右丞相”^⑧，三月辛丑，“以司空宗本为尚书右丞兼推中书令”，九月戊戌“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⑨，“海陵篡立，进太傅，领三省事”^⑩。天德二年四月戊午，因萧裕、乌带等人的诬陷，“杀太傅，领三省事宗本”。宗本判太宗正事以前的历官不详，他留守京都当是皇统年间的事情，当时金都在上京会宁府，燕京土豪吕徽恐怕不会去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所以作者以为这个京都可能是指开封，因其为北宋都城，故时人习称京都。该墓表作者任洵虽祖籍为易州，但北宋未燕云十六州入宋，任洵生于宋之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幼年在宋，故按宋人的习惯称开封为京都都是情理中事。

三、蔡珪、任洵和宫伯元

吕君墓表四字为蔡珪所篆。蔡珪字正甫，蔡松年之子。中进士后先后任澄州军事判官、三河主簿、翰林修撰、户部员外郎兼太常丞等职。其父松年天会中任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人，正隆四年归葬真定。故蔡珪亦算真定人。吕徽墓表篆额，与他从军戍镇阳的经历不无关系。在其任户部员外郎期间，安国军节度判官高元鼎坐监，求援于太常博士田居安、吏部主事高震亨等。震亨下属鞠向官御史带典事李仲柔，李仲柔告发了他们。珪与任洵、何恕、高震亨等转相给元鼎支陌，有的让元鼎逃跑，结果，珪、洵、恕等各受笞四十。过了很长时间才被起用，蔡珪与表文撰者任洵之关系既是同僚也是好友。

任洵字君谟，易州军市人，生于虔州。^⑪

正隆二年中进士，历任中下级官吏。《金史》本传中没有提及任询任宛平主簿的经历，只有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史，倒是蔡珪传中高元鼎事提及宛平主簿任询与吕君墓表相吻合，任询任宛平主簿事当在大定七年之前。任询书为当时第一，画亦人妙品^①，今人能睹任询真迹，当感谢刻工宫伯元。宫伯元不见于经传。房山云居寺辽代石刻中，宫姓刻工多达9人。^②

吕君墓表录文如下：

吕君墓表

朝散大夫，行大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珪篆，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任询撰并书。

君讳微，字良弼，世宗之孙，思显温义之子。累叶居燕，号称豪族。皆以德相承，流泽潋洏。君仲其美，受性淳厚，刚静沉和，雅慎流俗，挺志高远，不苟易笑言。体貌雄深，俨然可畏，即之温如也。从军戍慎阳，物价倍徙，修具待宾，馆无虚日。亲旧投谒，必殚楮挥金，使充其欲。周货穷乏，恒推隐恤。故门多长者之游，于今三十年，一食无客至，盖阙如也。刘洵，幽人也，武政开封，延君为上客，并倍呼靡，朋游多燕乐，如君以澹泊自持，语人曰：“吕族丰大，宜矣。”厚王留守京都，俊杰满前，气相吞压。君居前列，以德义压服之。善射驭，不畜属犬，谓以田猎从嬉戏，何苦伤生为。有马癖，盖喜其神骏。人有善马，就求皆相。驭下早施鞭扑，使皆衣食充足，徭赋或仆走聘应，未尝以一事到官府。虽闲与权贵游，不以私故请托，士论休之。大定初，募献资助军储者，授爵有差。君以钱千万及二子取爵，非有仕宦意，期免调役耳。国家通籍，务在均当，主者胶固其上下，或采君言以定，众服当论。人之毁誉，不更口妄；人之穷达，不改所遇。乐施畏人知，取义各极其情蕴。每留心造妙，故其诣不取。人或谕以美白术者，君笑而不答，徐曰：“神离智慧，彼将安用。”客有李生，自辽东来，求识君面，如其行事，退而叹曰：“燕蔚

之东数千里，岂多见此仁者。”无何，以大定七年四月示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六月十九日葬于祖塋之吉穴，妻赵氏合葬。君将卒之夕，有至翔于第之东南，邻里皆见之。平日诵浮图经语万过，夜拜斗不辍，凡四十年。君之德业固不可一二数，观其众所与则罕矣。就殓之日，送者倾里闾。缙绅之士，行路之人，识与不识，靡不悼伤，或曰：苍天不吊，夺我善人。”是知其生也，人皆好之，及其亡也，人皆伤之。余爱遗音，所思何已。夫穷通之数，倚伏纷纭，悬天有期，在人莫辨。君有淑善，逮于当时，禀命不永，岂其数邪。虽阴宝不留，而德辉靡谢。春兰秋菊，却馥英华。故有男师望、师孟，皆得贤者誉。克承堂构，天报非远。询从君聚其弟子游逾二十年，故深知其德履之详。矧思克报屈，钻心莫升。谨托请文辞，刊于金石，庶几不朽者欤。铭曰：于美世族，振家以仁。性君性厚，刚贞静淳。宇量雄雅，志存兼济。岂如他人，顺利忘义。好客不倦，宾来如归。原常中陵，并驱争驰。玉贵于世，光不盈握。德积于身，洞照冥渺。迅迅骋驹，滔滔运川。青云莫与，白日谁怜。它山之石，刻文垂久。彰显令德，克光厥后。

大定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建。师望之男七十，九十。和尚，女得儿。师孟之男八十，应吉，女韶容、媚容。

宫伯元刻

①赵福生《书法丛刊》1992年第3期60页，范军《金代碑刻叙录》，《北京文博》2000年第1期88页。

②《金史》卷50，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第1124页。

③《金史》卷6，第125页。

④⑤《金史》卷79，第1794页。

⑥《金史》卷57，第1311页。

⑦《金史》卷4，第73页。

⑧《金史》卷4，第75页。

⑨⑩《金史》卷4，第85页。

⑪⑫《金史》卷76，第1371页。

⑬《金史》卷126，第2737页。

⑭曾毅公：《石刻与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作者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馆员）



图版 9

辽瓷造型及其装饰艺术

——兼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藏品介绍

卢迎红 高继祥 黄秀纯

辽代陶瓷器是我国北方契丹民族在接受唐五代时期汉文化的影响,结合本民族的习俗,创造出来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这些历史文化遗物,既反映了契丹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又反映了契丹族和汉族等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辽瓷以富有浓郁游牧生活气息的造型,在我国五代与北宋时期的南北瓷窑所烧制的产品中独树一帜。

辽瓷的造型和装饰是适应人民生活要求和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它不仅凝聚了契丹民族的思想感情、审美意趣,同时反映出契丹与汉族杂居生活的面貌。辽陶瓷器的造型,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种。属中原式的陶瓷器,是按照中原汉文化固有形式烧造的,主要有碗、盘、碟、杯、盆、盒、瓶、壶、瓮、钵等,以及棋子、砚、各种动物雕塑的玩具、佛教用具等。属于契丹形式的陶瓷器有长颈瓶、凤首瓶、筒式瓶、穿带瓶、注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三角形盘、方碟,其中有的是盛食器,有的是贮藏糖和注器。此类器物的造型都具有契丹族传统的独特风格。

本文介绍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的藏品,是以具有契丹族风格的陶瓷器为主,有白

釉、黑釉及三彩釉。

—

辽代陶瓷器造型独特和富于变化,这一方面体现了辽瓷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辽瓷的高超工艺和烧造水平。同时,在不断演变和此起彼伏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外来因素使民族形式得到进一步加强,民族传统愈加丰富。在契丹人完成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以后,吸收了中原瓷器丰富造型艺术,溶入本土艺术的血液里,构成了辽瓷粗犷、雄浑的造型风格,与中原瓷器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契丹族源于东胡,从它在辽河上游开始崛起以来,一直过着“转徙为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因此“逐水草,随寒暑,往来渔猎”的不定居生活方式对辽代瓷业影响很大,更影响辽瓷造型和装饰。如鸡冠壶,在辽瓷器型中是非常有特色的品种,造型别致,形体变化丰富,是辽瓷艺术中的精粹。它们源于早期契丹人流转迁徙途中使用的革袋制品,亦称“皮囊壶”、“马盃壶”。有学者认为鸡冠壶古代原称马盃^①。最早期鸡冠壶为扁身单孔式,一个“驼峰”(鸡冠壶)当

中穿系孔。稍后,“驼峰”形成马鞍状、双峰等,后来又有在盖上加猴形生者,寓意“马上封侯”之意。晚期则出现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②。

辽金馆藏有 10 余件鸡冠壶,按其形制可分三式:

1 式,扁身单孔式,6 件,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圈足。灰白胎粗糙坚硬,施半截白釉呈黄。标本:1,高 25cm,口径 4.3cm,腹径 16.5cm,底径 10.5cm(图版 1)。商家沟一号辽墓出土的鸡冠壶与此形制相同,应为早期作品^③。

2 式,扁身双孔式,2 件,器身较高,扁身,上薄下厚,管状短注。壶身上部为马鞍形双孔。标本:2,高 24cm,口径 4.5cm,底径 7.5cm,灰褐胎粗糙,墨绿釉光亮,壶身系仿照皮囊式缝合而成,两侧正中刻卷草花纹(图版 2 辽宁北票水泉 1 号辽墓有出土^④)。

3 式,扁身环梁式,10 件,壶身作扁圆体,高身圈足,口无颈,高环梁。器身有皮条、皮扣装饰,环梁作皮绳或皮环状。标本:3,黄白胎,粗糙,淡绿釉,光亮,玻璃感较强。高 34cm,腹径 17cm,底径 10.7cm(图版 3);标本:4,扁圆形,小口细长颈,曲把高环梁,圆腹下收,圈足,黄白胎,施化妆土,墨绿釉,光亮。高 32.6cm,腹径 13cm,底径 9cm,(图版 4);标本:5,扁圆形,小口短颈,曲把环梁,圆腹下垂,大圈足,黄白胎,坚硬,白釉泛黄,略有光泽。釉下施化妆土,高 17.2cm,腹径 9.9cm,底径 6.2cm(图版 5)。

风首瓶为辽代特有器型,它将生动形象的风首与器形巧妙结合,打破了一般盘口瓶单调呆板的造型,取得了变化优美的艺术效果。主要特征为花式杯口,环纹长颈,宽肩,瘦足,底足外展。口下塑一张目曲喙衔珠或曲喙张口的风首。有的花式杯口作风冠形,有的长颈作竹节式,也有饰以弦纹两道。辽早期至晚期是由口部的四曲花式口变为花式杯口,颈部由伸颈直立的全风,张目曲喙衔珠,变为晚期风尾突出,颈与腹瘦长,底部也由平底变成圈足。风首瓶在西亚地区很早就已盛行,唐代陶瓷中有类似的制品。辽

瓷制品,也受到了影响。辽金馆藏有两件风首瓶,以标本:6,保存较好,风首张目曲喙衔珠,长颈,广肩,圆腹下收,微圈足。灰白胎,施半截黄釉,光亮细润,釉下施化妆土。高 34cm,口径 8cm,腹径 14.6cm,底径 7.7cm(图版 6)。朝阳前窗子辽墓出土的风首瓶与该瓶样式相同,应为辽早期作品^⑤。

长颈瓶,绿釉长颈,喇叭口,肩宽细足,颈中部凸起弦纹数道,高 35cm,口径 9.5cm,腹径 12.2cm,底径 6.8cm(图版 7)。此是辽早期形式。辽晚期长颈瓶作喇叭口,长颈,宽肩,瘦足,肩部饰有弦纹一道。

盘口长颈瓶与盘口长颈注壶均为风首瓶的演化,也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

盘口长颈瓶的主要特征为盘式口,长颈,宽肩,瘦足。并有大盘口和小盘口之分。大盘口长颈瓶,盘口作浅盘式,细长颈,宽肩腹,底足外展,器身圆肥。小盘口颈瓶为盘口作立壁浅盘式,细长颈,肩宽下收,器身细长。标本:7,为小盘口长颈瓶,通体绿釉细润光亮,高 36.4cm,口径 10.5cm,腹径 14cm,底径 7cm(图版 8)。

盘口长颈瓶可分为无把注壶和有把执壶,均为壶身圆矮,大盘口,细长颈,短注,扁宽腹,圈足。

盘口长颈瓶:1 件,盘式口较浅,竹节状细长颈,短直流,圆肩收腹,假圈足。标本:9,白胎,灰白釉粗糙,高 27.3cm,口径 11cm,底径 8cm。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白瓷盘口长颈注壶与此壶样式雷同,应为辽早期器物^⑥(图版 9)。标本:10,花式口,较深,细长颈,广肩,饰直流,腹下收,圈足。白胎坚硬,青白釉莹润光亮。高 28.7cm,口径 9.8cm,腹径 14cm,底径 8.5cm(图版 10)。北票水泉 M1 出土的注壶与标本:10,型制基本相同,亦应为辽早期器物^⑦。

有把注壶,1 件,标本:11,直口,长颈,球形腹,一侧置直流,另一侧饰变形把柄圈足,肩部刻刻荷叶纹,黄白胎坚硬,施白釉略显灰,光亮。高 18.5cm,口径 4.8cm,腹径 16.6cm,底足 8.9cm(图版 11)。

白釉葫芦形水注,1 件,标本:12,花式



图版 1



图版 2



图版 3



图版 4



图版 5



图版 6



图版 7



图版 8



图版 10

小口,壶身呈葫芦形,曲形把首,一侧直流。白胎,白釉略呈黄,高 28.2cm、口径 3.2cm、底径 8cm。整体比例匀称,造型生动。葫芦形水注是辽瓷常见的器物造型,艺术家们在器体的大块空间上,对于口流、把手等细部进行艺术构思,高高的曲形把手,相对低的委流,一高一矮,通过这种不均衡的形式,收到了稳定效果,这种形式美就是建构在整体控制细部的基础上创造的,堪称契丹人对整体造型把握的典型作例^①(图版 12)。

盘口瓜棱壶:1件。标本:13,大盘口,宽折沿,短颈,溜肩鼓腹,瓜棱状,大圈足。灰白胎坚硬,墨绿色釉反银,高 29cm、口径 12.7cm、底径 10.5cm(图版 13)。

葫芦瓶 1件,标本:14,小口,短颈,葫芦形,球形腹,圈足。颈、肩部饰双系。白胎粗糙,白釉不到底,略有光泽。造型新颖别致。高 13cm、口径 3cm、底径 6.7cm(图版 14)。

双系瓶 1件,标本:15,小口,圆唇,溜肩,球腹下收,圈足,肩部饰双系,黄白胎,腹以上施黑釉,壶面光亮,高 18.2cm、口径 4.6cm、底足 8.8cm(图版 15)。

敞口尊:4件,黄釉,白釉各 2件。样式相同,大小不一。敞口,圆唇,长颈,折肩,垂腹,圈足。标本:16,白胎坚硬,通体施黄釉,光亮莹润。高 22.7cm、口径 10.6cm、腹径 14.1cm、足径 8cm(图版 16)。

板耳尊:1件,直口,长颈,折肩深腹,弧壁下收大圈足,一侧饰曲柄耳,黄褐胎松软,通体施绿釉,略有光泽。高 14.4cm、口径 6.7cm、腹径 13.4cm、底径 6.6cm(图版 17)。

绿釉罐:1件,直口,短颈,方唇,广肩圆腹下收,平底假圈足。黄褐胎,通体墨绿釉,细腻莹润玻璃感较强,内有细小开片,腹身划刻特开放,高 22cm、口径 9.3cm、底径 11.3cm(图版 18)。

穿带瓶是唐代人喜用的一种盛水具,以邢窑白瓷制品最为著名。辽契丹人吸收了汉文化背壶的优点,在器身两侧各设对称的凹槽穿系。标本:17,敞口,短颈,广肩,垂腹,大圈足,两侧有穿系,便于手提肩背,造

用于马背民族的游牧生活。白胎,白釉光亮,高 41.4cm、口径 10.8cm、底径 15.3cm(图版 19)。该器物与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穿带瓶的形制相同,应为辽早期遗物。^②

黄釉碗:1件,侈口,圆唇,深腹,弧壁,圈足,灰白胎粗糙坚硬,施黄釉略有光泽。高 8.4cm、口径 20.1cm、底径 7.3cm(图版 20)。

黄釉盘:1件,敞口,宽折沿,折腹,平底,大圈足,灰白胎粗糙坚硬,通体施黄釉,莹润光亮。高 7.7cm、口径 39.7cm、底径 11.5cm(图版 21)。

白釉盘:1件,敞口,卷唇,深腹,弧壁,平底,大圈足,灰白胎粗糙,白釉光亮。底部施绿釉花卉。高 7.4cm、口径 27.6cm、底径 15.5cm(图版 22)。

绿釉盘:1件,折沿,方唇,浅腹,弧壁,圈足,灰白胎细密,施绿釉莹润光亮。高 6.9cm、口径 26.2cm(图版 23)。

海棠式长盘:圆盘同为辽契丹族特殊的器物。其造型与唐代流行的金属捶制的曲边长盘或圆盘形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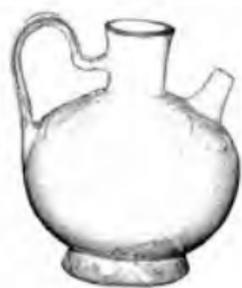
海棠花式长盘:3件,盘作八曲海棠花式。宽折沿,浅腹,平底。标本:14,外壁施黄釉,折沿处刻回纹施绿釉,底部饰花卉施黄、绿釉,高 2.3cm、长 29.5cm、宽 17.4cm(图版 24)。

三彩圆盘:1件,敞口,浅腹,弧壁,小圈足。黄褐胎粗糙,外壁施黄釉,内施黄、绿、白三彩,内底印花并纹饰。高 5cm、口径 25.3cm、底径 8.5cm(图版 25)。

渣斗:1件,盘式口,颈,鼓腹,圈足。通体施黄釉,莹润光亮。黄褐胎坚硬,釉下施化妆土。高 9.7cm、口径 17.4cm、底径 6cm(图版 26)。

黄釉大盆:1件,沿深腹,弧壁,环底,浅圈足,内底刻刻花卉。白胎坚硬,通体施黄釉,莹润光亮。高 8.3cm、口径 32.3cm、底径 12.1cm(图版 27)。

白釉盆:1件,敞口,宽折沿,深腹,弧壁,平底,灰白胎粗糙,内施白釉,划刻三条鱼纹,鱼身及盆底点绿彩水草。高 8cm、口径 31cm、底径 18cm(图版 28)。



图版 11



图版 12



图版 13



图版 14



图版 15



图版 16



图版 17



图版 18



图版 19



图版 20



图版 21



图版 22



图版 23



图版 24



图版 25



图版 26



图版 27



图版 28

二

装饰与造型是对立统一的一个有机整体,任何陶瓷器上的装饰都是结合形体的特点达到装饰的目的。辽瓷的装饰密切配合造型,在艺术风格上两者完全协调。

辽瓷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剔花、印花、贴塑、描金、堆釉、剔花加彩等。这时期的装饰纹样内容丰富,在人物、动物、植物等方面,既有传统的题材又有反映时代的题材,常见的有:牡丹、莲花、芍药、荷花、葡萄、萱草、草叶、游鱼、大雁、野鸭、兔、犬、奔马、虎、龙凤、蝴蝶、蜜蜂、昆虫,此外还有云纹、钱纹、水波纹、火珠纹等。其中卷草纹、卷云纹等多用于鸡冠壶或器物的边饰,虽是寥寥几笔,却是显得简洁而潇洒。水波、流云、草花、圆钱纹等,一般都作为辅助花纹,也有偶而作为主要装饰的。有的还与刻划、彩画花饰同时并用,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辽瓷继承了唐宋瓷画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无论是描绘自然界中动、植物图案,还是反映契丹族生活习俗纹样,艺术家大都采用写实的技法,完成被装饰物和主体空间结构、纹饰的完美统一。如牡丹花是辽瓷中常用的题材,瓷器上面盛行牡丹纹饰,源于唐宋之际,有“富贵之花”、“王者之花”的美誉。文献记载辽曾种植过牡丹,且曾为“时人所尚”,辽瓷作品将牡丹花朵与枝叶加以变化,艺术手法上突出抓住了牡丹花的形象特征,将花进行写实化处理,生动灵活,飘拂的叶片上下翻转,花朵露出简化了的花蕊,花片层层叠叠,组织得自然,显得饱满富丽,形成了一组组有条理、有节奏、有韵律的装饰纹样。此外,鱼纹亦体现了辽代匠师植根于生活的创造精神。如白釉绿彩鱼纹大盆,器内绘三尾游鱼,艺术家们用线条装饰纹样,对鱼的轮廓和特征进行生动勾勒,把鱼在莲花、水草中穿游的神态,展示得惟妙惟肖^⑩。

辽代艺术匠师的审美活动,并没有停留

在造型、纹饰的感觉上,追求釉色之美,亦是辽瓷艺术的突出成就。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冬季皑皑白雪,夏季碧绿的草原,是跃入他们视野中的主要景色,反映在瓷釉釉色上,则是白釉瓷器,绿釉瓷器在辽代疆域的突出发展,体现了他们对明朗纯净色彩的爱好。白瓷渊源于中原地区,与北方的邢窑、定窑、磁州窑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契丹族“尚白”,“以白为吉”的习俗,恰好与这种爱好合拍,更加促进了白釉瓷器的迅猛发展。漆黑光亮的黑釉,在辽代瓷器作品中亦常施用,这种纯正的色调,同样反映了辽代艺术匠师明沉着的美学意趣。

辽三彩是在继承唐三彩风格和技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明创新,辽三彩不论是器物造型装饰艺术,还是烧造工艺都独树一帜,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辽代三彩釉色则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形成色彩鲜明的效果,实现了契丹人在生活中要求享受多彩多姿的美好愿望。

①张松柏:《马盂考》,《松州季刊》1987年4、5期。

②李文信:《辽瓷概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③邓学宝:《辽宁朝阳赵氏墓》,《文物》1983年9期。

④⑤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2期。

⑥靳振毅:《辽宁朝阳前旗户村辽墓》,《文物》1975年12期。

⑦冯永源:《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

⑧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8年1期。

⑨《辽耶律休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⑩辽宁省博物馆藏品三鱼盆与辽金馆藏三鱼盆相同。

(作者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馆长 卢迎红
辽金城垣博物馆助理馆员 高继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秀纯)



瓷器中的精品

——珐琅彩瓷器

赵世暖

到故宫宫器馆参观过的人,无不叹服珐琅彩瓷器的精美,人们不能不想起那个关于珐琅彩瓷器的传说。

相传历史上在我国江西瓷都附近,曾有一户胡姓人家,世代烧瓷为生。他家的瓷制品因为精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就惊动了官府。乾隆南巡时他的臣子将胡姓制瓷献给皇上,得到皇上大大赞美。大臣想让胡姓人进宫专为皇上和皇宫制瓷。因为种种原因姓胡的不愿意进宫,于是大臣们在宫里特设一个窑,按照胡姓人的烧制方法烧制出了精美的珐琅彩瓷器。为了表示宫里与民间的不同,也为了显示这种瓷器的出处,有人就将“胡”字拆开,将专为宫中烧的这种珐琅彩瓷器叫做“古月轩”。

一、传说很有味道,但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产物

珐琅彩瓷器的前身是景泰蓝,也就是所谓的“画珐琅”。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掐以铜丝,再填上红、黄、蓝、绿、白等色釉烧制而成的工艺品。后来这种“画珐琅”的方法被用在瓷胎上,珐琅彩瓷器

烧制成功于康熙年间。

珐琅彩的彩料还有“洋为中用”的成分。五彩和粉彩中都不含的化学成分“硼”珐琅彩中有;珐琅彩中含“钾”;康熙前的瓷器中黄色为氧化铁,而珐琅彩中黄色的成分是氧化锑;珐琅彩还有用康熙前没见过的胶体金着色的金红。上述化学成分分析说明了珐琅彩是国外引入的,文字上也有记载,宫中原名《瓷胎画珐琅》的档案于乾隆八年改名《瓷胎洋彩》。由此可见珐琅彩确是欧洲进口,由此更可见康熙帝国时中外文化与贸易交往的盛况。

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

珐琅彩瓷器没有大的器物造型,绝大多数是盘、碗、杯、瓶、盒、壶,其中碗、盘最多,只是每一品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珐琅彩瓷器在胎质的制作方面是非常讲究的。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在如此的胎质上又施釉极细,釉色极白,釉表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的现象,确可用“白璧无瑕”来赞誉。



乾隆款紫地轧道珐琅彩婴戏纹双联盖瓶



康熙款红地珐琅彩开光豆绿地牡丹纹杯

二、珐琅彩瓷器的研究重点是珐琅彩瓷器彩的绘画、质地和颜色

珐琅彩瓷器的绘画是精华的所在，也是鉴定真伪的关键一环。珐琅彩瓷器的胎、彩和造型终究逃不过同时期其他彩瓷器的影子，而绘画却有他独特的一面。珐琅彩的绘画大多出自宫廷御用纸绢画的画稿。据记载，从康熙到乾隆画供奉纸画的名画家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王原祁、蒋廷锡、郎世宁（意大利西洋画家）、冷梅、唐岱、高其佩、邹一桂、袁江、董邦达、金廷标、李世倬、沈佺、袁瑛、王敬铭、钱维城等等。这些名画家的画稿被画工精心地描绘于珐琅彩瓷器上，形神兼备，各具不同的风采。

珐琅彩绘的发展有各自的时代特点。

康熙时候的珐琅彩绘大都仿照铜胎画珐琅时的色彩图案。内容多为缠枝牡丹、缠枝西番莲、缠枝秋葵，也有写生花卉。构图上是讲究对称的规矩图案，花大叶大，内容简单，缺乏生气。这时彩色质地的衬托就显得非常有用，质地有红、黄、蓝、白等各种颜色，但所有色彩和绘画都在器物外面，内壁洁白。施色匀净是康熙珐琅彩的最大特点。

雍正初年时珐琅彩绘变化不大，构图仍是呆板的对称，但写生画开始多了起来，有了些活力，背景地仍是胭脂红、黄、蓝、白等色。到了雍正中期，“碗画”的工笔画在整个社会流行开来，很得雍正皇帝的赏识。珐琅彩瓷器的画工们迎合皇帝的好恶，在珐琅彩瓷器上以“碗画”为底稿，开始“勾、画、皴、染”，这也是珐琅彩瓷器独有的。绘画题材多为寓意深刻的芙蓉鸳鸯、灵芝水仙、锦鸡牡丹、梅兰竹菊、翠竹麻雀、秋树八哥等，更有各种山水楼阁画面。因为雍正本人喜欢水墨及设色山水，所以这些画中就有用赫、墨、蓝单色或两种颜色画的，极为淡雅清丽。

“团蝶图”则是集所有颜色于一身，据说有36种颜色之多。终究是纸绢画做底稿，这些画有直接在洁白如雪的瓷器上画的，有在设色上画的，但设计都很精巧。此时的器物身上仍多数是里不画，有少许里画的则外面就被敷上彩色。此时也偶见“锦灰堆”画法。

到了乾隆时期，珐琅彩绘画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一，前面已经提到的郎世宁这个意大利画师曾是乾隆的御用画工。画式画法中的阴阳向背与凹凸感就不仅出现在纸绢画上，也出现在珐琅彩瓷器的绘画上。珐琅彩绘上有用矾红勾画面部的，用不同浓淡、深浅，颜色表现人物衣衫，配景极为传神，



乾隆款黄地珐琅彩开光婴戏纹瓷瓶

这是中西结合的人物画法。其二，“锦灰堆”画法的大量运用。“锦灰堆”就是在一种彩色质地中用各种颜色绘制各式各样的织锦纹、丝绸纹和其他花纹，花纹中又添绘各式各样的缠枝花和其他图案，所以也叫“锦上添花”。“锦灰堆”这种繁密的华丽是乾隆在位时的流行时尚，而且愈演愈烈。乾隆后期，“锦灰堆”内还要根据画意的主题描绘大开光，再有多个小开光的也不新奇。开光内绘画山水、人物、诗句种种，极尽奢华之事。

现在谈到珐琅彩的质地。珐琅彩是用珐琅质与樟脑油调和而成的，因其彩料的质地像料，所以称作彩料。

珐琅彩料的彩，品种非常丰富，这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主要品种有白、绿、黄、蓝、紫、矾红、胭脂红、赭、墨等，且有浓淡之别，更有中和色出现，如倭瓜黄、杏黄、蛋黄、葵绿、孔雀蓝、孔雀绿等等难以计数。

三、由于珐琅彩瓷器不同于其他瓷器的绘画，于是就出现珐琅彩独特的题句和印章

珐琅彩瓷器根据画面的不同需要，常常绘有题句。珐琅彩绘画的底稿是纸绢画，一



乾隆款蓝地珐琅彩折枝花卉纹灯笼

幅完整的纸绢画常常有题款，这在瓷器上就演变为题句。纸绢画是画师们在宫廷中画给皇上欣赏的，题材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献媚之作，题款也就有了固定的言辞，如“玉笋穿花过，霓裳带月归。”“连树穿绿树，长日嚼黄鹂。”“枝生无限日，花发自然秋。”不胜枚举。这些题款被珐琅彩瓷器的画工们精心地临摹于瓷器之上，贴画切意，使用的是墨色的珐琅彩料，柔润适当，使得珐琅彩绘更见神采。

珐琅彩绘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是印章，也就是绘于题句前或后的印章。印章的内容也多是固定的，是根据绘画的内容和题句内容而定的，像“先春、香逸、山高、水长、霞映、君子”等，用于印章的临摹技术高超，材料有用胭脂水的，有用矾红的。

款识一般的是为了显示瓷器制造的时间，瓷器生产的窑址以及占有瓷器的对象的身份。珐琅彩瓷器款识还有它自身的特点。

康熙当政时，珐琅彩瓷器的款识只有“康熙御制”这一种写法，是四字两行在双横线内写的，字体匀称，介于宋体和楷体之间，书写材料是蓝彩料或红胭脂水。

雍正掌权时，早期类似于康熙年间。“雍正御制”四字两行的楷书款，但写款的材料用的是青花。到了雍正中期，双圆横线内

用楷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最为盛行,书写材料仍是青花。雍正晚期,款识又变成了在双钱方栏内书写“雍正年制”,四字排成两行,书写材料又变回胭脂水和蓝彩料,但有个别不加双钱方栏的。

到了乾隆年间,款识上前期是继承了雍正的遗风,依然用“乾隆年制”的蓝料彩款。乾隆中期,由于“院画”盛行和“锦灰堆”画法占领珐琅彩绘画的主体,款识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乾隆通宝”四字楷书款流行于当时生产的一种高足杯中,而“乾隆通宝”本是用于当时的货币上的,于是这种款识又叫“金钱款”。还有一种对应于“锦灰堆”这种繁复复杂的珐琅彩绘画瓷器而书写的横线篆书款,多写于器物的底部。

珐琅彩瓷器创烧于康熙年间,没落于乾隆末年。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二:一是不计成本。专用于皇室的珐琅彩瓷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品稀少而百姓根本看不见。宫廷烧制则需相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遇有不测就难以为继。所以珐琅彩瓷器传世品数量有限,弥足珍贵。二是技术失传。皇室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而独揽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和使用权,致使民间艺人们根本看不见珐琅彩瓷器成品,更谈不上学习烧制过程,所以当官窑不能再烧制这种瓷器时,这种瓷器的烧制技术也就失传了。虽然历史上仿制品也不少,但比照原件,就漏洞百出了。

四、物以稀为贵,仿制清朝 珐琅彩瓷器的特点

康熙时代瓷器造型的特点多是腹部丰满,底足为光滑的泥鳅背,立形器物肩部线条流畅自然。乾隆时期多腹部内敛,总体感觉没有康熙产品大方、有气势,这是追求繁丽的副产品。雍正器物造型介于二者之间,匠气更浓一些。上述造型特点可以用来作珐琅彩瓷器鉴别的一个方面;还有鉴别的一

个重要依据就是研究珐琅彩瓷器是如何造假的。

仿制珐琅彩瓷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旧胎画新彩;二是新胎新彩。

旧胎画新彩。因为珐琅彩瓷器的瓷胎非常难找,所以找到了就会被精心的仿制,往往足以以假乱真。这种仿制品的造型与胎质、釉色上与真品相差不多,但由于累胎往往保存方式不当,挂釉绘彩烧制后,仔细观察会看到底色上有脏东西,再有后挂彩烧制的是经过几次烧制才完成,太过于类似,难免弄巧成拙,匠气十足,终究得不到前人烧制珐琅彩瓷器的真谛,时常有釉下划痕、错字等需仔细研究的地方。

新胎新彩。即胎、彩、釉都是新仿的。仿制珐琅彩瓷器的人多是出于经济目的,这就从根本上传就了仿制品不会像真品那样精细,不仅是造型上缺乏“康乾盛世”的风格,釉面也会有棕眼桔皮釉之类的现象。用彩上常常用粉彩代替料彩,彩绘太厚腻,画而没有一气呵成的气势,总之是造作多于自然。后来还出了一些仿制者凭自己想象仿制的珐琅彩瓷器,构图图片仔细看总是不合时宜,这种仿制品多半骗不了人。

仿制珐琅彩瓷器的时间还是好掌握的。第一个时期是民国的时候。由于故宫对外开放,人们见识到了珐琅彩瓷器的真面目。有些人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价值连城的珐琅彩瓷器,于是有了市场,也就有了仿制人。那个时期仿制珐琅彩瓷器曾昌盛一时。第二个时期就是这几年艺术品拍卖会接连不断。经济因素作怪,仿制康乾时期珐琅彩瓷器的事情不断涌现,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小窑烧制还很见功力。现在的仿制手法已有了现代化科学手段大的参与,也许不久的将来,辨伪这一问题须投入更大的物力人力。瓷器的生产是中国人的发明,珐琅彩瓷器的成功烧制更是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业务员)

元《析津志》佚文新辑

——兼论《析津志辑佚》之误

党宝海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是北京最早的地方志书，可惜久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20世纪80年代初将《析津志》的一些佚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析津志辑佚》一书，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他们使用的底本有《永乐大典》原本残卷，卷4650—4657“天”字韵“顺天府”卷7—14清人缪荃孙抄本^①、《永乐大典》卷464?—4649“顺天府”卷?—6清人徐维则铸学斋藏抄本^②、清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所引《永乐大典》中的《析津志》节文^③。

《析津志辑佚》的出版对于研究者充分利用《析津志》提供了巨大便利，但也有小的失误，如辑文缺漏与误增，标点和分类不当，未作必要的校勘等等。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某些错误^④。笔者近期注意到一些新的问题，在写作本文之前曾以《〈析津志〉佚文的新发现》为题，揭示并考订了缪荃孙《永乐大典·顺天府》抄本中被《析津志辑佚》漏掉的一大段关于“大庆寿寺”的文字^⑤。限于文章的篇幅，其他的内容未能提及，现补述如下。

一、佚文新辑

笔者的辑佚工作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影

印缪荃孙《永乐大典·顺天府》抄本即《顺天府志》为中心，以下简称《志》。《析津志辑佚》简称《辑佚》。

《志》页13“崇仁寺”条：“兴平府道者山大云《大云》、《析津志》作大灵”^⑥峰禅寺。”

《志》页35：“广济寺（在报恩寺西北）。”“崇寿寺，（在东营近北有鹤丘李思斋所画竹）。”以上两句，明确写作引自《析津志》。又该页，“兴圣寺，在昌平县桃林村，至元二十一年岁次甲申，立碑记述山主德公道行。弘福寺，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所建，寺碑在宝坻县坊市北门内文殊院也。”据页53“以上并见《析津志》”之语，这段文字应属《析津志》。

《志》页42“圣恩寺”条：“寺外造金刚阁，栴大悲观音菩萨，后有方石瓮，八角塔（石塔）。”《辑佚》页68“圣恩寺”此条引自《日下旧闻考》，无以上内容。据《志》页53“以上并见《析津志》”之语，这段文字应属《析津志》。

《志》页61“圆明神院”条：“《永乐大典》引《析津志》校《元一统志》“比丘尼善普慧（《析津志》作应惠）。”

《志》页75“崇真万寿宫”条：“（在蓬莱坊西门外，曰‘蓬莱真境’。正南灵显门，人

北高上，坛环松柏，榭荫藟藟。又入红门，至三门，正大殿门。屋连入东西廊祠。后殿与前殿对峙，东西门下阶入道纪堂。两庑众寮，西饭堂，东厨库。堂后拥入方丈，西方丈曰环枢堂，西有璇玑殿。下坛上有张上卿、吴宗师及开山诸碑刻，多起于曩书，并有大学篆书。方丈之东有冰雪堂，东有便门，乃车马行香多人来往之径也。有榕堂，并在东。又云女众在冰清寺西。”

《志》页284“长春宫”条：“（南城故老云：‘北宫原是女姑主之，后转为道宫，未知孰是。’又云：‘长春宫水碾。自古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沟水也。入南葫芦套，盛集莲花，复流转入周桥。’）”在此条之前，引用的是《元一统志》的相关记载，但是引文中却出现了“国朝至正三年九月，魏教弘玄大师提点长春宫事王志久立碑诵长春宫大醮灵应事。……记文乃翰林侍读学士兼太常卿徐世隆撰，参知政事高挺书。”《元一统志》成书于元成宗时期，不应出现至正纪年，而徐世隆、高挺都是元世祖时期的大臣，此处的“至正三年”应为“至元三年”。

《志》页363“白浪河”：“（白浪河，又名白河。）”

《志》页399“古北口，析津志：在州北一百五十里（自此以下属支檀州管）。”《辑佚》页250引至此处即中止，而下文仍是《析津志》文字。“砖碌子口，在州东北一百五十里。墙子岭口，在州东百里。汉儿岭口，在州二百五十里。乞立口，在州西北四十里。翠屏口，在昌平北二十里，旧名得胜口。金大定二十五年五月改名‘大安’。国朝癸酉年败金人于此。去岁翠屏下，东流看漫波。愁明新鬓发，还对旧关河。健翅翻秋举，高峰并晚驼。草深饶虎迹，夜黑欲谁过。地拥山河壮，营开剑甲重。马来牵细路，灯火出寒松。刁斗方严夜，羔裘欲御冬。可怜天设险，不人汉提封。玉帐初鸣鼓，金鞍半偃弓。伤心看寒水，对面隔华风。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不须惊异域，曾在版图申。野蔓栝陀架，轻泥泥马鞍。径斜来险石，谶急上清滩。羽檄千山静，羔裘六月寒。长招空大

道，潇飒不成看。旌节瞻前帐，风尘识旧坡。眼明秋草短，情乱远山多。晚起方投笔，前驱效执戈。马蹄须爱惜，要渡北流河，万里崩岩壑，终年气惨凄。地穷青涧断，天近玉绳低。宇窟黄沙北，昆仑白雪西。故园何处觅，搔首意空迷。塞古秋风早，山昏落日低。积雪鸦度久，荒草马蹄齐。灯火看时出，茅茨渐欲迷。尘沙恨行役，况乃断鸡栖。（《天东志略》）南口，在居庸关之南，庆寿寺祖师可圆以《法华经》数，该四万八千字数为号，种栗园。计千余顷。其园枝叶交蔽，翳且不绝，瞻日屯云。岁收粟数千石以供常住。至今尚存，较诸前时亦稍废动。予与寺僧论及，各能言之（松云闻见）。”《辑佚》页250收入了此后的关于“大口”的一段记载，却漏掉了此节明确标在《析津志》名下的文字，这段文字结尾处的《松云闻见》也是熊梦祥所作，他自号松云子，《松云闻见》当是他在写《析津志》之前所作的见闻录，也是《析津志》的资料来源之一^①。笔者在拙作《〈析津志〉佚文的新发现》中指出《析津志》中《大庆寿寺功德院事状》的作者可能就是熊梦祥本人。当时，笔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析津志》全文引用的通常是正式官方文书或官厅提名记、上梁文等，除此之外关于普通景物、建筑、寺院的文章一般很少全文引用，“状”并非正式的文体，只是汇集资料供后人利用的，而这篇关于庆寿寺的《功德院事状》即全文录出，那么，此文当与熊梦祥有所关联。第二，《功德院事状》一般不需显官撰写，熊梦祥作为元末比较有名气但官位一般的文人，正合其任。除以上两点外，本文辑出的这段出自《松云闻见》的文字表明熊梦祥与庆寿寺僧人多有过从，进一步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为笔者的说法填一注脚。

《志》页403：“大口（以上俱北玄州、十合、固安州等处并见析津志）。”《志》页415：“唐狄梁公庙”条：“唐狄梁公庙，析津志：在京北昌平县界中。”《辑佚》页261到此终止，下文仍属《析津志》。“渔阳陶然诗云：‘当年狐妇窃君威，罗织深刑发祸机。沧海珠难留得在，黄金瓜已摘来稀，国从一虎口中出。

日逐五龙天上飞，今日居庸关下路，空留祠庙对斜晖。”又“独木曾扶大厦倾，至今凛凛尚如生。如何原上一丘土，埋得斗南千古名。谁置丰碑记功烈，天教直棘表精诚。王侯虽失当时断，表使英雄恨不平。有唐大器已他归，天赞元神辅帝玺。鸱鹞忽惊双翅折，蛟龙还上九天飞。一坏易刻乾陵土，百世难消李勣非。自古忠诚系兴废，不胜惆怅泪沾衣。”（梁好能题）“梁公遗庙近居庸，名贾乾坤壮九重。言语即能回武后，山河因此属中宗。枝危良力情何切，为国无私意更忠。自古幽并多俊杰，人才岂止限山东。都督幽州数百年，至今遗爱尚依然。既垂赤手扶唐世，肯舍丹心附周天？万古祇谈仁集事，一时又荐东之贤。穷途无物难为礼，聊折山花奠几筵。”录文至此，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元朝的方志之中多有引用文人诗句者，如全国总志《元一统志》中，偶尔诗句点缀其间，但像熊梦祥《析津志》这样大段引用的，实属少见。

二、《析津志辑佚》之误

除了辑佚工作漏掉一些文字外，《析津志辑佚》的标点、整理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标点之误

1. 《辑佚》页 23 第 13 行“郎中奉政大夫忽里台焦恭默”，在忽里台与焦恭默之间应用顿号。

2. 页 78 第 11 行“妙善寺 在咸宜坊沙蓝蓝。”第 12 行“姑姑寺”。这段文字实为一段话，应断作“妙善寺；在咸宜坊，沙蓝蓝姑姑寺。”据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 22《舍蓝蓝传》“师讳舍蓝蓝，离昌人。……成宗之世，事皇太后于西宫，以侍从既久，勤劳之多，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剃发为尼。……仁宗之世，……留居妙善寺，以时入见。赐予之物不可胜计。师以其物创寺于京师，曰‘妙善’。”根据对音原理和元代译名习惯，此尼姑“舍蓝蓝”即辑佚中的“沙蓝蓝姑姑”。妙善寺为舍蓝蓝创建，由此可

知，辑佚中的“妙善寺”显然就是“沙蓝蓝姑姑寺”。

3. 页 158“李嘉卢龙”，应断为“李嘉，卢龙。”

4. 页 206 第 11 行“袖口才五寸许，窄即大，其袖双腋摺下，有紫罗带挂合于背，腰上有紫从系”，应断为“袖口才五寸许窄，即大其袖。双腋摺下有紫罗带挂合，于背腰上有紫从系。”

5. 页 208 第 3 行“淇露坊自南而转北，多有雕刻，押字与造象牙匙箸者”，应断为“淇露坊自南而转北，多有雕刻押字与造象牙匙箸者”。

6. 页 211 第 11 行“诸王如上发矢，不以虎侯，豹虎熊侯，以草为人作侯”，应断为“诸王如上发矢。不以虎侯、豹虎（侯？）、熊侯，以草为人作侯。”

7. 页 238 第 9 行“海马、海驴、脱落不花，皆赋也。”此处“脱落不花”后的顿号应删除。

（二）未作必要的校勘

1. 《辑佚》页 8 第 11 行“叶李为尚书右丞相”，据《元史》卷 173《叶李传》，他实任尚书省右丞。

2. 页 13 第 4 行“左司郎中汝中栢”，应作“汝中栢”。

3. 页 154 第 13 行“伯颜，字道，蒙古氏，开州人。心传正学，素有名望。”伯颜的字应为“宗道”，见《元史》卷 190《伯颜宗道传》。

4. 页 174 第 6 行“公狄察人，其先系武平北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此处“武平北连川”应为“武平北折连川”。《元史》卷 119《月亦察儿传》。

5. 页 221 第 11 行“上都大安阁及宋汴京熙春阁，我元易置于滦之漱潭之上。”此处的“及”字应为“乃”字，据虞集《道园学古录》卷 10《版大安阁图》上都大安阁是拆迁汴梁熙春阁改建而成的，一个“及”字使文意全非。

（三）正文重复

《辑佚》页 67 据《日下旧闻考》辑“报先

寺”与页 78“报先寺”重出。

(四)辑入文字并非《析津志》

《辑佚》页 68 中的“大圣安寺”，“弘法寺”条辑自《日下旧闻考》卷 155“存疑”，页 69“崇仁寺”、“崇孝寺”，页 72“仰山寺”，页 85“修真院”等辑自《顺天府志》，实际上这些文字皆出自《元一统志》，分别见于《顺天府志》页 6、14、13、17、30、62。

(五)分类欠妥

《辑佚》页 162 有金人马舜卿小传，根据《辑佚》体例，马舜卿为元朝之前金国官员，其传应该列入“人物”类，不应归入一色元代人物的“名宦”类。页 248“顺义县”应作“怀柔县”，所引山川、古迹、桥梁等内容都属于怀柔县而非顺义县。

(六)引文处理失当

《辑佚》页 73“胜因寺”条误将注文排成正文，引起文意不明。原文见于《志》页 35，应排作：“胜因寺：头陀教即康肆。析津志：在四隅头，元于金时为首翟苑。至中八拱亭（此亭乃金朝酒园中之芙蓉亭也，为名胜行乐觴饮之所。惟以拱斗构架而成，既高且广，为金时诸亭之冠。今为寺中藏经之所）。后殿（三佛）。东方丈（亦名知足天，西名利欲地）。方丈东即厨房（有居众头陀之房也）。四乐堂（前檐有石碑，铸瑞粟三本，金朝题赞，名瑞谷）。殿前（正南西向有胜因寺碑）。山（西有雪庵顶像碑题赞）。”

三、小 结

《析津志》作为北京第一部地方志，其文献价值早已为大量研究所证明。尽管它已经佚失，我们还是努力将它的残文辑在一起。应当说，《析津志辑佚》的出版对于学界充分利用《析津志》这一宝贵文献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辑佚工作尚不完善。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辑佚》错误较多，有的是因为辗转传抄造成的，有的则是不明元代典章制度的缘故，这对于读

者利用是很不方便的，有必要重新加以整理。”^①

由于不能见到著名的特学斋抄本所谓《宛台通记》（《永乐大典·顺天府》残本之一），作者的辑佚工作仅仅利用了《顺天府志》（亦为《永乐大典·顺天府》残本）。对《永乐大典》的其他内容以及《日下旧闻考》引文，笔者也没有进行爬梳整理。即使是对《顺天府志》也不能说已钩稽完备。笔者深信，进一步的辑佚工作还会带来新的发现与研究工作的新进展。

^①该抄本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顺天府志》为题，于 1983 年影印出版。此书名有误，它并非永乐年间所修《顺天府志》，而是《永乐大典·顺天府》卷 7—14 的抄本，参看姜伟堂《辨理抄〈顺天府志〉的来历》，《文史》第三十二辑；黄燕生《〈永乐大典·顺天府〉拾遗》，《文献》1996 年第 1 期。本文仍使用《顺天府志》这一书名，请读者注意。

^②该书原题《宛台通记》，经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研究，实系《永乐大典》卷 4647—4649“天”字韵“顺天府”卷之一抄本。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原书《文物》1964 年 4 期，后收入专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57。

^③详见李致忠《〈析津志辑佚〉整理说明》，前引《析津志辑佚》，页 7—13。

^④温岭《读〈析津志辑佚〉札记》，《中国史研究》1984 年 2 期；王尚《〈析津志辑佚〉校勘记略》，《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203—209，页 184；陈高华《中国的元史研究》，《中国史学》（北京：中国史学会编）卷 1（1991 年），页 143；包世轩《熊自得与高堂村——兼订〈析津志辑佚〉之误》，《京华旧事存真》，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233—235。

^⑤文见《北京社会科学》1998 年第 3 期。《析津志辑佚》页 70“庆寿寺圣容之殿”下漏引这段文字，且标点有误。

^⑥括号中的原文为双行小字，下同。

^⑦宿白先生前引文，页 342。

^⑧陈高华先生前引文，页 143。

（作者为北京大学元史博士）

《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

读后记

程鹏万

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重要城邑，建国以来在此范围内出土了四万余枚各国金属货币，数量浩大，类型齐全，内容十分丰富，是战国货币研究的重要资料。《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石永土、石磊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以下简称《聚珍》），将建国以来燕下都出土的东周货币资料按国别与类型整理公布，嘉惠泉界，值得称许。

《聚珍》是燕下都出土货币的资料总汇，编者不仅公布了大量拓片，还有详细的分国解说，很便于参考利用。不过，其中文字释读与国别判定等方面有一些不尽妥当，为了更好的利用《聚珍》，本文将有关问题列出，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在释文方面，《聚珍》没能全面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些释读明显有误，今试作修正。

1. 图 9.3—5（均为《聚珍》图版，以下同）币文“化”当释作“非”，图 41 等均应同此改。

2. 图 24.3—6 图 25.1，图 26 释“羊”字误，字待考。

3. 图 27.4“𠄎”释“大”非，改释为“亢”。

4. 图 32.1“𠄎”字裘锡圭先生释为中^①，币文应改为“一中”。

5. 图 33.5—6 币文释“山”误，当为“三十”合文。

6. 图 36.1 币文可释为“千”。

7.图 40 币文释“化”误，应改释为“刀”^②，其他也应同此改释。

8.《聚珍》释“明”刀面文为“医”字，虽可备一说，但此字应释为“明”字，从字形来看勿庸置疑。“名”字含义或以为燕国主管货币铸造的机构^③。

9.图 65.4 币文释“右古”，“古”字不可信，对比图 65.5 应为“右缶”。

10.图 94.3—4 背文应释为“右于”不确，“于”字应改为“平”字。

11.图 115.3 币文应改释为“左二十”，图 145.1 同此释。

12.图 126.5 刀币背文“易下”之“下”应为“下”借为“刀”。

13.图 136.5 币文释“易厂”不确，当释为“中乙”。

14.图 140.5“”应改为“中穆”^④。

15.图 160.6 圆钱“医化”应改为“明刀”。

16.图 165—166 的币文“白化”应改为“白刀”^⑤。图 167.2 亦应改释“白人刀”。图 168.1 释“白化人”应改为“白刀”。图 168.1“人”字加一横而饰笔，此现象战国文字习见，如中山兆域图“执白(白)宫”，中山刀币“成白(白)”等，亦加饰笔^⑥。

17.图 169.4“大阴分”币文应为“大阴半”，“半”战国文字中作“半”^⑦，以下“分”字皆同此改。

18.图 181.1“阳化”实应为“阳曲”^⑧。

19.图 185.6 释“文易”不可信，待考。

20.图 186.6 等，直接释为“平陶”不够准确，应隶定为“平窰”（窰为宝字异体）读为“平陶”。

21.图 204.1—2，释“祁”误。此布或释“邸祁”合文^⑨，或释“祁氏”^⑩合文，当以前者近是，读为“鹿祁”为魏币。

22.图 207.6 释“榆即”误，应改释为“贝它(地)”^⑪图 208.1—6 同此改。

23.图 212.5 或释为“尊”^⑫，可信。

24.图 212.6 释“子城”误，当释“亲戚”。

25.图 217.4 释“木邑”误，应改释“长子”^⑬。

26.图 220.2—4 释“榆”误，应改释“榆”^⑭。

27.图 225.5 释“铸一”不妥。实即“铸”布，该布背文“一”误铸于面文，属误范。

28.图 226.1—2 释“王城”误，宜改释为“平州”，见《聚珍》图 212 所释。

29.图 226.6 币文可释为“襄城”。

30.图 228.1 释“均”误，应改释为“土匀”（见注 13）。

31.图 231.1—6 币文可释为“郾”，地望待考。

32.图 232.1—3 可释为“唐是”。

33.图 240.5“明”刀背文释作“右大工”误。第二字黄锡全先生释作“内”可信^⑮。

其次，在国别判定方面也有不当之处，主要表现在方足小布和尖足布的形制关系上。第 253 页至 259 页所收尖足布均应为赵国布币，非魏国。尖足布为战国早期铸币，由春秋晚期的榆府尖足空首布演变而来，广泛出土于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但未在河南境内出土，因此说上述尖足布均为赵国货币。在 276, 277 页未定国别的货币中，尖足布“襄城”，“寿阳”也当为赵币，“寿明”或读为“鹿明”，在今陕西富县北^⑯，可备一说。

方足小布的国别判定是一个比较烦难的工作，前人已经取得一些成绩^⑰，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解决，而《聚珍》亦存在一些错误，如下：

1.第 239 页，将“同是(铜鞮)”方足布归属赵国，不确。据考证，“襄垣”方足布应为韩国铸币^⑱，在找不出赵国占据“同是”，并且在此铸币的证据时，那么处于襄垣之南的“同是”也应划属韩国。

2.第 239 页“祁”布，或改释“邸祁(鹿祁)”（见注⑩），可信。该布应为魏国铸币。

3.第 239 页“咎奴”方足布不是赵币，尚不能确定。目前多数学者相信“咎奴”即“高奴”，为魏币^⑲，但是从出土资料来看，方足小布铸行时间及魏国桥行布有“高女”地名等因素判定，此说并不可信^⑳。“咎奴”布国别待定。

4.第247页“郢”字方足布,其铸地在今山西霍县。传统上认为它是赵国铸币,但是根据“十七年盖令戈”铭文及其“造”字写法看(戈铭见《殷周金文集成》17册11382号),戈与币应均属韩国。

5.第250页“鞞”方足布应为韩国货币[见注⑩文]。

6.第280页“马雍”方足布应为韩币。“马雍”见与“王三年马雍令戈”中,从戈铭“造”字看,亦韩器(见注⑩文)。其地待考。

再次,《聚珍》在货币形制划分方面(主要是平首布的分类上)有失误,并且将尖足布的晚期形态与方足小布混同,亦应改正。

一般认为,平首布币的演变序列是:从耸肩尖足空首布至耸肩尖足大布至尖足小布至类方肩类方足布,类圆肩类圆足布至方足小布、圆足布(含三孔布)等。尖足小布过渡到方足小布、圆足布时,中间有一些过渡形态,即类方肩类方足布、类圆肩类圆足布,它们在外表上跟方足小布、圆足布很相似,但还是属于尖足小布的范畴。因为它们面部的纹饰仍然作“Y”形,而不是方足小布作“丨”形,而真正的圆足布面部干脆就没有纹饰(如“冈”、“离石”圆足布)^⑩。《聚珍》在第229页所列出的“兹氏半”、“榆卽”、“肤厓”。“平甸”等所谓“平首方足布”,实际是尖足小布的晚期形态,对比第232页“平甸”布与“中都”、“平原”等方足布的纹饰,即可知道其说之误。

以上我们虽然指出了《聚珍》一书中存在的一些疏误,并不是要否定其价值,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它。《聚珍》作为燕下都出土的东周货币资料总汇,其价值与作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⑩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

⑪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

⑫“明”字为清代马鼎所释,见其《货币文字

考》,“明”主管铸币铸造的机构的说法,见何琳仪:《燕国布币考》,《中国钱币》1992年第2期。

⑬“鞞”字见裘锡圭:《昭明钟铭文中的“鞞”》,《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

⑭见裘锡圭《谈谈“成白刀”》,《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辑。

⑮汤余惠,《战国铭文选》12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⑯宋德册,裘锡圭先生在《战国时代的“斗”和秦汉时代的“斗”》(《文史》1980年第8辑)释此字为“斗”。

⑰李零,《战国鸟出纹铜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1辑)中释“斗”为“斗”。

⑱李家浩,《战国货币考》(《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⑲何琳仪,《三晋方足布汇释》(《古币丛考》)第228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⑳何琳仪,《吴地布币考》,《古币丛考》第143—154页。

㉑黄锡全,《平首尖足布新高敏种考述》,《先秦货币研究》第71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㉒吴良宝,《战国布币释读三则》,《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2001年。

㉓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㉔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订》(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

㉕何琳仪,《宋足布币考》,《古币丛考》第118页。

㉖黄锡全,《三晋两周小方足布的国别及其有关问题初论》(《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㉗吴良宝,《战国布币四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2001年。

㉘黄锡全,《试论三晋燕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㉙吴良宝,《古币三跋》,《古文字研究》第24辑。

㉚吴良宝,《试论几种平首布的形制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

(作者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学生)

先农坛的建筑

李小涛

先农，远古称帝社、王社，至汉时始称先农。“春时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汉仪》）；“坛于田，以祀先农”（《五经要议》）。魏时，先农为国六神之一（“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为国六神”《唐书·卷十四》）。藉天祭先农，唐前为帝社，祭坛曰藉田坛，垂拱年（公元685—688年）后改为先农坛。至此祭祀先农正式定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礼制，每年开春，皇帝亲领文武百官行藉田礼于先农坛。

北京先农坛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于正阳门西南，与其东面的天坛（原称天地坛，明嘉靖时始称天坛）建筑群相对应。

北京先农坛始建时建制沿用明初旧都南京礼仪规制，将先农、山川、太岁等自然界神灵共同组成一处坛庙建筑群。嘉靖十年（1513年），于内坛墙南部增设天神坛、地祇坛，形成先农坛现今布局。先农坛占地约2000亩，由内外两重围墙环绕，外坛墙南北长约1424米，东西宽约700米，呈北圆南方状（现北部荡然无存）。内坛墙南北长约446米，东西宽约306米。

先农坛共有建筑群五组：1. 庆成宫；2. 太岁殿（含拜殿及其前面的焚帛炉）；3. 神厨（包括宰牲亭）；4. 神仓；5. 俱服殿。另有

坛台四座；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地祇坛。这些组群建筑与坛台基本都坐落于内坛墙里，仅庆成宫、天神坛、地祇坛位于内坛墙之外，外坛墙之内。另外，内坛观耕台前有一亩三分耕地，为皇帝行藉田礼时亲耕之地。

先农坛的建筑群，包括现存的内坛墙在内，从明代始建到清乾隆朝大修，迄今历经400余年，整体布局基本完整，建筑的构筑特色及艺术风格基本保留了明代特征，例如平面的减柱结构，屋顶的深远檐出，斗拱的制作工艺（斗画页、拱瓣及昂嘴），梁架的截面尺度及制作手法等。这些祭祀建筑，根据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要求分为宫殿建筑（皇帝祭祀前后的更衣场所、文武百官祭祀后的庆功之地、祭祀太岁的殿宇等）及象征生产等项功能性建筑（神仓、神厨、神库等）。由于使用的不同要求，建筑的结构及技艺又有所差别：宫殿建筑雄伟壮观，庑殿或歇山屋面，外表辉煌，采用黑色或绿色琉璃瓦，内部雕造精细，用鎏金斗拱装饰，格扇门窗用三交六碗菱花，建筑内外用金龙和墨彩绘等。其余建筑虽然也为厅堂结构，但灰瓦硬山及简练的装饰，与前者形成明显的等级对比。另外，现保留完整的内坛墙，外皮用城砖满白糙砌，基本为乾隆朝原制，内层有明代夯土

墙体。墙宽2.2米,高4.1米,墙顶置木椽型板,上盖筒板瓦。内坛墙四面各设三间拱券门一座,南门与太岁殿建筑群置于同一轴线,北门在神仓院与俱服殿之间,东西门基本相对应于观耕台及先农坛之南。四座门均为砖石结构,歇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砖柱间额枋上置三踩单翘磨砖斗拱,四座门均具典型的明代特征,南北二门留有清晰的早期龙锦枋心旋子彩画。

一、太岁殿建筑群建筑

太岁殿建筑群位于先农坛内坛北门西南侧,是为祭祀太岁及春夏秋冬等自然神灵之地。其东邻神仓,西近神厨,南为俱服殿,位置基本在先农坛内坛建筑的中心地带,建筑体量为先农坛之最。

太岁殿建筑群建筑占地约9076平方米,内有四座单体建筑,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为拜殿、太岁殿,东西两侧各有厢房11间,建筑间用围墙相连,拜殿两侧墙及东西墙北侧共设随墙门4个。

拜殿建筑面积约860平方米。通面阔七间50.96米,进深三间(8椽9檩)16.88米。前置332.5平方米的月台,正面置六阶台阶三个。后檐分别在明间、稍间置六阶台阶。殿内北部减去金柱四根,其木构架结构与宋《营造法式》的“八架椽屋乳栿对六椽袱用三柱”类同。彻上明造。屋面单檐歇山式,黑色琉璃瓦绿琉璃瓦剪边。檐柱头有欹杀。斗拱为五踩单翘单昂垂金斗拱,明间及次间补间斗拱六攒,稍间及尽间为四攒,四周共用柱头斗拱22攒(包括4攒转角斗拱),补间斗拱84攒。殿宇前檐中三间用四扇格扇门,稍间下砌槛墙,上置四扇格扇窗,尽间砌墙,后檐七间全开四扇格扇门,格扇形制为四抹头,菱花为三交六碗。

太岁殿建筑雄伟高大,建筑面积1118.2平方米。通面阔七间51.35米,明间、稍间前置六阶台阶,进深三间(12椽13檩)25.7米。其木构架结构形式基本与故

宫太和殿上层类似。彻上明造。屋面单檐歇山式,黑琉璃瓦绿剪边。柱础石为素面覆盆式,檐柱高6.2米,柱头有欹杀。金柱高10.35米,建筑室内总高15.97米。斗拱为七踩单翘双昂垂金斗拱,明间及次间补间斗拱六攒,稍间及尽间为四攒,四周共用柱头斗拱22攒(包括4攒转角斗拱),补间斗拱96攒。殿宇前檐七间各开四扇格扇门,其余三面砌墙,格扇为四抹头,菱花为三交六碗。殿内明间北部有神龛,无神像。

拜殿及太岁殿均用金龙和玺彩绘。

东西配殿建筑面积各为755.3平方米。其面阔各11间55.56米,进深三间(6椽7檩)13.58米,前出廊,仅明间置五阶台阶,南北两侧于廊步尽头置如意踏跺三级。悬山黑琉璃瓦屋面。东西配殿大木构架为早期特色,殿宇梁架每一节点的柱头直续承载大斗,斗正面出梁头,檐面出檩枋,柱间用额枋相连接,柱头有卷杀,柱有侧角。殿宇通面阔11间,各开四抹方格四扇格扇门。彩画为龙锦枋心。

太岁殿院外东南侧有砖仿木结构无梁建筑焚帛炉一座,为焚烧纸帛祭文之用。西向,面阔6.6米,进深3.74米,黑琉璃瓦绿剪边,歇山屋面,须弥底座,正面设三个大小不同的拱券门(中门稍大),四角有圆形磨砖圆柱,柱上砖制额枋处雕刻明代旋子彩画,上置砖仿木五踩单翘单昂斗拱,周围有转角斗拱4攒,补间斗拱27攒。

太岁殿建筑群,于1987年收归文物部门管理,同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修缮,并根据《顺天府志》记载“坛内南北东西各三间”,复建四角值房。现由古建博物馆使用,殿内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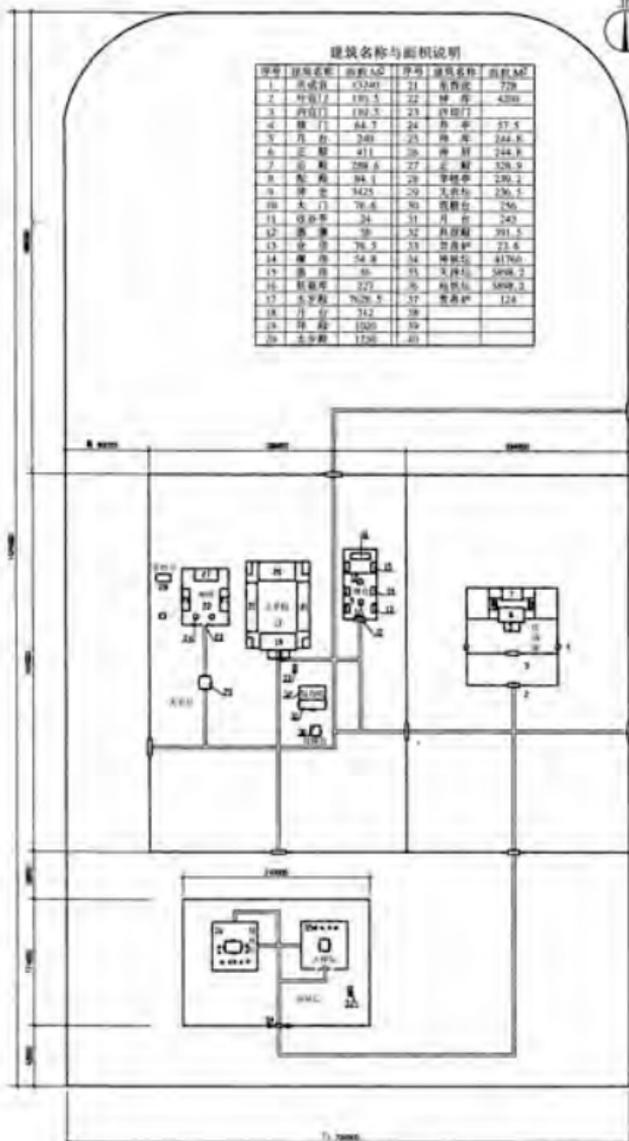
二、俱服殿、观耕台

俱服殿、观耕台为同一轴线上的建筑,位于太岁殿东南,俱服殿在观耕台之北,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先农时更衣并行藉耕之典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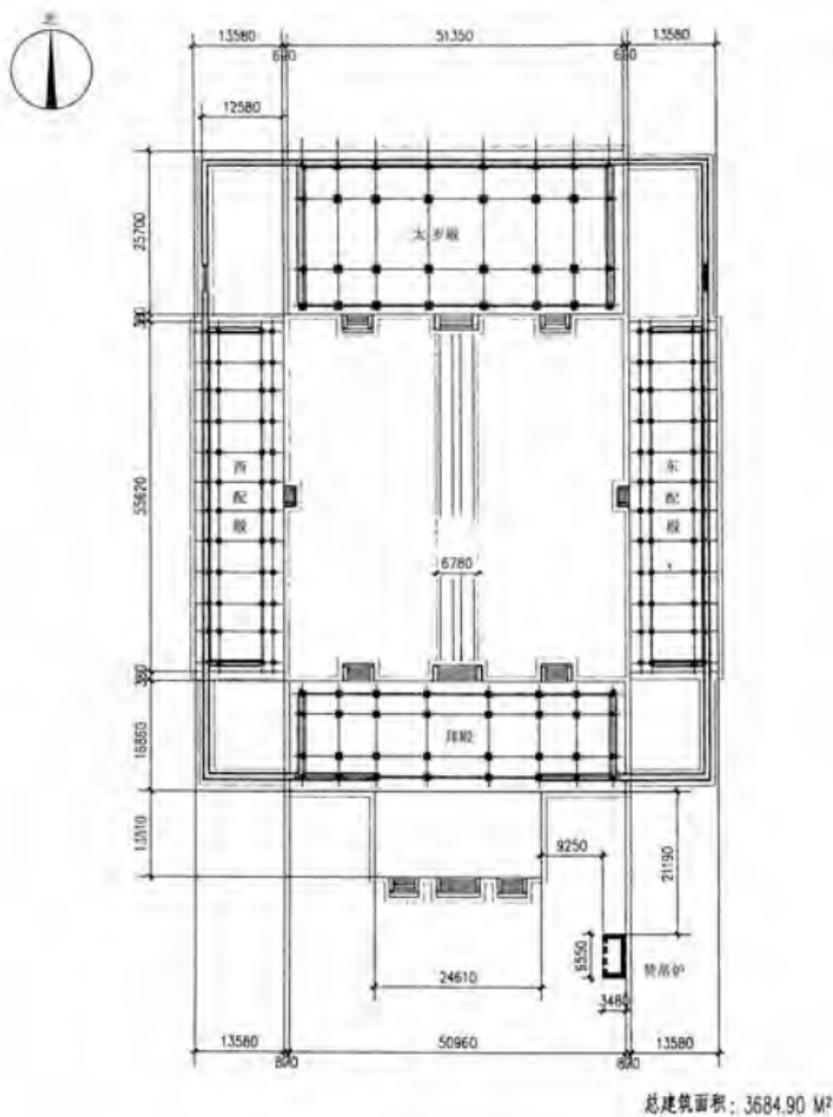
建筑名称与面积说明

序号	建筑名称	面积 M ²	序号	建筑名称	面积 M ²
1	正殿柱	3240	31	耳房北	728
2	正殿门	185.5	32	碑亭	4200
3	内值门	182.5	33	内值门	
4	侧门	64.7	34	耳房东	37.5
5	月台	240	35	神库	244.8
6	正殿	411	36	神厨	244.8
7	正殿	398.6	37	正殿	328.9
8	侧殿	38.1	38	耳房南	236.2
9	东耳房	3425	39	正殿北	256.2
10	大门	70.6	40	耳房北	256
11	耳房东	34	41	月台	242
12	神库	30	42	耳房南	391.5
13	正殿	70.5	43	耳房北	21.6
14	神厨	54.8	44	神厨北	2170
15	神厨	36	45	耳房北	3688.2
16	耳房南	322	46	耳房北	3688.2
17	正殿	2628.5	47	耳房北	124
18	月台	312	48		
19	耳房	1240	49		
20	耳房南	172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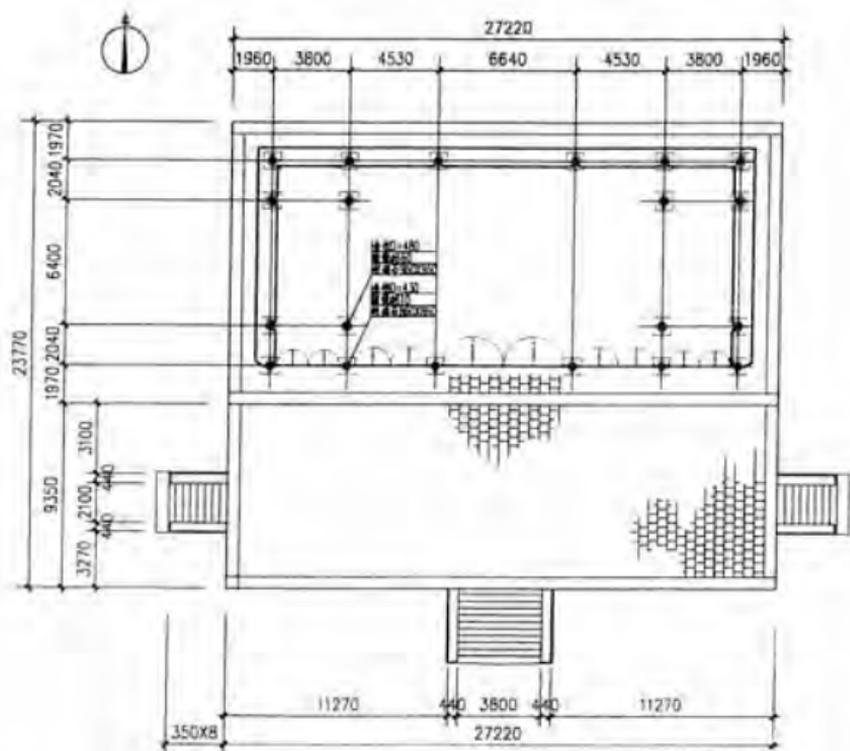


注：神坛总长 1306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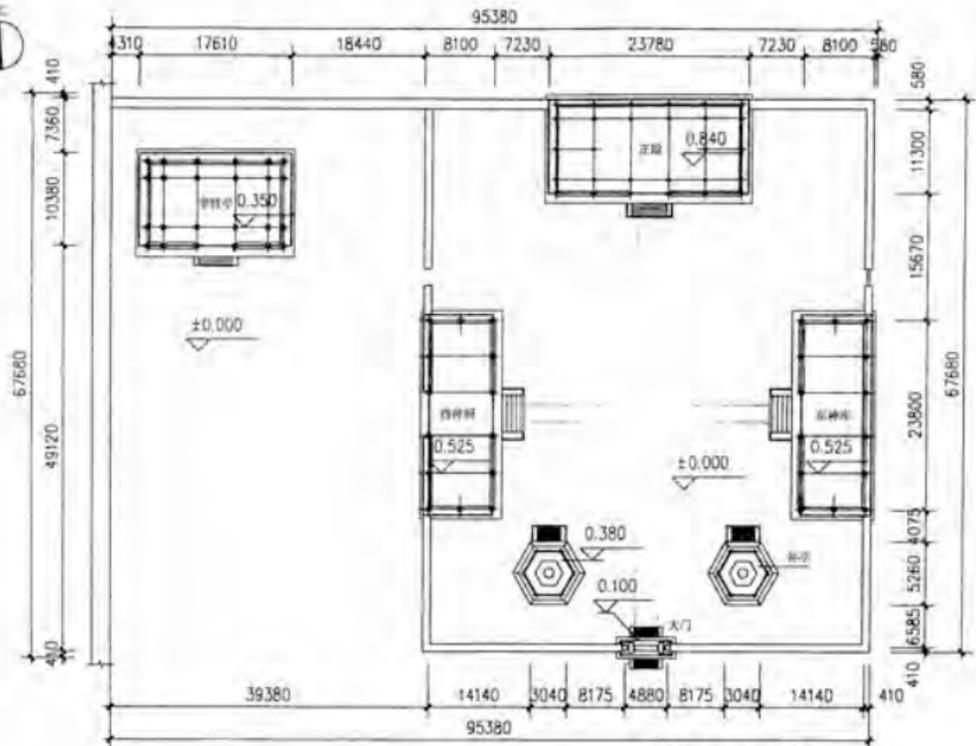
先农坛总平面图



先农坛太岁殿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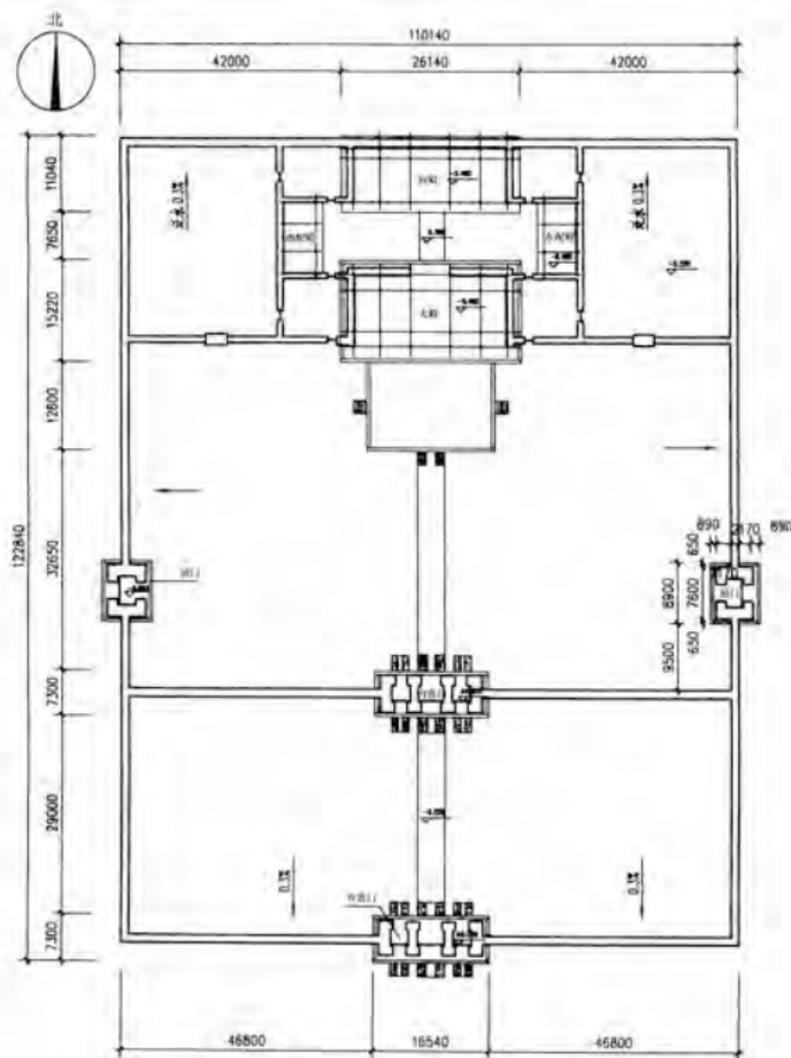


具展厅平面图



注:建筑面积 1244M²

神厨总平面图



注：建筑面积 1305M²

庆成宫总平面图

俱服殿建于1.65米的高台上,建筑面积392.5平方米,面阔五间27.22米,进深三间(六椽七檩)14.24米,前置254.5平方米的月台,月台与建筑台明等宽,南面设十级台阶,东四面设八级台阶。歇山琉璃瓦屋面。檐柱头有欲杀。殿内明间减柱金柱四根,前后檐柱承载长10.48米的七架梁。初上明造,梁头及檐枋下均设一斗三升隔架科斗拱。檐头斗拱为五踩单翘单昂套金斗拱,明间补间斗拱六攒,次间四攒,尽间为三攒,四周共用柱头斗拱16攒(包括4攒转角斗拱),补间斗拱56攒。金龙和玺彩画。

观耕台,现存为清乾隆年间建造(明代为木制高台)。观耕台占地面积约508平方米。台高1.9米,平面方16米,东、西、南三面设九级台阶,台阶踏步汉白玉条石边沿雕刻莲花图案。台上四周有汉白玉石栏板,望柱头为龙云雕刻,地面方砖细墁。台底须弥座由黄绿琉璃砖砌筑,琉璃砖上雕刻花草图案。台须弥座结构层次完全依《清式营造则例》规制,为典型的官殿坛基建筑。

1997年,育才学校图书馆从俱服殿搬出,同期,市文物局拨款将俱服殿及观耕台做了全面修缮。修缮中根据早期照片恢复装修原貌,即前檐五间通开四扇格扇门,后檐砌墙。格扇形制为四抹头,菱花为三交六碗。并依室内彩画规格对外檐大木做了彩绘。

三、神 仓

神仓位于太岁殿东部,为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建筑。神仓有“天下第一仓”之誉。据《唐土名胜图会》卷四载:“神春吉亥日,皇帝亲到耜耕地”,“至秋夏,麦闻结实,就择吉日,贮之神仓。祭祀天地啐宗庙社稷时便次荣盛。”

神仓院占地面积约3435.9平方米。坐北向南,中轴线从南向北为山门、收谷亭、圆镜神仓、祭器库,左右分列仓房、神仓、值房各三座。另全院从圆镜神仓后设墙分成前后两院,中设圆门。

山门为砖拱券无梁形制,建筑面积72平方米,面阔三间13.48米,进深5.34米,屋面为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砖叠涩挑檐,无斗拱,瓦面为黑琉璃瓦绿剪边。建筑开三间拱券门,板门装九路门钉。

收谷亭平面为方形,建筑面积49.9平方米。每边长宽为6.85米,南北各设三级台阶,无斗拱,四角攒尖顶,瓦面为黑琉璃瓦绿剪边。

神仓为圆形形制,建筑面积58平方米。直径8.6米,正南设五级台阶,无斗拱,屋面为圆攒尖顶,黑琉璃瓦绿剪边。圆形平面上制檐柱8根,柱间用木板遮挡,南设四扇格扇门。室内除在原地平铺方砖外,又在其上置厚高16厘米、宽13厘米的木地板,上铺木地板,此为贮粮防潮。

祭器库建筑面积245平方米。面阔五间26.17米,进深两间9.36米(4椽5檩),明间有碾差踏步,悬山顶屋面,上铺削割瓦。此座建筑造型开间而矮小,檐柱高3.16米,而面阔为4.8米左右,建筑仅明间开四扇格扇门,四抹头,其余各间为格扇窗。

西侧南部仓房建筑面积各为76.9平方米。面阔三间10.48米,进深一间7.34米(4椽5檩),前檐明间置三级台阶,硬山顶屋面,上铺削割瓦。建筑仅明间开格扇门,其余各间为格扇窗。

北部仓房建筑面积各为96.5平方米。面阔三间12.44米,进深一间7.76米(4椽5檩),前檐明间置三级台阶,悬山顶屋面,上铺黑琉璃瓦绿剪边。明间瓦顶正中设悬山顶天窗,天窗高约2.6米,长1.76米,宽0.78米。建筑仅明间开格扇门,其余各间为格扇窗。

两侧最北端值房建筑面积各为119.8平方米。面阔三间14.36米,进深两间8.34米(4椽5檩),前檐明间设一级如意踏步,悬山顶屋面,上铺削割瓦。建筑仅明间开门,其余各间为窗。

神仓院建筑彩画,除收谷亭为轴伍墨旋子彩画外,其余均为皇家祭祀建筑特用的雄黄玉旋子彩画。

1994年,占用神仓院的单位全部迁出,同期,市文物局拨款做了全面修缮。修缮时,根据现存窗棂及早期照片,全院恢复原四抹头方格菱花格扇门窗,并于院四角增建格调一致的办公配套设施。

四、神厨

位于太岁殿之西,院落轴线外南部为先农神坛,西北围墙外有宰牲亭。

神厨院占地面积约3790平方米(不包括宰牲亭),坐北向南,“北正殿五间,以殿神牌,东为神庖,西神厨,各五间,左右并亭各一”(《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五)。

大门现仅存立柱及斗拱等木构架,建筑面积17.9平方米,面阔6.88米,进深2.6米(3椽2椽),斗拱为五翘单昂明制斗拱,大斗有斗曲瓦,补间斗拱六攒,柱头斗拱无大斗,拱从立柱卯口跳出,脊檩直接置于柱头之上。以上现状分析,屋面为单檐悬山式。

正殿建筑面积342.4平方米。面阔五间26米,进深四间13.17米(8椽9椽),前檐明间置五级台阶,屋内明间减去中心柱两根,悬山顶屋面,上铺削割瓦。建筑仅明间开四扇格扇门,四抹头,其余各间为槛墙上开窗。

并亭建筑面积为48.9平方米。六角形,每边长4.34米,三踩单昂卷金斗拱,有斗曲瓦,每边平身科斗拱2攒,周围共有12攒,角科斗拱六攒,室内无梁枋,由角科及其两侧平身科卷金斗拱后尾悬挑六角形脊枋,室内中心有井口,上置高近80厘米的六角形石井台,屋面为悬顶,中心空置,与室内井口相对,以为天地一气之意。并亭正北有三级台阶。

东神庖建筑面积270.92平方米。面阔五间26米,进深一间10.42米(4椽5椽),前檐明间置三级台阶,悬山顶屋面,室内椽飞上为石望板,上铺削割瓦。建筑仅明间开门,其余各间为槛墙上开窗。

西神厨建筑面积271.6平方米。面阔

五间26.4米,进深二间10.4米(4椽5椽),前檐明间置三级台阶,悬山顶屋面,上铺削割瓦。建筑前檐仅明间设门,其余各间为槛墙上开窗。后檐明间设槛墙并开窗,窗外于明间上置石水槽。

宰牲亭位于神厨院西北部,其西边两米为先农坛西侧内坛墙。建筑面积261.3平方米。面阔五间20.13米,进深三间12.98米(6椽7椽),两层檐,室内为单层。上层檐为悬山顶,下层为四坡水。上层梁架形成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布瓦,全柱用通柱,并于柱身上的不同位置开卯口穿通承椽枋、角梁及抱头梁等,与周围檐柱结构形成四坡水屋面。上下层均为削割瓦。室内明间正中心有长2.4米,宽1.16米,深1.3米的毛血池,为宰牲牲畜所需,池上下均有排水口,建筑明间及次间设门,稍间为窗。

神厨院建筑彩画,均为墨线大点金龙梯枋心旋子彩画。宰牲亭外檐彩画,无地仗,直接绘于大木上,内檐彩画为旋子彩画,枋心图案不清。

1998年,育才学校校办工厂迁出,同期,市文物局拨款做了全面修缮。修缮时在拆除瓦面后发现所有建筑屋面灰背均用白灰铺设,根据文物修缮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修复后的屋面仍用白灰铺设。修缮中虽然各殿留有板门直棂窗的卯口遗迹,但由于使用功能所需,也为全院的统一,最终采用了正殿现有窗框的形式,将院内门窗统一为四抹方格菱花形制。同时,对院门平面条石及木架尺度勘察后,根据清营造则例規制对大门做了复原。

五、庆成宫

庆成宫位于先农坛内坛东北部,与内坛的几组建筑基本处于东西同一方位上,庆成宫明时为山川坛斋宫,清乾隆年大修后更名为庆成宫,作为皇帝行耕藉礼后休息和犒劳百官随从之地。

庆成宫坐北朝南,东西长122.84米,南北宽110.14米,占地面积13529.6平方米,

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为宫门、内宫门、大殿、妃宫殿(此名系2001年修缮中在四角套兽及其飞椽身上发现的题迹,因该殿名称无记载,故暂用此名)、大殿、妃宫殿间东西两侧有东西配殿,内宫门与大殿间院墙东西各有拱券掖门一间。庆成宫整体布局为院中院,内外宫门形成两个大的院落;建筑集中在轴线北部的同一高台上,周有围墙相连,形成一座封闭的院落;妃宫殿左右与配殿用围墙相连形成一小院;建筑高台两侧又各为一个院落,其后墙为庆成宫院墙,并在院墙上设墙体门,而院南墙与其相对应处开随墙门一座。院内所有建筑及围墙全部为绿琉璃瓦。

内外宫门结构造型基本一致,为砖仿木拱券无梁形制,每座建筑面积120.7平方米,面阔五间16.54米,进深一间7.3米,屋面为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剪边,三踩单昂磨砖斗拱,明间6攒,次间4攒,稍间1攒,山面六攒,连间角科,柱头科共有斗拱56攒。建筑明次间开三间拱券门,板门装九路门钉。建筑前后台明置汉白玉石栏杆,并于每座门前中后部铺设雕龙石板。

大殿建筑面积约414.53平方米。前置246.93平方米的月台,周围安装有汉白玉石板,正面置九阶台阶一个,台阶两边有日晷、时辰碑,台阶中部有雕龙石板,两侧七阶台阶各一个。大殿通面阔五间27.2米,进深三间(9椽7檩)15.24米。殿内明间南部减去金柱两根,屋面单檐庑殿式,有推山,绿琉璃瓦。檐柱头有砍杀。斗拱为五踩单昂单昂套金斗拱。明间补间斗拱六攒,次间稍间为四攒,四周共用柱头斗拱16攒(包括4攒转角斗拱),补间斗拱64攒。补间斗拱为真下昂,挑金做法。昂后尾挑于正心檩与下金檩之间的枋下,枋上挑檐椽,枋两端通过驼峰,搁置于抱头梁或六架梁上。内檐下金垫板与下金枋之间,置一斗三升隔架科斗拱。殿内有天花。殿宇前檐五间通开格扇门,后檐明间设门,通往妃宫殿。

妃宫殿建筑面积约288.6平方米。通面阔五间26.14米,进深三间(六椽七檩)11.04米。殿内明间南部减去金柱两根,屋面单檐庑殿式,铺绿琉璃瓦。柱础石为素面覆盆式,柱头有砍杀,五踩单昂斗拱,明间补间斗拱六攒,次间及稍间为四攒,四周共用柱头斗拱16攒,(包括4攒转角斗拱),补间斗拱56攒。殿内山面挑尖梁上立瓜柱,瓜柱上交接前后金檩及山而下金檩,山面金檩上置扒梁,其上再交接前后金檩及山而下金檩,推山做法。殿内置天花。殿宇前檐明间开门,其余檐墙上开窗。后檐及山面窗墙。

大殿及妃宫殿均用金龙和玺彩绘。

东西配殿建筑面积各为84.12平方米。其面阔各三间12.48米,进深一间(3椽4檩)6.74米,悬山卷棚顶,绿琉璃瓦屋面。殿前后檐柱额枋上有一斗三升斗拱,每间补间斗拱四攒,柱头有卷杀,柱有侧角。殿宇开门。彩画为龙锦枋心。

东西掖门额枋以下为砖仿木结构无梁建筑,檐头从平板枋以上为木结构。建筑面积为64.7平方米。面阔8.9米,进深7.27米,绿琉璃歇山屋面,中部设拱券门,板门装九路门钉。平板枋上周围置三踩单昂平身科斗拱28攒,转角4攒。

庆成宫建筑群,于2000年收归文物部门管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修缮。

北京的先农坛创建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5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从本源文化的创意到为帝王服务的建筑而今成为文物圣迹,它无处不体现着历史、文化、艺术的价值。如今虽然外坛已成体育运动场所,但内坛在历史的洗礼中古柏成荫,修葺后的建筑群屹立于其中老当益壮更显辉煌。在先农坛古建博物馆内陈列着的世界建筑史上自成体系的《中国古代建筑展》,使先农坛的全部建筑也成为其展览的组成部分,身临其境更能体会到民族文化与艺术的韵味。

(作者为北京古建筑博物馆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1 年三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7月5日 市文物局就历代帝王庙修缮过程中存在的大木、瓦件、彩画等有关问题召开专家论证会,傅清远、王仲杰等专家参加了论证会。同日,石景山田义墓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7月5日、16日 市文物局两次参加市规委召开的关于广安大街建成中国近现代史迹街协调会。

7月9日 北京市文物局在昌平区召开为期两天的区县文物局长会议。

7月12日 皇城遗址公园北节点头城墙修复工程开工交底。

7月17日 先农坛外坛南墙一期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7月18日 德胜门箭楼值房复建工程开工交底。

7月19日 市文物局参加市开发办主持的东便门遗址搬迁工作协调会;同日,琉璃河大桥修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7月25日 市文物局参加市规划委、市规划局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专项规划协调会。

7月27日 我市国保单位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东西楼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8月1日 市文物局召开新增国保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安全工作会;同日,府学胡同36号院彩画方案专家论证会召开。

8月2日 西黄寺二十五间房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8月3日 市文物局批准北京中华民族园正式更名为“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同日,完成没有行政审批收费项目的行政审批

收费自查报告;北大红楼东围墙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8月10日 市文物局组织协调公安、工商部门对皇家友谊商店、首都大酒店、汇文堂等八家非法销售文物的经营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没收文物230余件,完成初步处理后,移交工商部门。

8月14日 北京市文物局暂对荣兴艺廊市场实施文物监管,派驻专家,铃盖“京文检”标识。

8月1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地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专家关于文物保护法的修改意见。

8月1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视察了文物保护单位白塔寺及孚王府的保护现状及执行《文物保护法》中存在的问题。

8月21日 辽金城垣博物馆地基加固工程开工交底。

8月22日 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就周口店遗址周围环境整治及白塔寺西路搬迁事宜进行了现场调研。

8月23日 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就3.3亿抢险修缮项目天宁寺塔修缮及开放事宜进行现场调研。

8月24日 市文物局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举办了欧洲钟铃艺术学会赠送的中法友谊钟揭幕仪式。此外还有一口逾百年历史的西洋钟作为双方的互赠钟同时在大钟寺古外国钟展室展出。出席揭幕仪式的有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陈莫苏会长、法国驻华大使代办熊保罗先生、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舒小峰等。同日下午,美国世界遗产保护基金

会副主席约翰·斯塔布斯等3人到先农坛考察俱服殿、并亭、大门及庆成宫后殿,并与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修缮工作交换了意见。同日,市文物局博物馆处批准成立北京自来水博物馆,这是我市博物馆行业管理部门正式批准建立的第114座博物馆。

8月30日 市文物局舒小峰副局长对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筹办的中国印钞造币博物馆进行了考察,该馆建成后将以介绍我国印钞造币工艺为主要内容。同日,司马台长城望京楼、黑龙潭橡皮关长城修繕项目开工交底。

9月6日 经主管部门审核,市文物局批准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北京IT品牌中国有限公司主办的“IT博物馆筹备处”成立。

9月13日 组织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对申请建馆的华尔森艺术博物馆、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就其硬件设施及陈列设施进行了研讨。

9月1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理事会专家亨利·克莱尔先生参观了北京云居寺和成台寺,对两者的保护情况给予较高的评价。

9月17日 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宴请亨利·克莱尔先生,双方就北京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交换了意见;同日,海淀区马甸清真寺修繕工程开工交底。

9月19日 为庆祝“延安杯”讲解邀请赛北京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全市博物馆的社教工作人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获奖讲解员汇报演出,以促进博物馆社教工作的开展。

9月20日 首都博物馆举办馆庆2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外省市博物馆的部分馆长在和敬宾馆召开了博物馆馆长论坛,就博物馆事业今后的发展进行了研讨。同日,中国农业博物馆新展陈正式对外开放。

9月23日-27日 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商委等单位主办,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北京古玩城艺术品博览会”在北京

古玩城举办。全国近百家文物经营单位和各文物市场的经营户参展,为北京国际旅游文化节增添了博古色彩。

9月25日 丰台区宛平城南城墙及敌楼修复工程招标评标会举行,北京市文物古建筑公司中标。

9月27日 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北京地区博物馆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博物馆动员会,会议布置了设计大赛的相关工作。

9月28日 明城墙腾退动员会召开。

9月30日 孔繁峙副局长就西黄寺钟鼓楼重建进行现场勘查。

9月份 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开始对宣武区琉璃厂文化一条街实施文物监管,对经鉴定核准上市的文物监管物品,具体实行售前检验,铃盖“京文检”标识工作。

三季度 对局属各单位和安全保卫规范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共进行日常检查64次,夜间清查(含节假日检查)178人次。检查中共发现各类隐患50余处。完成建党80周年和“911”事件后的重点安全清查工作。完成国保单位巡视检查45家,抽查市保23家。配合公安机关鉴定涉案文物15起,共240余件。共查处违法违章案件15起,其中违章违法建设的12起,分别是:端门违章建设案、十三陵违章建设案、日坛违章修繕案、土城违章建设案、北师大附小违章案、和敬公主府违章案、颐和园小学违章案、美国使馆旧址违章修繕案、北京大学违章修繕案等;非法盗掘、盗窃文物或倒卖文物的3起,分别是朝阳区南磨房擅自挖掘古墓案等。现有11起案件已经结案,赔偿损失65万元。3起案件现已移交规划局处理。其他案件正在处理中。共接到举报电话20余次。

北京市文物局审核了安装电锅炉协议、东岳庙西路开发文物保护协议、艺术博物馆西路与新加坡合作开发协议、徐悲鸿纪念馆权利移转书;完成了市政府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法规征求意见的回复。

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 2001 年三季度参观人数表

2001 年第三季度	成人含外宾	学生	总数	其中外宾约	购票入馆者(含通票)
徐悲鸿纪念馆	11000	9000	20000	100	2400
首都博物馆	49324	12171	61495	21783	49196
大觉寺	24986	2059	27045	32	23428
正阳门	34294	11675	45969	1238	42628
智化寺	4070	379	4449	131	1742
辽金馆	1719	333	2052	20	535
西周馆	5135	127	5262	22	3855
艺博	34782	969	35751	27715	32119
团城演武厅	11000	1000	12000	0	3000
大葆台	6999	805	7804	194	2304
大钟寺	21761	2908	24669	8351	21994
古建馆					
白塔寺					
老舍纪念馆	500	150	650	0	400
德胜门	3386	918	4304	60	2800
石刻馆	全年闭馆				
总计	208956	42494	251450	59646	187001

市文物局所属博物馆 2001 年二季度参观人数表

2001 年第二季度	成人含外宾	学生	总数	其中外宾约	其中购票入馆者(含通票)
徐悲鸿纪念馆	21000	8000	29000	300	16000
首都博物馆	49588	6459	56047	23953	56047
大觉寺	37223	4614	41837	72	34908
正阳门	38138	5082	43220	862	39949
智化寺					
辽金馆	1216	51	1267	9	141
西周馆	8291	227	8518	41	1800
艺博	30348	2858	33206	20827	9521
团城演武厅	4000	1500	5500	0	2240
大葆台	5489	987	6476	127	3466
大钟寺	28047	2800	30847	13042	23428
古建馆	1365	292		263	1189
白塔寺					
老舍纪念馆	570		570		
德胜门					
石刻馆	全年闭馆				
总计					

(本表由局博物馆处提供)

《北京文博》2001年总目录

文物工作

- 论北京地区博物馆发展建设的优势与问题
 梅宁华(2001.1)
- 北京文物事业五十年梗概
 荣大为(2001.1)
- 海淀区文物资源状况及保护利用的调研报告
 海淀区文物资源状况及保护利用课题组(2001.1)
- 刘淇市长在第二十次科学技术专家咨询会上的讲话
 (2001.2)
- 关于文物价值的思考
 舒小峰(2001.2)
- 文物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定位
 孔繁峙(2001.2)
- 面向二〇四九年北京的文物保护及其现代化管理学术研讨会纪要
 荣大为(2001.2)
- 探索海淀区文物资源利用的新思路 促进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
 王晓军(2001.2)
- 把握历史机遇,全面推进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梅宁华(2001.3)
- 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
 ——关于北京旧城内危旧房改造中文物保护的若干问题
 孔繁峙(2001.3)
- 东皇城遗址的发掘展示与皇城的整体保护
 孔繁峙(2001.4)
- 东岳庙文化庙会浅析
 田瑾(2001.4)

北京史地

- 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基本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王雅红(2001.1)
- 西汉燕(广阳)王墓群
 陈康(2001.1)
- 辽南京(燕京)村乡指辨
 于德博(2001.1)
- 大护国仁王寺遗址
 刘之光(2001.1)

- 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王秀玲(2001.1)
- 北京牛街礼拜寺窑殿宋、辽建筑探析
 四宗正(2001.2)
- 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
 包世轩(2001.2)
- 大慈延福官迹略
 田瑾(2001.2)
- 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
 王世仁(2001.3)
- 石景山田义墓主人生平事迹考
 苗天地(2001.3)
- 明定陵出土的玉器赏析
 王丽梅(2001.3)
- 从塔刹宝藏《尊胜咒》看乾隆皇帝与帝师三世章嘉的关系
 孟君(2001.3)
- “不可忘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李铁虎(2001.3)
- 从刘李店78H1说姬燕建国
 韩嘉谷(2001.4)
- 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捺事述考
 黄春和(2001.4)
- 辽金时期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事
 范军(2001.4)
- 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典仪
 付幸(2001.4)
- 永乐大钟成铸时间考辨
 孔祥利(2001.4)

文物考古

- 金陵遗址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宋大川 黄秀纯(2001.3)
- 通州今存石刻
 周良(2001.3)
- 明代天监的墓葬
 刘耀辉(2001.3)
- 贵福墓志考略
 高二跃(2001.3)
- 北京西山凤凰岭石窟调查
 温玉成 刘建华(2001.4)

吕微墓表考释……………任秀侠(2001.4)

古代建筑

我国非文物建筑遗产评估系统的建立……………方 通(2001.1)

醇亲王墓碑亭特点浅析……………王心白 纪 伟(2001.2)

先农坛的建筑……………李小涛(2001.4)

博物馆学

试论明代袍式套服的性质及服用场合……………胡汉生(2001.1)

一枚传世印章的考证……………田 晓(2001.1)

认清差距 建好新馆
——首博新馆建设赴加拿大、美国考察
总结……………首博新馆建设业主委员会(2001.1)

关于中国钟的分类……………〔日〕神崎胜著 高凯军译(2001.2)

首都博物馆陈列浅见……………沈 平(2001.2)

智化寺音乐、壁画和藻井……………张文生(2001.2)

中华民族博物馆经营管理中的人文情结……………解立红(2001.3)

略论博物馆教育的参与……………楼锡祐(2001.3)

加强博物馆经营创收的科学管理 促进博物馆本职业务工作的发展……………马法柱(2001.3)

责任重于泰山
——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消防安全……………郑铁兵(2001.3)

文物鉴赏

观洪武釉里红器……………李 宏(2001.2)

明清两代几种彩釉的发展和特点……………魏志燕(2001.2)

铜器辨识琐录……………贾文超(2001.2)

辽瓷造型及其装饰艺术
——兼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品介绍……………卢迎红 高建祥 黄秀纯(2001.4)

瓷器中的精品
——琉璃彩瓷器……………赵世暖(2001.4)

史籍辨误

元《析津志》佚文新辑
——兼论《析津志辑佚》之误……………党安海(2001.4)

《燕下都东周货币展》读后记……………程鹏飞(2001.4)

区县快讯

门头沟近年发现的西通石造像……………乔鸿浩(2001.1)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2000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2001.1)

“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的北京项目……………(2001.2)

一部形象的北京史——《图说北京史》……………齐 心(2001.2)

北京市文物局2001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唐瑞民(2001.2)

“宣南文化”研究一瞥……………李建平(2001.3)

编篡《门头沟文物志》的体会……………刘义全(2001.3)

依法保护 加强管理
——写在第五批“国保”单位北京项目
名单公布之际……………《北京文博》编辑部(2001.3)

北京市文物局2001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唐瑞民(2001.3)

北京市文物局2001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李树丛(2001.4)

《北京文博》2001年总目录……………(20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4/张展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402-1297-7

I. 北… II. 张… III. ①文物-考古-北京市-文集

②地方史-北京市-文集 IV. K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05 号

北京文博(2001 · 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0.00 元

9. 富育女校教士楼、百友楼旧址

1904年。1929年建，位于通州区通州镇玉带河大街72号。1866年美国基督教牧师富善创建安士学道院，1900年庚子之役烧毁，1904年用“庚子赔款”建教士楼，次年改校名为富育女子学校。共有三座小楼，均为砖木二层结构。百友楼建于1929年，东西向二层楼，面阔九间，进深三间，大式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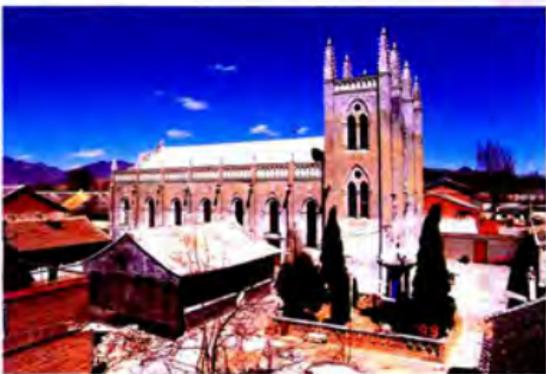
10. 鱼子山抗战遗址

1938年建，位于平谷县东庄镇鱼子山村。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创建了鱼子山抗日根据地，并在此建立兵工厂、卫生所、供给处。现保存的有兵工厂的猴石南沟遗址、西洞铸造车间遗址、北洞兵器组装厂遗址以及当年冀东西部地分委、县委在此召开会议的崇光门遗址。



11. 永宁天主教堂

1902年建，位于延庆县永宁镇阜民街。始建于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烧毁，1902年用赔款重建。教堂面阔13.5米，通进深26.4米，周围有中式风格配房8间及大门，院内有“诸位信友致命者墓碑”一通。是北京地区最偏远的天主教堂。



五、其他

木化石群

侏罗纪晚期，位于延庆县千家店乡辛栅子村。分布在辛栅子大约东西400米，南北1500米范围内。以松柏类为主的硅胶木化石，属距今一亿三千万年左右的侏罗纪晚期，其对于研究北京以及华北地区的地质变化、环境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图、文：王有泉等)



ISBN 7-5402-1297-7



9 787540 212971 > 定价: 10.00 元